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庫

隋唐春秋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隋唐春秋

杨坚受禅称帝

杨坚（公元 541 年—604 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祖籍武川（今属内蒙）。父名杨忠，是西魏 12 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后仕北周，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

杨坚于西魏文帝大统七年（公元 541 年）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音 bōrě 寺，14 岁即任京兆尹功曹，15 岁以父荫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并晋封成纪县公。由于他年少勋高和“貌有反相”、“恐非人下”之嫌，故招致北周统治集团的猜忌。武帝宇文邕在和叔父宇文护的争权斗争中，依靠杨坚的实力地位和杨氏家族的影响，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杨坚的恩宠不衰，未尝不是宇文邕的回报。但宇文邕对他亦有戒心，知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故采取许多怀柔笼络之策，使其为己所用。建德二年（公元 573 年）太子宇文赟（音 yūn）纳杨坚长女为妃，这种政治联姻，使 2 人在君臣之分以外，又结成儿女亲家，为宇文政权的长治久安，拴上一条姻戚纽带。从这一举措，可以看出宇文邕的良苦用心。

大成元年（公元 579 年）杨坚之婿宇文赟即位，是为宣帝。杨坚以皇后之父的身份晋封为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又升任大后丞、右司武，不久再擢升为大前疑。宣帝每次出巡，均由杨坚留守京师，统摄朝政。从此威望渐隆，外戚擅权之势已成，主弱臣强之局已定。宇文赟之与杨坚，虽有君臣之义，翁婿之情，仍惴惴不安，“颇以为忌”。加之后宫四妃争宠，彼此相谗；而杨后之尊，又成为众矢之的。起初，宣帝还能明是非，分曲直。以后因毁语日多，是非莫辨，常怒斥皇后道：“必杀你全家诛你九族。”一次宣帝召杨坚以议事为由，察其神色，验其忠奸，谓左右曰：“杨坚入宫，若有惶惧之色，即杀之。”杨坚见宣帝之后，神色自若，仪态安详，才免遭杀身之祸。此后，宣帝昏暴日甚，喜怒无常。一天借故将杨后赐死，逼令自缢。幸因杨坚之妻独孤氏入宫求赦，叩头流血乃免。杨坚虽百般韬晦，仍情不自安，就向昔日同窗，时任内史上大夫宣帝宠臣郑译求助说：“我求外任以苟全，望公相机相助。”恰值宣帝欲委郑译伐陈重任，筹划征服江南事宜。郑译借机要求杨坚参与，担任扬州总管，总领伐陈军事，得到宣帝首肯。临行之日，宣帝忽得暴病，急召刘昉、颜之仪等亲近大臣，入宫托付后事。杨坚见朝政不稳，以病足为由，留京以观事变。宣帝弥留之际，口不能言，无所嘱托。刘昉见太子甚幼，就与郑译合谋，矫称宣帝诏命，命杨坚入宫辅政，总管中外兵马大权。宣帝病逝后，刘、郑二人秘不发丧，俟杨坚调兵遣将，部署就绪之后，才讣告朝野。杨坚于大象二年（公元 851 年） 5 月 24 日扶植宇文阐即位，年仅 8 岁，称为静帝，改元大定。杨坚自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军政大权后，第一要务就是铲除北周宗室势力。6 月 4 日以千金宫主远嫁突厥为由，将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赟（音 yóu）5 人召至京师，均以谋逆之罪于同年 6 月、7 月、11 月先后诛杀。至此，杨坚牢牢控制了北周大局。此后虽有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反叛，均被杨坚迅速平定，无伤大局。杨坚于北周大定元年（公元 581 年）2 月受禅称帝，改元开皇，仍都长安，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坚原承父荫，曾封“随国公”，因改朝号为“随”，又恶“随”字带“走”，故将“随”去“走”为“隋”，称为隋文帝。杨坚从矫受诏命入朝辅政，到

代周称帝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其得国之易，在改朝换代史中，是无人与之相比的，故历代史家叹为异事。

杨坚立国之后，颇能勤政。史称杨坚每日平明听朝，日员（zè）忘倦。五品以上官员，均使之论事；由于论事时间过长，就命宿卫传餐朝堂而食，这在封建帝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经常外出察访，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询问，诸如官吏为政之得失，百姓生活之疾苦，均在察访之列。为了惩治贪官，他往往派人伪行贿赂；受贿者则处以死刑，且亲自临决。开皇年间，关中地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他派人至民间察看百姓所食何物，有得豆屑杂糠回奏，杨坚流涕展示群臣，并引咎自责，减损御膳，一年之间不食酒肉。还让关中饥民就食河南，泽及万民，堪称义举。

杨坚的俭朴之风，亦为世称颂。史称杨坚“居处服饰，务在节俭。”隋宫嫔妃，均着多次浣濯之衣。车马服饰破敝，补缀而用，不得新制。杨坚平日御膳，荤食只限一肉，素菜数碟而已。开皇十五年（公元 595 年），相州刺史豆卢通进贡绫纹布匹，杨坚命焚毁于朝堂之上。此后，再无贡物邀宠之徒，敢于效尤希宠。俭朴之风，上下相化，在开皇、仁寿之间，官吏均不穿绸缎，不饰珠宝；常服多为布帛，装带不过铜铁骨角制品而已。这种俭朴之风的形成，虽有“齐之以刑”的因素，但杨坚本人的榜样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杨坚建国之后，宽恤民力，轻徭薄赋，采取许多经济措施以巩固政权。开皇元年，即位伊始，就将官牛 5000 头分给贫民，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第二年又颁布均田租调的新法令，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一个成年男子受“露田” 80 亩，“永业田” 20 亩；妇女受露田 40 亩。永业田永为受者私有，露田在受者死后必须归还。还颁布“轻税入官”政策。“轻税”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入官”就是整理户籍，把所纳税物农户从地方豪族手中转为国家税户。开皇三年下令将百姓成丁的年龄由 18 岁推迟到 21 岁；丁男服役期限，由 1 个月减为 20 天。每户调入国库的绢由 1 匹（4 丈）减为 2 丈。这种富民政策，不到几年使隋朝仓库充盈，民康物阜。《隋书·食货志》就记载当时“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京师“帑屋（钱库）既充，积于廊庑（室外走廊）之下。”隋文帝因之停征赋税，“以赐黎元”。这种雄厚的物质基础，为隋平陈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

隋文帝即位不到 1 月的时间，就任命声名素著的韩擒虎为庐州（今安徽合肥）总管、贺若弼为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共同筹划平陈之事。其时因突厥为患，北方未安，无暇用兵南国。至开皇八年（公元 588 年）隋文帝才下令出兵，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大臣杨素并任行军元帅。杨广从六合（今江苏六合）、杨俊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杨素从信州（今属四川）等地共征集地方总管 90 人，发兵 50 余万，由晋王杨广统一指挥。九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贺若弼由扬州至京口，韩擒虎由庐江至采石，形成钳形攻势，夹击建康。2 月城破，韩擒虎率先入城，俘陈主叔宝，陈朝宣告灭亡。从西晋末年延续 300 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中国复归于一统，这是隋文帝的一大历史功绩。

杨坚一生自奉甚俭，在封建帝王中实不多见，但晚节有亏。开皇十三年命杨素监造仁寿宫。其规模宏丽，《隋书》记载不详，唐初魏徵所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有详细描绘。谓其“栋宇胶葛，台榭参差”，“珠壁交映，金碧相辉。昭灼云霞，蔽亏日月。”宫成，文帝命高熲察视。高熲回奏八个字：“颇伤绮丽，大损人丁。”总之，劳民伤财太甚。文帝因之甚为不悦。杨素

甚为忧惧，乃叩请独孤皇后斡旋，说什么天下一统，功高日月，造此一宫，算不上什么耗费。杨坚是个极怕老婆的皇帝，皇后这么一说，他只得高兴起来，及去游观，又圣意大悦，奖钱百万，锦缎三千匹，杨素才祸中得福。开皇二十年废去任性奢华的太子杨勇，立矫为俭德的次子杨广为太子。故史家认为，隋朝的“乱亡之兆”虽然成于炀帝，但文帝已开其端。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七月，卧病于仁寿宫的文帝，在杨广、杨素的控制之下猝然死去。据称，是二人谋害的结果。

独孤皇后的妒与贤

在历代开国之君中，惧内之甚者，莫过于隋文帝杨坚。

杨坚的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是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的掌上明珠。独孤信因见杨坚生有异相，英俊奇伟，知道以后贵不可言，就把爱女嫁给他。二人结成伉俪，恩爱异常，并立下誓言：“誓无异生之子”。如果把它理解为夫妻二人忠贞不渝，永不移情别恋，这未尝不是人世间的一种纯情美德；但从立誓后的情况观之，誓言似乎专对杨坚而发。不准他拈花惹草，纳宠藏娇。禅代之前的杨坚不仅摒绝女色，就是禅代之后已成一国之尊的杨坚，面对无数的后宫佳丽，亦罕有亲近的机会。无怪杨坚曾以自豪的口吻对群臣说：“朕别无姬妾，五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是真正的骨肉亲情。不像前代君王有许多内宠，异母所生之子，必然有夺嫡争权之衅，导致亡国之祸。”不过杨坚晚年亦有耽乐之举，劳民伤财而修建的离宫别墅仁寿宫，即是他的俭德“鲜克有终”的表现。他在独孤皇后生前的“偶幸女色”，也是发生在仁寿宫里的事情。

尉迟迥的女孙，因美色而选入后宫多年。在长安宫中，或因恪守“誓无异生之子”的誓言，或因独孤皇后的严加防范，杨坚一直似乎无视她的存在。尉迟氏转入仁寿宫后，杨坚“见而悦之，因此得幸”。独孤皇后侦知其事，妒性大发。在杨坚临朝议政之时，率领嫔妃仆役，将尉迟氏鞭笞至死。这件事对初幸宫女的杨坚来说，是警告其下不为例；对媚君求宠的宫女来说，是以儆效尤，其核心问题，则是保护自己的专宠地位。从独孤皇后立场言之，于情于理也未可厚非。杨坚回宫即临尉迟氏寝处，见到的却是一具僵尸，虽然怒不可遏，但慑服于河东狮吼之威，未发一言，一气之下，独自离宫出走。杨坚一人骑着马从后苑出门，不择路径，信马所之，只觉苍茫一片，暗淡无光，马前的一抹斜晖，尚可分辨林木的高下，就是在这种混沌的感觉中，竟深入荒山野谷 20 余里。仁寿宫中却因丢了皇帝，闹得天翻地覆，幸亏高颎、杨素二位大臣，问清原委，查询踪迹，追随而至。君臣三人深山荒野晤面之后，面面相视，不发一言，惟有唏嘘而已。在二位大臣看来，这毕竟是皇上家事，疏不间亲，评判谁是谁非呢？在皇上看来，身为万乘之尊，竟然不能保全所欢女子，是一种奇耻大辱。如泣如诉的虫鸣声，似乎渲染了相对无言的悲凉气氛；林中传来“不如归去”的鹧鸪声，又增强了徒唤奈何的叹息。驻马良久，杨坚才仰天长叹说：“我贵为一国之君，难道亲近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吗？”这话像是自问，又像是在问高颎、杨素二人。高颎乘机劝慰说：“陛下不能因一妇人而轻天下啊！”杨坚在山中徘徊良久，在高、杨二臣的劝说之下，深夜才回到宫中。独孤皇后虽迎于阁内，置酒相欢，但始终未认阴杀宫女之过。在她看来，一个女子不管是贵为皇后还是贱为民妇，均

应保护其专宠地位，何况杨坚和她还有“誓无异生之子”的盟约呢？

独孤皇后的这种妒性，不仅仅发泄在杨坚身上，对她的五个儿子也是防范有加，诸子之中有妾怀孕者，必欲去之而后快。她对太子杨勇的家庭生活，尤为注意。史称太子杨勇多宠妾，正妃元氏，是皇后亲自选择的爱媳，可太子爱薄恩疏，而对偏妃云氏昭训，宠幸倍加，一切礼仪恩赐均优于元氏。不知是元氏素有心疾还是失宠的家庭生活抑郁而成，心病两日即溘然长逝。独孤皇后怀疑是云昭训阴谋毒杀，耿耿于怀，从此认为太子德行有亏，不堪君临天下。在次子杨广的多方挑拨之下，遣人伺其过失，让杨坚废太子杨勇为庶人。

高熲是杨坚的股肱大臣，和独孤皇后的父亲过从甚密，待字闺中的皇后对高熲礼遇甚殷。高熲夫人死后，纳妾生男，独孤氏以为不忠于原娶，督使杨坚借故将高熲罢官归里，在妒妇史中实属罕见妒例。史称独孤皇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杨坚）斥之。”所谓“诸王”，是指她的五个儿子，行使家规母训，禁止儿子纳妾生子，有理可言。至于“朝士”，乃朝中大臣，在多妻制的封建社会中，纳妾生子，要遭到丢乌纱帽的惩处，实属罕见之事。由此可见，独孤氏是封建社会中一夫一妻制的捍卫者。

独孤皇后除“性尤忌妒”之外，还有贤明达理不让须眉之处。有一次名叫阴寿的幽州总管将一匣价值 800 万的明珠献给独孤皇后，她义正辞严地说：“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当今突厥为患，生民涂炭，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抗敌辛劳备至，不如把这匣明珠，分赏给有功将士。”将士闻之，欢呼万岁。百官闻之，赞誉备至。皇后与文帝，恩爱异常。史称“同及宴寝，相顾欣然。”杨坚每次上朝，皇后一定随辇送到殿阁之外才返回宫中，还使宦者暗中窥探文帝为政之得失。若有失误必定提出匡正意见，对杨坚施政“多所弘益”；但她从未擅权干政，总是让杨坚知其错而改之，自己暗藏幕后，弼违匡谬，是正非讹。人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中表兄弟，犯法当斩。隋文帝国他是皇后亲戚之故，欲赦其死罪。皇后闻之正色说：“国家大事，按律处之，怎么能枉国法而顾私情呢？”崔长仁则依法处死，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当时传为佳话。皇后的同父异母之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之术诅咒皇后，依律当处死刑。皇后为此废食三日，向文帝求情赦免。她说：“陀若犯蠹政害民之罪，妾决不为之求情。今因咒我而处死，妾心不忍，请免他一死。”独孤陀因之减去死刑。这种公私有别、恩怨分明、通情达理的豁达行为，满朝文武为之折服，故当时“宫中称为二圣”。史称文帝对独孤皇后“甚宠惮之”，即是说对她又爱又怕，这话是有道理的。

仁寿二年（公元 602 年）八月，独孤皇后逝于永安宫，年仅 50 岁。此后，文帝宠幸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上颇惑之，由是发疾”。即是说因耽宠女色而伤龙体。到病危之时，文帝对侍臣说：“若皇后在世，我不会落到这种贪色亡身的境地啊！”杨坚此话，可以说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杨广施奸夺位

隋文帝杨坚禅位之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坚有五子，鉴于北周王室势孤力薄而亡的历史教训，便封诸子为王出任各州“总管”，平时管理地方政务，战时为行军元帅，保国勤王。杨坚这种治国谋略，是寄长治久安的厚望于诸王身上。惜乎事与愿违，诸王坐大擅威，太子势反卑弱，是隋朝速

亡的致祸之源。这是杨坚始料未及的。

太子杨勇被废，一因“率性任情”，恶习昭著；二因宠爱云妃，失欢母后。但他遭废的主要原因，则是晋王杨广施奸夺位的必然结果。

杨广，是杨坚的第二子。史称“弥自矫饰”极善伪装。他侦知父皇母后对太子的俭朴仁孝有亏、奢侈淫乐无度行为严加责备之后，便将自己伪装成俭朴仁孝的化身，不近声色之娱的圣者，以取悦于父母。为此，他每次自扬州来京，衣敝服、乘旧车、驭驽马、使老仆，对父母嘘寒问暖，恪守人子之道。他得知朝中对太子亲群小而疏大臣颇有微辞，故每次来京必拜见权臣显宦，卑辞屈礼，貌极谦恭，赢得满朝的赞誉。每次离京之前，一定进宫辞别母后，演出一场场依依惜别的滑稽剧。一次，他辞别母后时呜咽地说：“儿臣就要回扬州镇守有限之地了，一想到要离开父母，恋亲之情便油然而生。离开此地，不能晨昏侍奉，痛苦至极。再拜之期，又不知是何日何时啊！”说完以后还俯伏在地，装出涕泗横流、哀伤至极之态，使得老母也“泫然泣下，相对嘘啼。”母后动了感情，泪流满面地说：“你守方镇，我住京师。我已老迈，不知今日别后，能有再见之时否？”杨广见到自己的表演已收成效，便施展谗毁太子阴谋。他故作委屈哀伤之状对母后说：“儿臣性本愚钝，十分看重兄弟手足之情，但不知因何得罪于兄长，失爱于东宫。他衔恨在心，欲加屠戮，使我成天提心吊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担心祸从天降，不能嘘寒问暖于双亲之门。”皇后闻之怒不可遏地说：“犬子行为令我难耐。我为他选择元氏为妻，是为了杨家基业的兴旺发达。他竟不和元氏做真正夫妻，却宠幸阿云（云妃昭训）。元氏本无病痛，忽然暴亡，定是遣人投毒，致此夭亡。事已如此，我未加苛责。今天对你又怀不轨之心，怎能漠然不理呢？我活着的时候，他竟如此放肆；我死之后，岂不鱼肉相待么？”皇后越说越急，越急越气，最后竟气急败坏，说不出话了。杨广出宫之后，以手加额，庆幸自己的成功表演。

杨广这次来京，谮毁了太子，美化了自己；动摇了东宫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回到扬州以后，便加速施展夺位之谋，与扬州总管司马张衡、寿州刺史总管宇文述共谋其事。宇文述曰：“废立之举，国之大事。它动摇父子骨肉亲情，易起兵戈杀戮之祸，必须要有肱股大臣，能左右圣意者与之合谋，或能成事。今朝臣之中对皇上能施影响的惟有杨素；而杨素之谋士乃其弟杨约。我与杨约旧有交往，请朝京师，与之结纳，共图其事。”宇文述携巨金至长安与杨约酣饮博戏，每博佯输，杨约尽得其金，起而称谢。宇文述因而对杨约说：“此乃晋王赐公之物。”杨约问：“这是何为？”宇文述尽申废立之意。杨约归与杨素说：“今太子失爱于母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兄此时能建大功，则可长保荣禄。一旦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了。”杨素本为凶险之徒，闻之大喜说：“我的智思，怎么想不到这一点，幸好你启发了我。”杨素借入宫侍宴之机，称誉晋王孝悌恭俭，以揣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极是，此儿大孝，每闻皇上和我遣使将到，必迎于境首。谈到与父母分离，无不泣下。不类勇儿，只知酣饮游乐。我深恐他谋杀其弟哩！”杨素乘机诽谤太子种种不肖之举，皇后由于杨素话语投机，赐金赐物，更加坚定了她的废立之愿。杨坚在仁寿宫，命杨素往东宫观察太子动静。杨素故意使勇良久以待，激怒于他。杨素回奏说：“太子怨望之情，形于颜色，恐有他变，望严加防察。”皇后又遣人窥伺东宫，行介之事，亦加夸饰，构陷其罪。文帝惑于邪议，遂对杨勇疏远猜忌，从玄武门到至德门，派人监候，防其动乱。

又将太子侍从，斥去健儿，只留老弱以供驱使。晋王又令亲信段达结识东宫幸臣姬威，略以重金，令察太子动静密告杨素。姬威乃出首状告太子意在追求奢侈，欲将樊川（今属陕西）至大散关大片土地辟为苑囿。并诬陷太子曾说：“皇上每责我嫔妃过多，和陈叔宝相比，还差得远哩。”还诬告太子传巫者卜筮之言说：“至尊忌日（文帝死期）在开皇十八年，此期甚近。”开皇二十年（公元 600 年）文帝召集百官宣布废除杨勇太子之位时说：“此儿不堪承继基业已久，皇后劝我废之，我望其悔改，隐忍至今。我虽德惭尧舜，终不能将杨氏天下付此不肖之子。我常害怕他加害于我，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文帝使人召杨勇于武德殿，宣读废黜之诏。杨勇首则痛哭流涕，继而手舞足蹈而出，类若疯癫，左右莫不怜悯，但默不敢言。随之立晋王杨广为太子，且将杨勇交给杨广看管，使囚禁于东宫。杨勇遭废以后，情实不服，频请面见父皇，以陈兔屈，均被太子遏阻，不得奏闻。杨勇无计所施，乃爬上大树，大声喊屈，希望父皇听到接见自己。文帝果问其故，杨素伪奏说：“杨勇情志昏乱，为癫鬼纠缠，无法治了。”文帝果然信以为真，不允杨勇面陈冤屈之请。

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七月，隋文帝卧病于仁寿宫里，杨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奉命入宫侍疾。皇太子杨广虑有不测之事发生，乃亲笔给杨素写信询问仁寿宫内情。杨素一一写明相告。不料宫人将杨素密件误送杨坚病所，文帝见后始而大惊，继而大悔，再而大怒。此时才醒悟过来废勇立广乃杨素等人阴谋策划的结果。捶床大叫：“枉废我儿。”皇后逝世，文帝宠幸陈贵妃。这天早晨陈贵妃出外更衣，被太子杨广所强暴。贵妃泪流满目入宫告知“太子无礼！”这时的文帝更是怒不可遏，即令内侍急诏废太子杨勇前来侍候。杨广计无所出，谋之于杨素。杨素调派东宫宿卫包围文帝寝所，所有出入之人均须宇文述、郭衍首肯方可放行。又令张衡入宫侍疾，第二天文帝便猝然死去。史称杨坚之死，乃杨广弑君自立，不为无据。文帝死后，杨广秘不发丧，伪造文帝遗诏，赐故太子自缢而死，追封为房陵王，不为立嗣。杨勇有十个儿子，长曰杨俨，封长陵王，炀帝即位后长使随侍左右，乘外巡之际，毒死于道。其余三弟均流放于岭南，不久又使人杀掉。熟悉杨坚猝死内情的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杨广借故投狱后，流放蛮荒，亦折磨而死。

运河工程

隋炀帝为了在政治上巩固南北的统一，军事上保证军需的供应，经济上沟通南北物资的运输，于是利用天然河流和历代开通的旧有渠道，拓宽疏浚，从而形成贯穿东西南北的大运河。

早在隋朝建国初期，文帝为了解决南粮北运以及输送江南丰富的物资至关中和京畿等地，以增强新王朝的经济实力和巩固隋杨政权，乃于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命宇文恺征调民夫开掘广通渠。渠长 300 多里，引渭河之水穿过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而东至潼关，解决了关内的漕运难题。开皇七年（公元 587 年），文帝又征调大量人力，循着春秋时吴王夫差开掘的邗（音hán）沟旧道开辟山阳渎。这段运河南起江都（今江苏扬州），北达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隋文帝利用山阳渎运兵运粮，为用兵江南统一全国作好了准备。山阳渎开通的第二年隋即出兵灭陈。它对兵力

的调动，后勤的供应是起了作用的。

隋炀帝开凿的运河，可以分为三段，即中段：自河南洛阳到山阳，名为通济渠。再从山阳起，连接隋文帝所开辟的山阳渎并延伸至江都的扬子（江都县南）而进入长江。北段：从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西南），名为永济渠。南段：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称江南河。由此可知，这条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达余杭，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西连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沃土，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

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隋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诸郡农民共达 100 多万开掘通济渠。自西苑（今洛阳县西）引谷水、洛水达于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汜水县东北）引黄河之水经荥泽（今属河南）流入汴水。又自大梁（今河南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今安徽境内）而通到淮河，并由淮河入邗沟到达江都。再将邗沟向南延伸至扬子而与长江汇流。河宽 40 步（6 尺为 1 步），约为 240 尺。河的两岸筑为御道，道旁植以杨柳。自长安至江都，道上设置离宫 40 多所。隋炀帝三幸江都均在此河乘龙舟东下，所以通济渠又称御河。通济渠是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工，同年八月十五日隋炀帝即乘龙舟东幸。全部工程只花 171 天时间，工期之短，劳役之繁，死伤之众，在治河史上均前所未有。

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炀帝征发河北军民百余万开掘永济渠（今名卫河）。史称：“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考沁水本为黄河的一个支流，无须人“引”。其实炀帝是开掘沁水上流，经过河北内黄、大名、临清、清河、武城、恩、德、吴桥、东光、沧、青等县，与清、淇二水相接，而通涿郡。因隋炀帝曾于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二月由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而至涿郡，所以隋人也称永济渠为御河。

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炀帝征发江南百姓，开掘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抗，全长 800 余里，河面宽十余丈，可通龙舟。河的两岸筑为御道，设置驿宫，为东巡会稽作准备。江南运河穿过富庶的太湖流域，这对隋炀帝搜刮江南财富，满足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起了很大作用。

炀帝开凿运河，始于大业元年，终于大业六年，全长约 5000 里，共征发河南、河北、淮南、淮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共达 300 多万人。在开掘永济渠时，因男丁不足还征发了女子，给各郡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灾难。大量农民死在工地，使得千千万万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运河之成功，当然给南北东西带来交通之便，成为当时的交通大动脉，对于隋唐时期的经济发展，巩固南北统一的政治的局面，无疑是起了极大的作用。所以明人的《谷山笔麈（音 Zhǔ）》评价这一工程说：“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作者把隋场帝开掘大运河与秦始皇的修筑万里长城事相提并论。

隋炀帝所开掘的“通济渠”、“永济渠”和文帝时创建的新都“大兴城”，史家统称之为隋代的“三大工程”。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六月，文帝命宇文恺任新都副监，在旧长安城东南 21 里龙首川处创建新都。仅用 10 个月的时间于开皇三年二月竣工，命名为“大兴城”。据文物考古发掘，大兴城旧址面积约为 70 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其布局为宫城居北，皇城在其南。皇城东西长有 5 里，南北长有 3 里。城内南北有 7 条街，东西有 5 条街。南面有 3 门，东西各 2 门。外郭城内有东西两市，每市占 2 坊之地，

方 600 步，四面皆市易之所，中署二衙，即治市之官府，其街各宽百步，约 60 丈。全城坊市，星罗棋布，街道宽广，规模宏伟，自古以来之帝都，均无这种气象格局。

大兴城建筑设计之构想，是东方文化思想之形象体现。宫城居北，本儒家南面而治、众星拱辰之意。其余四个纵列以象四时，而九坊则取易卦阳九之义，其十三坊则取一年有闰之原。日本平安京都系仿唐代的长安城而建筑的；而唐之长安又即隋之大兴。这么大的工程，前后只用 10 个月的时间。规模之大，工期之短，实属罕见。至于当时征发了多少民夫和工匠，史无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城墙的基座，是由枯骨堆成的。

三使台湾

台湾，乃祖国东南海域里的明珠。明代以前，名称数变。西汉名之为“东鲕（音 tí）”，东汉及三国时期呼之为“夷州”，隋唐时代称之为“流求”，明代以后始定名为“台湾”。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云：“会（音 kuài）稽海外有东鲕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一记载充分说明西汉王朝对台湾情况十分了解，知道岛中的居民分为“二十”多个部落（“国”）。这些部落和西汉王朝的关系，是属国和宗主之间的关系。他们每年按照一定时间（“以岁时”）向西汉王朝贡献方物和向汉皇进行朝拜（“献见”）。这种关系的形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史无记载。极有可能始于声威远振的汉武帝朝代。

《后汉书·东夷传》云：“夷州有数万家，时至会稽市。”这一记载说明东汉王朝，对台湾的户籍人口有进一步的了解。如果说西汉时期台湾和大陆政权之间的关系，还局限在上层酋长和汉皇、附属政权和宗主政权之间的交往，到了东汉已发展为民间往来，进行贸易活动（“市”），“时至”即时而至之的意思，说明贸易活动之频繁。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孙权于黄龙二年（公元 230 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卫温与诸葛直还带回数千人，说明大陆和台湾在孙权时代已有大规模的接触。

到了隋朝，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贸易活动更为频繁。大业元年海师何蛮向隋朝官吏报告说，春秋两季，天清风静，海浪不生之时，向东瞭望，烟雾之中依稀可以见到海市蜃楼般的景象，这正迎合炀帝探异求仙的个性。大业三年，炀帝即命何蛮与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因而到达“流求”（台湾）。因为言语不通，彼此交流受阻，没有什么宣抚活动，仅带一名流求人回来。

第二年，隋炀帝再次派遣朱宽到流求进行“抚慰”。既言“抚慰”，则是有目的地宣传隋朝的威德，传播大陆文明，化育土著居民，归依隋统。朱宽“取其布甲而还”。“布甲”为何物，史无记载，似为武人防身自卫之物。这一年有“倭使”（日本使者）来朝，见布甲而言曰：“此夷邪久国（台湾的一个部落）人所用也。”说明物之为用弥足珍贵。

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隋炀帝命武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州率领东阳（今江苏宝应西南）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州）出发至流求，航行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流求人看到大批船舰到来，争相贸易。这次来人之中，熟悉当地语言，便于宣传抚慰，与百姓交往甚密。而部落酋长有拒

逆官军者，陈稜乃击之。

隋炀帝三次派人渡海到流求，“求访异俗”，对那里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生产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隋书》的《流求传》称：“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还称：“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在“洞”之下的则为“村”。各村均有称为“鸟了帅”的首领以主持一村之事务。男女皆用白紵麻为绳缠发，从项后盘至前额。男子以鸟羽为冠，以珠贝为饰；妇女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

其地多养猪鸡，无牛羊驴马。土地肥沃，刀耕火种。土地宜种稻、粱、黍、麻、豆等作物。树木多枫、樟、松、楠、杉、竹等。气候与岭南相类。

从隋朝起，大陆人民对台湾情况的了解越来越详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沿海各地移居台湾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华文明的熏染之下，台湾土著高山族人民已融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海峡两岸的人民均为炎黄子孙，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

隋炀帝三幸江都

杨广于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即位于仁寿宫，八月奉文帝梓宫回京。他没有遵守“三年无改其父之道”的古训，两个月之后即东巡洛阳，于旧城之西大兴土木，营建东京。每月役丁 200 万，仿梁、陈宫殿建筑规模，穷极壮丽。乾元殿的大木柱多从豫章（今江西南昌）采来。2000 人拽一柱，木下装制铁轮，用原始推拉挽拽之法运至东京。运木 1 根，约费数百万钱。观文殿前设置书室多间，每 3 间相通有一方户供人进出。户垂锦幔，屏障内外。户上装置飞仙，机关与地板相连，人踏地板，飞仙自上飞下手卷锦幔而上。户扉、厨扉皆自动开启，帝出书室，则关闭如故。东京竣工之后，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巨贾数万户于内，效法秦皇。

隋炀帝以帝王身份第一次游幸江都，是其父驾崩刚满一年的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八月。而准备工作则始于乃父尸骨未寒之际。炀帝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於土澄二人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等楼船数万（疑为“数百”之误）艘。炀帝从河南显仁宫出发，先乘朱色小船从漕渠出洛口，登上大龙舟。龙舟四层，共高 45 尺，长 200 丈。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共有 120 个房间，皆以金玉为饰，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下层为内侍居室。皇后乘翔螭舟，体制比龙舟略小而装饰无异。另有三层的浮景九艘，皆为水殿。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凌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鰨（音 tà）、黄蔑等数千艘，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作为内外百司供奉之物的储运船。共征募水工 8 万余人，其中拖挽漾彩以上者 9000 余人。他（她）们皆以锦彩绸缎为袍，以特制的丝绳为缆索，在运河两岸作为纤（音 qiàn）夫拖着龙舟前进，并称之为“殿脚”。文武百官五品以上者乘楼船，五品以下至九品者乘黄篾舫。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艐、八棹、艇舸等船数千艘，由十二卫兵士乘之。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骑兵做为两翼，沿运河两岸而行。整个船队，首尾相接延伸 200 余里。旌旗蔽野，照耀川陆。所过州县，500 里以内，皆令献食。丰盛者，加官晋爵；粗劣者，或贬或杀。炀帝这次在扬州的唯一作为是“盛修仪仗”。他命太府少卿何稠

为百官制定新的仪卫服饰。营造这种服饰需要大量羽毛，于是急命州县进贡，掀起了一个全民捕鸟运动。羽毛可做仪服的水陆禽鸟，“殆无遗类”。史称乌程（今浙江湖州）有百年乔木，鹤巢其上，民欲拔鹤毛而树高莫及，只得伐树捕鹤。老鹤恐伤其子，乃自拔其羽投之于地。这个百姓编造的讽刺炀帝穷奢极侈的寓言，却被希宠之徒美化为“天子造羽仪，仙鹤自献羽”的祥瑞。炀帝这次游幸江都达半年之久，于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四月回到东京洛阳。

炀帝二幸江都是在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三月，也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这次游幸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提升江都郡的地位，类若京师。该郡太守俸禄与京兆尹等级相同。二是诏命挖掘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姚（今浙江杭州）长八百里的运河。河面宽十余丈，两岸设置驿宫，为乘龙舟东巡会稽作准备。三是从驾百官由服袴褶（音 kù dié）改服戎衣，规定服色等级：五品以上衣紫。六品以下衣绿、胥吏衣青、庶人衣白、屠商衣皂、士卒衣黄。炀帝于七年二月离开江都，乘龙舟入永济渠，4 月至涿郡（今北京市）。筹划伐高丽之事，于八年 9 月始还东都。

炀帝三幸江都的时间是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 年）七月。依隋朝惯例，每年正月初一，各郡必须派“朝集使”到京师进贡方物祝贺新年。这年竟有 20 多郡不派使者来京“贺正”。说明郡守拥兵坐大，朝廷失去控制能力。此时全国民怨沸腾，“盗贼”蜂起，占山为王者不可胜数。前两年炀帝命其表兄时任卫尉少卿的李渊，为山西、河东的抚慰大使，借助他的威望和实力，为朝廷推行绥靖之策，已奏成效。可是现在的李渊亦离心离德，不受调遣，拥兵晋阳，坐观成败。炀帝从没遇上这么艰难困苦、危机四伏的局面，近年来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竟患上一种惊悸忡怔之症，刚一合眼则大喊“有贼”，每夜必须几名宫妇不断摇抚，像慰哄摇篮中的襁褓，才能勉强入睡。为此他往往率领妃嫔内侍，夜出游山。为了解决游山时的光照问题，他曾诏令民间，收集萤火。十二年五月的一夜，在景华宫山野之间释放萤火数斛，光遍四野，尽兴而游，平旦才返。大约 200 年以后的晚唐诗人李商隐在《隋宫》一诗中还发思古之幽情，写出了“于今腐草无萤火”的名句。

在大业九年的杨玄感之乱中，龙舟、水殿皆被杨氏焚毁，于是诏令江都新造更大游船，于大业十二年七月运抵东京，炀帝乃下令三幸江都。朝臣皆不欲行，建节尉任宗上书谏阻，杖杀于朝堂之上。炀帝命越王侗与段达、元文、韦津、皇甫无逸、卢楚等人总管留后之事，还写诗留别宫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盛。宫中辟百余房间，各设龙床，各实美女，每月令一美人供奉，轮次更换。炀帝见天下危乱，亦自不安。每日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偏历台榭，非夜不止。他似乎有种来日不多的预感，故对景留连，唯恐不足。曾夜与萧后对饮，仰视天文，长声叹息，用吴语对萧后说：“外间有许多人图谋侬（吴语“我”）位，侬当然不失为长城公（陈叔宝亡国后封号），卿亦不失为沈后（陈叔宝后沈氏），管他那多，且共眼前醉饮之乐吧。”炀帝有大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自己，用手拍打自己的项颈对萧后说：“好头颅啊，由谁来砍呢？”萧后惊问其故，炀帝说：“天下人各自为王，国已不国了。”又笑着对萧后说：“人间的贵贱苦乐，更迭为之。皇帝轮流做，没有什么可伤感的。”炀帝见中原已乱，无意北归，欲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命人修理丹阳宫室。

宇文化及乃宇文述之子，本为市井无赖，后事广于东宫，深得宠幸。宇

文述死后，炀帝封他为右屯卫将军，掌管宫中禁卫军事。宇文化及部属均为北人，父母妻子均在两京，见炀帝治丹阳宫不思北返，就阴结党羽，推宇文化及为党首率众胁迫场帝回京。大业十四年 3 月丙辰，宇文化及自称丞相，率众逼炀帝出宫，引至寝殿，宣布罪名：称其抛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死于刀矢，妇弱填于沟壑；专任佞臣，饰非拒谏等十大罪状。炀帝听了以后对叛将说：“ 我实在有负天下百姓，但未负尔辈。尔等荣禄至极，为何相叛呢？ ”这时炀帝的爱子，年仅 12 岁的杨杲在他身边吓得号啕大哭，叛将虔通举刀砍死，血溅御服。虔通又举刀杀炀帝，炀帝大呼曰：“ 天子有天子死法，何用刀刃，取鸩酒来。 ”众人不许。炀帝乃自解腰间练巾付众人，遂被缢杀。萧后与众宫人拆御床板为棺，将炀帝父子二人尸体装入，埋在西苑的流珠堂，时年 49 岁。

隋相高颎

高颎（音 gǒng）字昭玄，渤海（今属河北）蓨（今河北景县南）人。其父高宾背齐归周后，深得大司马独孤信的喜爱，引为僚佐，赐信独孤氏。高颎自幼十分聪敏，略知文墨，尤善词令。杨坚为相辅政，欲罗致为己之助，遣邗国公杨惠探询高颎意向。颎欣然允诺，并说：“ 愿受驱使。纵令公事（指杨坚窃国之事）不成，遭灭族之祸，亦无所惧。 ”杨坚倚为心腹之吏。

杨坚受禅，封高颎力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并晋升为渤海郡公，恩宠之盛，朝臣莫与为比。文帝每呼为“ 独孤 ”而不加“ 颎 ”。颎深知权势之害，上表逊位，推荐苏威，自免仆射之职。数日之后，文帝仍复其位。

文帝曾询以伐陈平定江南之策，高颎说：“ 首以疑兵，声言偷袭。使敌疲于守备，懈其斗志。次以间者，深入陈境。焚其粮储，毁其辎重，耗其财物，不战而受我所制。三则逞天时地利之机，分路渡江，合围突袭，其功必克。 ”高颎平陈之策，卓有见地。晋王杨广伐陈之日，以高颎为长史，三军作战谋略，均由高颎决断。平陈之后，晋王杨广欲纳陈后主宠妃张丽华。高颎说：“ 武王灭殷，杀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 ”下令把她杀了，晋王甚为不悦。平陈之后，以功加授上柱国，晋爵齐国公。文帝慰劳他说：“ 公伐陈之后，人言必反，吾已斩其谗者。我们两人志同道合，不是一两只嗡嗡叫的苍蝇能够离间你我之情的。 ”杨坚的这番语，是政治技巧的高超表演。他一方面给高颎敲响了“ 勿叛 ”的警钟，又表明了自己信任如昔的心迹。其实，杨坚所言，正是疑叛的表现。不久，杨坚命高颎之子娶太子杨勇之女，这种政治联姻，自有深意。

高颎之父因独孤皇后之父的恩遇而赐姓独孤，皇后因此与高家过从甚密。高颎丧妻之后，皇后要求文帝为他赐妾说：“ 高仆射年老丧妻，凄凉寂寞，陛下何不为他继娶呢？ ”文帝以后言告诉高颎，欲赐妾与他。高颎流涕而拒，对文帝说：“ 臣已年迈，退朝之后唯焚香念佛而已。陛下垂念臣迈，劝臣纳妾，非臣之愿啊！ ”杨坚没有强人所难，遂止其事。年余时间，忽传高颎爱妾生子，文帝闻之极欢，拟亲往祝贺；皇后闻之极怒，耿耿于心。文帝问其故，她说：“ 陛下始欲为高颎赐妾，为之所拒。说什么终日以焚香念佛为务，其实身边早有爱妾，当面欺君。他的奸诈，今已败露，陛下还能信赖这种人么？ ”皇后之怒，来之于妒。杨坚身为天子，理应纳妃，在皇后生前，未敢亲近后宫佳丽。他的五个儿子若有人宠妾生子，必令弃之。朝臣之

中，有宠妾生子者，亦劝文帝罢官削秩，逐出朝廷。高颎之作为，自然触后之忌。时太子杨勇失爱于母后与父皇，已有废立之意。一日文帝欲探询高颖的态度，挑逗他说：“晋王（杨广）妃得到神的明示，言晋王必有天下，你看这事怎么办？”高颎长跪不起而奏曰：“自古以来，储君立长。长幼有序，岂可废乎？”文帝默然无语，不欢而散。独孤皇后，知道高颎的意见是无法改变的，因此积极策划将他逐出朝廷。文帝欲伐辽东，召大臣商议其事，高颎审时度势，固谏不可。文帝不从其谏，仍以高颎为元帅长史，跟随汉王杨谅（杨坚第五子）征辽东。刚至前线，即遇淫雨连朝，营中积水甚深，士卒中疾疫流行，不战而溃，只得僵旗息鼓而还。独孤皇后谗于文帝说：“这次出征，高颎本意不欲受命，陛下强迫成行，我早知道会无功而返的。”汉王年少，不谙军事，指挥各事，高颎多不听从，因之衔恨。回京后伪言泣奏曰；“儿几被高颎所杀。”文帝更加气愤不平，欲定高颎之罪。时上柱国贺若弼、刑部尚书薛胄、兵部尚书柳述等五人，联名具状辩其无罪，文帝愈怒，皆付狱吏勘问，自此朝臣莫敢为之辩解，高颎竟因此免官，然仍以公爵之资归家养老。没有多久，文帝与皇后参加秦王杨俊的一次家宴，文帝命人诏高颎侍宴。高颎至后，唏嘘流涕，悲不自胜，皇后亦对泣，左右也为之潸然泪下。高颎自杨坚入宫辅政而引入阁僚，相随数十年，不仅运筹帷幄，而且决胜疆场，平江南，伐高丽，战突厥，定仪礼，立朝纲，隋朝历史的每个环节，无不留下他的辛劳足迹。杨坚引他入阁时高颎说过“纵令公事不成，遭灭族之祸，亦无所惧”的话。可是现在“公事已成”而自己却落个“以公就第”弃置不用的下场，自然是“悲不自胜”而唏嘘泪下。文帝见与会诸大臣为之伤感动情，心虚理怯自我辩解地说：“朕不负公，公自负也。”用“自负”二字，把妒贤嫉能“鲜克有终”的责任全部推诿于高颎。并要诸近侍以高颎为鉴，不要像高颎那样自居功大而要挟君上。他说：“我过去待高颎如子，虽离左右，亦似目前。自他落职之后，完全忘却，好像根本没有高颎其人一样。”这话说得很含蓄，而警告意味甚明。意思是说谁要像高颎一样居功犯上，我就要用“本无高颎”的办法对待他。与其说文帝这次是“召颎侍宴”，不如说是把高颎拿出来当作猴子耍弄一番，以宣示为臣之道。杨坚的老谋深算，令人叹为观止。

不久，又有人告发其子高表仁对高颎说过“司马仲达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的话，有司请斩高颎以正国法。文帝说：“去年我杀了开国功臣虞庆则，今年已斩了王世积，如再杀高颎，天下以我为何如之君。”于是削秩为民。高颎封为仆射入相之初，其母警告他说：“你位极人臣，户盈珠宝。再有奢宠，必致砍头之祸，尔宜慎之！”高颎因之如履薄冰，常恐祸变。及遭此削秩为民之罚，颜色欢然，毫无恨意，以为得免杀身之祸。

炀帝即位，起用高颎为太常。时炀帝极声色之娱，诏收天下散乐，高颎对太乐丞李懿说：“周朝末代君主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怎么能重蹈覆辙呢？”又有人向炀帝密告高颎批评朝廷“殊无纲纪”。炀帝即以“谤讪朝政”之罪下诏杀之。炀帝是夺太子杨勇之位而登宝座的。文帝刚死他就矫诏赐死其兄，还杀尽其兄之子。高颎是废太子的儿女亲家，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其父杨坚都忌其权倾朝野借故削秩为民，炀帝借故诛之，是毫不足怪的。由此可见，炀帝即位起用高颎，是早伏杀机啊！

史称高颎“颇有文武大略”，在隋朝开国元勋中，是最为“明达世务”、

“ 竭诚尽节 ”的一人。他为相以来，即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身系安危的名臣名将，都是高颎所发现并推荐给杨坚的。他当朝执政 20 年，朝野推誉，及遭炀帝之诛，天下无不称冤悼惜。诗云：“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这大概是历代开国功臣所共有的政治结局。

义师蜂起

隋之速亡，是炀帝穷奢极欲的必然结果。他大兴土木，征发民工，大的工程要征役一、二百万人；较小的工程，也要征发一、二十万。男丁不足，征调妇女。农民为了躲避兵、徭二役以保全性命，不惜自残肢体。手足虽残，反而称为“ 福手 ”、“ 福足 ”。他营东都、建西苑，役夫死去十之四五，运尸之车不绝于道。他三幸江都，沿途索贡，以献礼之多寡而决定地方官员升降命运。官吏搜刮，势所必然。昔日俯伏在地的黎民，须臾之间，燃起反隋的怒火。

隋朝末年，义师蜂起，据史家统计，在京畿及关西一带有李弘等 19 支农民起义队伍。在河北（隋之山东）、河南有尉文通等 71 支义军。在东南及长江流域有刘元进等 31 支义军。在岭南有王万昌等 7 支义军。这 128 支义军，河北河南占其大半。盖大河南北，受害最烈；兵、摇二役，征调最繁，农民起义的烈火自然烧得最为猛烈。大业六年（公元 611 年）隋炀帝下诏大量征兵，为进攻高丽作准备。王薄首先在长白山（今山东邹平、章匠县境）发动农民起义，自称“ 知世郎 ”。一时之间，逃避兵、徭二役的农民“ 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 ”。尽管王薄晚节有亏，先降宇文化及、后附农民军窦建德、最后投降唐朝，但在隋末义师中有首先发难之功，这是应予肯定的。

在王薄振臂一呼之下，天下揭竿而起者不可胜数。鄃（音 shū）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蓨（音 tiáo）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豆子𨱗（音 gāng，在山东惠民县境）人刘霸道均高举义旗，反抗隋朝暴政。彰南（今山东武城）人孙安祖，因家乡水急，妻子饿死，本人又服兵役，在同县人窦建德的帮助下，刺杀县令，占据高鸡泊（今属河北），落草为王。窦建德因赞助义军，全家遭官府所杀，只得投奔高士达部下。不久孙安祖死，部下尽归窦建德，于是高士达窦建德二人成为高鸡泊的义军首领，义军有十万之众。

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 年），高士达以窦建德为行军司马，掌握行军作战事宜。建德用计袭杀涿郡守官郭绚，使军势复振，归附日多，隋朝视为心腹之患。同年末，炀帝派太仆卿杨义臣进攻义军主力张金称。金称被杀，残部归附窦建德。杨义臣又乘胜进攻高鸡泊，高士达阵亡，建德招集溃散义军，重组义军队伍，并为士达举行葬礼，大大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义军抗暴的信心。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正月，窦建德在河间乐寿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工，年号“ 丁丑 ”，设置官吏，分治占领的郡县。大业十四年（公元 618 年）十一月，建德定都于乐寿，国号大夏，改元五凤。宇文化及缢杀炀帝之后，引军西归关中，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今山东聊城）生擒宇文化及，俘获大批隋朝官吏、宫室人员。建德下令除宇文化及诛杀外，一律放散。愿去长安投奔李渊、去洛阳投奔王世充、去突厥投奔义成公主者，均派兵护送至辖区之外；愿意留下者，量才录用。后攻克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迁都于此。他劝农桑，恤民力，对河北生产的恢复，农民的安居乐业有积极作用。后与李渊争夺河北的战争中，为其所俘，被杀于长安。

由杜伏威和辅公祏（音 shí）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也很活跃。他们于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参加长白山起义军，同年二人领兵向淮南发展，越战越强。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 年），进军六合（今江苏六合），逼近江都，使炀帝大为惊恐，先派宋颢（音 hào）前去镇压，义军将隋军诱入芦苇荡中，周围放火把敌军全部烧死。大业十三年炀帝又派大将陈稜率领禁军前去镇压。陈稜老成持重，坚壁不战，避其锋芒，挫其锐气。义军采用激将之策，派人给陈稜送一套女人衣服，并称他为“陈姥姥”，诱他出战。陈稜被义军激怒，出兵交战，义军乘机冲入敌阵，把隋军杀得大败，稜仅保性命而逃。杜伏威乘胜攻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占领历阳（今安徽和县），渡江克服丹阳（今南京市），于是控制江淮之间的大片领土，威镇东南，成为一支强大的义军力量。

隋末义军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支，是由翟让、李密领导的活跃于河南一带的瓦岗军。瓦岗军先由翟让领导。翟原为隋东郡（今河南滑县东南）的法曹小吏，坐罪入狱，于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左右，逃往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部）举起反隋义旗。不久单雄信、徐世勣（音 jī）也参加了瓦岗军。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 年）曾与杨玄感起兵反隋而失败的李密，也投奔翟让军中，李密利用自己旧贵族的地位和影响，游说许多小股义军参加瓦岗军，扩大了瓦岗军实力和影响。他还向翟让献策，劝瓦岗军打出鲜明的反抗隋朝暴政的义旗。在李密的谋划之下，瓦岗军迅速地攻占了要塞金堤关，打下了荥（音 xíng）阳和邻近的几座县城。炀帝慌忙派遣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率领精兵两万前往镇压。在李密的策划之下，瓦岗军把大部分兵力埋伏在荥阳大海寺北面密林之中，再由翟让带领小股义军列阵迎战，佯战佯败，把隋军引入伏击圈，伏军四起，隋军伤亡惨重，张须陀亦被义军所杀，从此瓦岗军声威大振。此后在李密的建议下，义军攻占了洛阳附近的兴洛仓（今河南巩县境内）。义军把粮食分给贫穷的百姓，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接着又在石子河（今巩县东南）大败隋军，并在洛口建立了政权。翟让等推举李密为魏公，他自知才能不如李密，拱手让出了义军的领导权。李密知人善任，如名将秦叔宝和程知节，以及唐初名相魏徵等人，都是由他发现和收罗并予以重用的。李密成为瓦岗军的首领后，又陆续攻下回洛仓（在洛阳北）和黎阳仓（在河南浚县）两大仓城，并多次挫败隋朝的东都留守王世充的精锐士卒，使之龟缩于洛阳城中不敢出战。自古以来，共患易，共利难。瓦岗军的巨大胜利，反而激化了内部矛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趋激烈，李密担心翟让会杀他，使亲信在一次宴会上杀掉翟让，造成瓦岗军的大分裂。不久，李密降唐，后又叛唐，被唐军所杀。

隋末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结束了隋炀帝的腐朽统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它给唐初统治以深刻的教训，使之在一段时期之内不敢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压榨，缓和了社会矛盾。它还摧毁了士族门阀制度，打击了官僚特权阶层，为唐初庶族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扫清了道路。

李渊称帝

唐代的开国之君李渊（公元 566—635 年），先世本为赵郡李氏（今河北赵县）。西魏的宇文泰割据关中之后，将西迁汉人的郡望统统改为关陇，借以消弥地缘政治背景的鸿沟，淡化移民的乡土观念，促进汉胡民族的融合，

以巩固根基不稳的割据政权。在更改郡望的潮流中，李渊的祖辈表现出特有的聪明智慧。他不仅否认自己是由河北赵郡西迁的“外来户”，还伪称自己是西凉李暠（音 hào）的嫡传子孙，祖祖辈辈是西狄道（今甘肃临跳）的土著胡人。由于具有这“纯种胡人”的身世，自然赢得宇文政权的信任和重用。李渊祖父李虎，为宇文泰政权的割据立过汗马功劳，官至太尉，是统领府兵的六名柱国之一，死后追谥为唐国公。他的父亲李昞，承袭爵位，在北周历任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这种显赫的家世和“纯种胡人”的血统，为李渊的政治发展开辟了广阔前途。

李渊生于长安。古人称颂历史上的圣君贤相，除了褒誉其功业，还往往称羡其异于常人的生理特征，为其神化和偶像化服务。相传“舜有重瞳”，而《新唐书》则称李渊“体有三乳”。欧阳修、宋祁特记其异，大概以为这就是贵为开国之君的贵异之处吧。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皇亲国威，自然充分享受浩荡皇恩。乳臭未干的李渊，7 岁即袭封爵禄，享受“唐国公”的殊荣。长成以后，历任谯（今安徽亳县）、陇（今陕西陇县）、岐（今陕西凤翔）等州刺史，权重一时。比李渊小 3 岁的杨广，是其表弟，即位后称为炀帝，更把李渊视为自己的股肱，社稷的栋梁。先外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继而迁为殿内少监，复擢升为卫尉少卿。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隋炀帝命李渊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平息杨玄感的兵乱，并兼管关右诸军事务。大业十一年（公元 615 年）又任命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利用他的权势和威望，调和矛盾，绥靖动乱，安定民心。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又委以隋朝军事重镇太原留守的重任。至此，李渊已权倾朝野，身系安危。他自觉羽毛已丰，渐萌异志。于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伺机而起。从此，太原即成为李渊这条潜龙的发迹升腾之地。

隋朝末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在捣毁隋朝的上层建筑、摧毁隋朝有效统治力量之后，农民起义性质的战争逐渐向封建大统一性质的战争转化。各地豪强势力与农民起义队伍合流，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标出发而打出反隋旗号，动摇了隋朝的政权基础，加速了隋朝的覆亡。仅以大业十三年为例，就有梁师都在朔方（今陕西横山西北）、刘武周在马邑（今山西朔县）、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李轨在武威（今甘肃武威）、萧铣在巴陵（今湖南岳阳）与农民义军合流的豪强势力，先后打出志在改朝换代的反隋旗帜，使隋朝社会从西至东，从南到北，沸沸扬扬，危如累卵。在这山雨已来、狂飚怒吼之际，李渊已看到隋朝大势已去，自己没有力量挽狂澜于既倒。与其和隋朝的这条破船一起沉没于反隋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如另造新舟新辟航道化家为国，驶向光明的彼岸。何况他那嗜杀、忌能成性的表弟隋炀帝，这时已对他防范有加，猜忌迭起。就在李渊抵御突厥扰边无功之际，炀帝特遣使者拘捕李渊赴江都问罪。炀帝这一逼上梁山之举虽未果行，但李渊父子已深深感到危在旦夕，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以自保。在李世民“事急矣，可举事”的劝诱之下，李渊于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五月起兵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杀掉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二将，毅然打出了反隋的旗号，迈出了兴唐灭隋的第一步。

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后，迅速做出了富有政治远见的重大决策。他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议和，表示愿意永远结为盟好，并请求始毕可汗派出兵马协助伐隋。这不仅消除了他挥师南下的后顾之忧，还得到外来的兵援，壮大了自己声势。进而招募兵员，制造弓箭，畜养马匹，积极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与

此同时，李渊广泛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地位，争取士族地主官僚的拥护，把自己说成是他们富贵利禄的保护人。他还能“卑身下士”，寻求庶族平民阶层的支持，又把自己打扮成这类人士利益的维护者。李渊这类争取社会人士支持自己的活动，收效很大，在兴唐灭隋的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均得到他们的巨大援助。李渊善于审时度势，利用各种力量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服务。当他挥师南下进攻长安之际，正是李密的瓦岗军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之时。他致书李密，卑辞推誉，虚己待人，约定共同灭隋，共享胜利成果。他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李密的瓦岗军，阻挡东都洛阳隋军的袭击，以利于大军西进，攻占长安。李渊军队于大业十三年 7 月南下，这年 11 月就攻拔长安，进军之快，攻城之速，战果之大，实在令人称羡。这与瓦岗军从侧翼保护，阻挡隋军的袭击和增援是密不可分的。

李渊占领长安以后，本可以立即称帝建国，制定法统，君临天下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从有利于兴唐灭隋的战略高度，十分策略地处理诸多棘手的政治问题，又一次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李渊自己不仅没有称帝，反而将隋炀帝只有十三岁的孙子、时任西京（长安）留守之职的代王杨侑立为傀儡儿皇，称之为“恭帝”，改元“义宁”。不仅如此，他还遥尊身处江都的表弟隋隋炀帝为“太上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意有三：一是拥立恭帝，使对立的政治、军事势力，找不到向他兴师问罪的借口，而自己又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二是恭帝虽为傀儡，但可用他来树立尊隋的正统之名，宣扬忠君的人臣之义，借以招纳隋朝的旧吏，收降各路叛军，安定海内民心。三是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是用自家人打自家人的合法手段，取消隋炀帝作为一国之君的合法皇位，搬掉李渊称帝途中的巨大障碍，让炀帝吞下无可奈何的政治苦果。李渊攻拔长安后的这种种举措，收到了巨大成效。控制了敌对政治势力、巩固了已得政治成果、为最后全面夺取政权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大业十四年（公元 618 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缢杀，这一巨变给李渊全面夺取政权创造了良机。五月恭帝杨侑禅让皇位，李渊三让而称帝，改国号为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立长子建成为太子。以次子李世民为尚书令，封秦王。封四子元吉为齐王。经过一段时期的东征西讨，终于四海一家，天下一统。

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长安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杀死亲兄太子建成，亲弟齐王元吉，并诛戮两家亲眷僚属多人，事后还迫使高祖李渊交出皇权。历史上称这次宫廷政变为“玄武门之变”。

高祖李渊有子二十二人，长子皇储建成，次子秦王世民，四子齐王元吉，均为窦皇后所生。这三人虽有同父共母的骨肉亲情，而彼此间却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考其致恨之因，实由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起。李渊龙子虽多，而佼佼者忒少。只有次子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文韬武略，聪睿过人，确具“济世安民”之才干。隋大业十年（公元 614 年），突厥围困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应募驰救，就表现出超人的胆略。一个才满 16 岁就初出茅庐的后生，居然献出疑兵之策，解雁门之围。此后，在李渊统一

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屡建奇勋，功居诸子和众将之首。他首光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接着又打退了借助突厥势力进攻河东（今山西水济西）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又打败窦建德，摧毁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出降，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当他平定东都洛阳班师凯旋的时候，披金甲、乘骏马、率铁骑、囚敌俘献于太庙之前，真是如日中天，风光不可一世。以致高祖李渊认为李世民功劳太大，旧时官爵不足以酬赏，“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众王公之上。李世民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和皇太子李建成形成强烈反差，无疑对建成的太子地位构成巨大威胁。高祖李渊确曾数度想废掉太子建成而以李世民相取代。在太子地位行将丧失之际，李建成与李元吉外结小人，内连嬖幸，淫乱上宠，同恶相济，务以除掉秦王李世民而后安。李建成乃私募四方骁勇之士及长安恶少 2000 余人，畜为宫廷甲士，分别屯驻在长林门（东宫门）左右，号为“长林军”。又命可达志招募突厥散兵游勇 300 人藏匿东宫之内，作为攻击李世民兵力中的中坚力量。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 7 月高祖李渊驾幸仁智宫（今陕西宜君县），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李建成认为时机已到，先令庆州（今甘肃庆阳）总管杨文干招募健卒送长安备用，继之遣部将尔朱焕、桥公山二人持甲赠送杨文干，令其在庆州起兵与长安互为呼应。朱焕、公山二人行至邠州惧罪，将此谋驰报巡幸仁智宫的李渊，才挫败李建成所策划的矛头针对李世民的兵变。这次事变之时，李渊废立之意似乎已定，他对辞行而去平息杨文干兵变的李世民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还谈到如何处置太子建成的问题：“吾不能效隋义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蜀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惜乎高祖此议事后并未实行。在元吉及高祖的四位宠妃的游说之下，复令建成还京居守太子之职，仅责其不容兄弟之过。

李建成以武力诛杀李世民的阴谋败露之后，又与李元吉共谋欲以毒酒鸩杀秦王。他们邀李世民夜饮，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胸中暴痛，吐血数升，幸赖淮安王李神通扶归西宫救治才保存性命。此事发生后李渊往西宫视疾时，再次宣布了处置“兄弟阋墙”的办法。他对李世民说：“当年困居晋阳时，是你决定起兵反隋的谋略，在南征北讨统一天下过程中，又是你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兴邦建国之时我决定立你为太子以继承皇统，而你却坚辞不受，我只好让建成为皇储成全你的令名美誉。建成居东宫已有多年，我不忍废他而立汝。但我知你兄弟二人同置京城，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只好让你回到陕东道大行台任上，住在西京洛阳。自陕西往东的广大地域，归你管辖，亦建天子仪制，君临半壁江山。”李渊显然以和事老的身分，不偏不倚的手法，将唐朝天下一分为二，使其各霸一方，睦邻相处，无事相安。而他这位太上皇也就可以得到比诸侯朝觐周天子更为光荣的礼遇。这种想法，近乎天真。就在李世民即将成行之际，建成、元吉又耍弄阴谋。他们害怕李世民得到分封的土地，拥有自己的甲兵，必后患无穷；若夺其权柄，羁縻于京师，匹夫其身，则无后患之忧。于是他们鼓动亲信，散布流言，游说高祖。谎称世民左右皆为山东豪俊，闻说东迁洛阳，均欣喜若狂，察其形迹，似乎另有图谋。在建成、元吉的蛊惑之下，高祖果然搁置了世民在西京“建天子族旗”之议。建成等又赢得一个胜利回合。

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突厥寇边，抢掠民财，焚毁民舍，战警驰报长安，建成举荐元吉率师北讨，欲乘元吉兵权在握之时，诛灭秦王世民势力，

以杜后患。为了削其羽翼，损其实力，元吉先奏调秦王名将尉迟敬德为先锋，继又奏调秦王精锐士卒以充实军力。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劝秦王早图自全之策。李肚民犹豫未决之时，率更丞王晊（音 Zhì）又报，元吉与太子合谋在明日昆明池宴会饯行之间杀戮秦王，太子逼宫继位，即立齐王为太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民才进宫禀奏建成等人的害己图谋，并揭露二人私通妃嫔，淫乱后宫种种不肖之举。高祖闻报震惊，答应在明日早参之时，彻底追查事实真相，以惩元凶。孰料秦王的奏闻，当夜便由张婕好密报太子。建成、元吉原拟用“请勒宫甲，托疾不朝”之策以自保；后又觉得“托疾不朝”等于是默认李世民所奏是实，又不能察知高祖的处置态度，自己又无抗辩的机会，故二人决定明日仍进宫早朝，以观其变。

六月四日这天大早，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于玄武门之内。当天守卫玄武门的领班将领名叫常何，原系太子李建成安置于此的心腹将校，后被李世民收买而改换门庭。建成不知其变，犹恃以为护，故松懈无备，和元吉由玄武门昂然而入以朝见李渊。二人走到临湖殿前才发觉情景有异，气氛反常，乃反身逃遁，欲奔入东宫。李世民尾随而呼之，元吉张弓三射而未中。秦王还射，一箭射毙建成，再箭射伤元吉，尉迟敬德上前割下二人之首，以戟挑示于宫门之外。东宫和齐王府将士闻讯赶来，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李世民一面组织随行士卒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带甲士入宫，逼迫高祖李渊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亲笔诏命。一场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才告结束。建成死时只有 38 岁。他的长子太原王李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李承道、三子何东王李承德、四子武安王李承训、五子汝南王李承明、六子矩鹿王李承义均因建成之连累而遭杀戮。

6 大以后，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李渊被迫禅位，自称“太上皇”，从此退出唐朝政治舞台。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开辟了唐朝历史的新纪元。第二年（公元 627 年），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是从贞观元年开始，二十三年结束，历史上称之为贞观时期。李世民登基之前，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所以在继位之后，能够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故后世称誉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还称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因此，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视为封建社会的“治世”和“盛世”，总体看来，这一评价是比较允当的。

贞观年间的“治”和“盛”，是唐太宗实行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治国措施的直接结果；是他的政绩卓著的具体表现。

唐太宗能够虚怀博纳，从谏如流。在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善于采纳众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的君主。魏征原是太子建成僚属，太宗重用并视为肱股。一次太宗问魏征，做为一国之君，怎样才算“明”，怎样才是“暗”呢？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要唐太宗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下情得以上达，避免“偏”和“暗”的弊端。魏征和太宗讨论问题

能直言进谏，面折廷净，即使引起了太宗盛怒，也毫不退让。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宫，愤愤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他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在朝臣面前侮辱他，实在受不了。长孙皇后祝贺他说：“主明臣直，主暗臣曲。魏征忠直敢谏，足见您是一位明君啊！”魏征病逝，太宗痛哭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去，我失去一面镜子了。”在和萧瑀的谈话中，他还用识别弓箭的故事来说明“兼听”的重要性。他说：“我少时喜欢弓箭，觅得硬弓十多张，以为是天下最好的。近来给一工匠鉴别，判明都不是好弓。问其究竟，则称木心不直，脉理自然歪邪，弓虽硬，箭道不直，中的甚难。我数十年来以弓箭定天下，却不真懂弓箭。天下之事千差万别，我怎能都了解呢？只有‘兼听’才能治好国家。”唐太宗就是在这种虚怀博纳的情况下，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

太宗还能举贤任能，“量材器使”。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前事何人，均招致幕府，为其所用。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高参，建成死后，太宗责问他：“你设谋离间我兄弟手足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魏征回答说：“皇太子若听从我的谋略，必无今日杀身之祸。”太宗不记旧怨，即位后便封他为谏议大夫。王圭原为世子府谘议参军，建成为东宫太子，任为中书舍人，中允等职，极得建成信任。建成被杀之后，太宗立即封他为谏议大夫，引为心腹之吏。尉迟敬德，是一员虎将。太宗统一全国的战斗中多次相互拼杀。武德二年尉迟敬德与秦王战于相壁，在宇文士及的劝说之下，他与另一名叫寻相的末将一同投降。不久寻相叛变，众将疑尉迟敬德亦会发乱相应，将其囚禁，看守甚严。太宗独持异议，认为敬德若叛，早和寻相一起跑走了。他仍留此，是其不叛的表现，亲释其缚，并引至卧室私谓曰：“你若想离开我；我不阻拦。君子之义，以诚相待。”并赠以金银，作为离他而去的生活之资。尉迟敬德不仅没有离开，就在当天和王世充的遭遇战中，斩将搴旗，立功甚伟。众将无不赞美太宗的知人善任。

唐太宗还采取了许多有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从贞观元年开始的 3 年时间里，关中、关东各地持续发生水、旱、虫灾。而关中的灾情最重，百姓无以为生，以卖儿卖女来养活自己。他当即采取措施，一方面开仓赈救，一方面让灾民到非灾区就食。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太宗还命朝臣拿出御库金银钱帛，为灾民赎回因灾荒而卖掉的子女，归还其父母，是极得人心的安民之举。与此同时，他下达诏书，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淳厚民风，轻徭薄赋，极力缓和各种矛盾，创造一种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发展生产、巩固政权服务。在对外关系上，既采取积极防御策略，抵抗北方突厥族的不断掠夺和骚扰；又修文偃武，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战争。他平定东突厥之后，广设羁縻州府，安置降众，不仅消除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被北方各族尊之为“天可汗”。唐太宗还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使汉藏民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此外，他审立法令，要求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认为“法令数变，则吏得为奸”，给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他反对严刑峻法，认为官府如能做到“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但另方面；对真正的坏人又反对纵奸养恶。他说：“赦放小人是君子之不幸。”他常从不嫉妒别人之善、弃短扬长、敬贤而怜不肖、尊重正直之士等方面反躬自省。

贞观后期，唐太宗在纳谏、用人、轻徭、薄赋等方面没有做到“慎始如

终”。尽管如此，“贞观之治”还是和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相映生辉，是封建社会中的盛世。

唐玄奘西行求法

“唐僧取经”的故事，被明代义学家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予以虚构渲染之后，已是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文学形象取代了历史真实。唐僧求法的真实历史，则知之者甚少。

玄奘，俗姓陈，名祎（音 huī），洛州缑（音 gōu）氏（今河南偃师缑镇）人。家境贫穷，父母早丧，13 岁出家为僧，20 岁在四川成都受“具足戒”（小乘佛教的第四级戒律），曾游历各地名山宝刹，拜谒佛界名师，潜心研练佛学理论。他先后从唐代高僧慧休、道岳、法常、僧辨、玄会等学习佛教理论，造诣日深，誉满中土，成为“法相宗”的创始人。

玄奘通过长期佛学研究，深深感觉到佛学理论众说纷坛，解家丛出，莫衷一是。特别是当时佛学界讨论的热点——“法相”，摄论、地论两家解释各不相同，对佛学的深入钻研带来巨大困惑。造成分歧的原因与汉文佛经翻译不确切、不完整大有关系。因此，他产生了去天竺（印度）访求真经，认真研译，会通佛学中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的念头。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玄奘来到长安，邀集佛门好友数人，向唐太宗上表陈情，申请出国。但由于突厥连年扰边之患，禁止私人出境，没有批准他们的出国访经求法的要求。其他佛友打消西访念头，云游各地，而玄奘西行求法的理想丝毫未变。这年 8 月，玄奘决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从长安神邑出发，杂在返回西域的外来客商之中，混出玉门关，然后独自西行，寻找他的理想世界。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国都（今新疆吐鲁蕃境内），受到高昌王的隆重礼遇。然后涉过玉门关外的 800 里流沙，从天山南路横越新疆全境，再由葱岭北端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穆素尔岭，渡过中亚的乌浒河流，折向东南方向，登上帕米尔高原，通过阿富汗境内的达克山天险，于这一年的夏末秋初，到达了天竺的西北部地区。他在这一带地区访经游学，考察民俗，游览佛教胜迹，前后度过了 4 年时间。他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僧人学习了《经百论》、《广百论》。又在印度北部的菲罗兹布尔从毗腻多钵腊婆学习《对法论》、《显宗论》。还在印度北部的贾朗达尔从施达罗伐摩学习《众事分毗婆沙》等经论。贞观五年（公元 613 年）末，玄奘去印度比哈尔邦南部，当时称之为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其当家和尚（称为“住持”）名叫戒贤，乃当时天竺佛学的最高权威。玄奘到达该寺的那一天，寺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并有 1000 多名僧俗人众手捧鲜花，头顶香烛，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高僧。玄奘当天就晋谒戒贤法师，并拜他为师学习佛教理论。100 多岁的戒贤，很久以来没有给僧徒讲授佛学理论，为了让西天的佛学东传，高兴地收下玄奘为弟子，并用 15 个月的时间，给玄奘讲解了天竺最难懂的一部佛经《瑜伽论》。为了答谢戒贤法师的着意栽培，玄奘废寝忘食地勤奋学习，接受了他的衣钵真传。访经求法的同时，玄奘在生活上也受到该寺的特别关怀，每大供应担步罗果 120 枚，豆蔻 12 颗，槟榔 12 颗，龙脑香 1 两，还有专供国王和佛学权威食用的“大人米”一升。住的也是最高级的僧房，外出乘坐只有戒贤法师才能乘坐的由大象驮行的轿子。那烂陀寺共有 1 万多名僧人，

享受这类特等待遇的包括戒贤在内只有十位。玄奘在这里呆了五年，学完了《瑜伽论》以后，戒贤又继续给他讲授了《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佛学理论，同时还广泛地阅读了各种婆罗门教经典著作。在当时那烂陀寺 1 万多名僧人中，除戒贤能通晓全部经论外，通晓 20 部的有 1000 人，通晓 30 部的有 500 人，通晓 50 部的只有 10 人，玄奘则是这十人中的一个，所以在寺里被选为通晓“三藏”佛经的“十德”之一。玄奘的佛学理论虽有这么深的造诣，但他并不满足。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他辞别戒贤，离开厂那烂陀寺外出游学，想学到更多的佛学理论。他先到了今天的孟加拉国境内，访问了著名的艺术宝库阿施（音 zhān）陀石窟，然后又到了今天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查谟地区附近住了两年，研习这一地区的佛学经典，于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回到那烂陀寺。

玄奘回到那烂陀寺以后，戒贤让他主持寺里的佛经讲授工作。曷（音 hé）利沙国君主戒日王崇信佛教，提倡佛教各派争鸣。当时有一名反对那烂陀寺教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夸说无人驳倒其中的一个宇。戒日王把论文转交给戒贤，并决定在都城曲女城举行辩论大会，还特别邀玄奘参加辩论。贞观十六年（公元 642 年）十二月开始大会辩论，与会者有天竺的 18 个国家的国王，有佛教徒 3000 余人，婆罗门教徒 2000 多人。玄奘担任主讲，他用梵文写了一个驳论，与正方辩论了 18 天，各个教派的参加者均被玄奘的精辟见解，严密的论证所折服，维护了那烂陀教的理论，驳倒了异教的挑战。戒日王特别接见玄奘，奖励他金钱 1 万，银钱 3 万，僧衣 100 领，他都一一谢退。戒日王无法表达他对玄奘的崇敬之情，只好请他骑着装饰华丽的大象在国中游走一周，以表达他对来自中国的佛学大师的诚挚情意。

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玄奘表示要回国，当时天竺僧俗群众都不愿意他走。一位天竺国王表示，只要玄奘不走，可以为他修建 100 所庙宇。无奈玄奘心怀祖国，挂念长安，戒日王只好放行。朋友赠送礼品甚多，他一一谢绝。动身回国那天，戒日王、鸠摩罗王以及当地僧俗群众填塞道路，相送数十里才依依惜别。

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用牲口驮着 650 多部佛学经典，从西域回到阔别 18 年之久的长安。唐都京城欢迎他的归国竟“道俗奔迎，倾都罢市。”张灯结彩，盛况空前。唐太宗在洛阳行宫专门召见了他，并听取了玄奘四行求法经过的介绍，询问了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并劝他还俗出任大唐官职，被玄奘婉辞谢绝。这年的三月一日，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当即开始他的佛经翻译工作，先后在长安的弘福寺和慈恩寺开办了佛经译场，并在慈恩寺修建大雁塔用来储藏佛经，建筑了我国最早的佛学图书馆。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了 20 年，译出佛经七十五部，1335 卷，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空前之举。还撰写旅途见闻录式的《大唐西域记》，其中记载了他亲身经历过的 110 个国家和听说过的 28 个国家的有关情况，对当时各国的方位、距离、疆域、人口、风情、名胜、史迹等等均笔之于书，是今天研究这些地区的可靠史料。该书现已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玄奘还把中国的古代文化传到西域各国，他曾把道教经典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入印度。玄奘于龙朔二年（公元 663 年）二月圆寂于长安，享年 62 岁。玄奘不仅是一位佛教高僧，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伟大的旅行家、中国和印度人民友谊的传播者，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成公主入藏

吐蕃，乃藏族的祖先，是一个以游牧为主兼事农耕的民族，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一带地方，素以性格剽悍勇敢善战著称。强雄的男子称之为“赞”，成年的丈夫称之为“普”，部落首领称之为“赞普”。赞普之妻称为“末蒙”。民族性格中尚武精神特别突出，崇敬战斗英雄和阵亡将士。某户人家若祖孙几辈均有阵亡纪录者，则列为甲等门户，以褒扬其勇武。若有在战斗中怯懦退缩之徒，则强迫在他的帽子上缀一条狐尾，讥笑他像狐狸一样胆小，以示惩罚，视为懦夫。隋唐以前，族内派系甚多，部落间时分时合，兼并战争不断，和中原各族往来甚少。隋唐之后，统一之势渐明，与中原各族的交往也比较密切。

隋唐之际，即公元七世纪前期，吐蕃族出现了一位杰出领袖名叫弃宗弄赞，西藏的佛教史则称之为松赞干布，后来的历史文献均用此名。他年纪很轻就当了赞普，性格骁勇，足智多谋，勇敢善战，带领他的部下，用武力征服青藏高原的许多部落，连实力与之相等的羊同国（有大小二羊同国）也俯首归顺，其余较小的部落无不影从，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成为青藏高原各部落的霸主，以逻些（今拉萨）为首都。那时内地正是唐太宗贞观时期，声威远震，万国朝宗。而松赞干布又素慕唐朝的文化，景仰唐朝的文明，于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派遣首批使者来到长安，唐朝亦遣冯德遐回访吐蕃，成为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开端。此后，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来长安朝贡，欲效吐谷浑及突厥之先例，娶唐朝公主为妻，唐太宗没有允许。使者回到吐蕃谎称：“初到长安，唐朝十分优待，允许通婚。正好碰上吐谷浑国王入朝，在唐太宗面前离间我们的关系，遂罢通婚之议。”松赞干布闻之甚怒，与羊同等部落连合出兵，攻击吐谷浑。吐谷浑招架不住逃至青海。吐蕃攻击党项及白兰两个部落之后，屯兵 20 万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县）之西，遣使送金银币帛至长安，声称是娶公主的聘礼。由使者传话威胁说：“若大国不嫁公主，当即进攻内地。”这种以重兵逼嫁，胁迫成婚的无礼要求，自然遭到唐太宗的反对。不久，松赞干布果然率兵进攻了松州。唐太宗当即遣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兵 5 万分四路合击，斩首千余级，松赞干布大败，引兵遁逃，遣使谢罪，复求婚约，唐太宗这次才答应通婚的要求。

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松赞干布派遣他的大相（职同宰相）禄东赞送上黄金 5000 两，珠宝数百件到长安聘婚，唐太宗答应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相传唐太宗在答应之前曾经“五难婚使”。五件难事之一就是要使者认出百匹母马与百匹驹马的母子关系。这意味深长的难题含意婚使心领神会，即汉藏两族通过公主出嫁要建立永久的母子亲情。据说禄东赞运用吐蕃人丰富的牧畜经验，将母马和驹马分别圈起来，并暂时断绝驹马的饮水和草料，过了一两天之后，把母马与驹马同时放出马厩，顿时出现了母觅子，子寻母，母子偎倚一起的动人景象。禄东赞就这样地一一解决了五个难题，唐太宗十分高兴，允许他立即迎娶文成公主入藏。唐太宗对文成公主出嫁西藏之事十分重视，不仅为她准备了很多妆奁，其中包括诗文、经史、农事、医药、天文、历法等书籍，还有谷物、蔬菜、果木种子以及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除此之外，还带去了各种技术工匠和一支宫廷乐队。当时唐朝盛行佛教，文成公主是一虔诚佛教信仰者，所以还带去了一尊佛像。

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率领侍从和卫队从拉萨前往柏海（今青海的鄂陵湖和札陵湖区域）等待，然后再到河源（今青海兴海县一带）迎接。松赞干布拜见李道宗，恭谨地奉行子侄之礼，不断叹服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之间均表现出一种愧沮之色。与公主回到拉萨之后，举行了盛大婚礼。松赞干布对自己能娶文成公主为妻十分高兴，他说：“我的父祖辈没有一个人能和上国通婚，我能娶大唐公主为妻，深感荣幸，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在公主到达西藏之后，命人仿照唐朝建筑模式修造一座宫殿式的建筑给她住，真可谓是“金屋藏娇”。

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把唐朝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了西藏，和松赞干布同心协力发展吐蕃的经济和文化。当时藏族没有文字，记事用绳子打结或以木刻划记号来表示。在文成公主的主张下，松赞干布派人进行专门研究，创造了 30 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结束了藏人无文字的历史，从此汉文书籍可以译成藏文，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西藏过去无完整的历法，以麦收的季节（约为夏历三月）作为一年的开始。文成公主入藏后推行夏历制，大大便利了藏族历史文化的纪年和著录。文成公主带去的宫廷乐队，丰富和繁荣了藏族的民间音乐、提高了藏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她带去的许多工匠使藏人深得其利，从此藏民掌握了汉族的先进工艺技术，推广了汉族的农业生产工具，大大发展了藏族的农业生产力。文成公主带去的各种植物种子，也在西藏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实，改变了藏民的食品结构，丰富了藏民的食物品种。文成公主信佛，松赞干布在她的影响下，大力提倡佛教，还特地在拉萨修了大昭寺，这对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影响之大，的确难以估量。在文成公主的倡导下，松赞干布不断派人到长安留学，学习汉族优秀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还聘请汉人到西藏掌握文书，传授知识。此后唐朝又不断送去蚕种，帮助发展养蚕事业。送去酒曲，派人帮助发展酿酒事业。还有碾磨、造纸、造墨等等，也派专人传授。文成公主本人还亲自传授了刺绣、纺织的技术。松赞干布本人对文成公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在她入藏之前，藏人喜欢用一种矿物赭石的色彩涂面，公主讨厌这种化妆品，使人面目可憎，松赞干布马上下令全国禁止使用赭石涂面。公主喜穿汉族轻质的纨绮服装，松赞干布也就脱掉传统的藏民皮褥毡裘，身着丝绸服饰，真是做到了妇唱夫随啊！

文成公主入藏，对加强汉族和藏族的往来，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藏族人民至今在布达拉宫里还安置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还保留了二人结婚时的洞房遗址，西藏民间还广泛流传歌颂文成公主的民歌，歌颂她给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公元 624 年—705 年）名曌（音 zhào），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她的父亲武士彠（音 huò）是一个善于攀附钻营的人物。原是经营木材的商人，以从商之道从政，在隋朝末年充当鹰扬府的队正，跻身封建上层社会行列。当隋朝政权朝不保夕的时候，他又改换门庭，和李渊一道起兵反隋，同至长安，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溢封“应国公”。武士彠的这种发迹史，对武则天的为人处世不无影响。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

十四岁的武则天选入后宫，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习称“媚娘”。以“美容止”，“素多智计，兼涉文史”之身侍奉李世民十有一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太宗驾崩，其嫔妃视为圣物，依例必须削发为尼，不许再度婚配。武则天无可奈何地到感业寺（供奉太宗灵位之处）出家，从此遁迹空门，朝夕焚香念佛。25 岁的武媚娘，在媚无所施的情况下，万念俱灰，虽生犹死，终日饮泪吞声，成为太宗活着的殉葬品。所幸昔与东宫太子时已登基的高宗李治感情甚笃，重温旧好，这才使陷入绝境的武媚娘脱离了苦海。

高宗李治与武媚娘重逢叙旧，乍看事出偶然，究之实存因果。李治为太子时，就与武媚私情甚笃。太宗忌日，李治到感业寺行香不期而遇，旧情萌发，相对嘘唏。忌日在感业寺行香，这是一个严肃、虔诚、神圣的场合，高宗李治想的应是如何慎终追远，缅怀先帝传国之宏恩，不应顿生邪念，和武媚卿卿我我对泣于神龛之前，实在有失体统。高宗与武媚在感业寺对泣之事，迅被王皇后得知，她不仅没有给二人设置障碍，并令武氏暗中蓄发，劝说高宗纳之后宫。看来颇觉离奇，实则王氏离间高宗与萧妃之计。原来皇后无子，萧妃因子贵而得宠，废立之举迫在眉睫，这就是武媚能得皇后之助顺利进入后宫的原由了。武媚于永徽五年（公元 654 年）复入后宫，“卑辞屈体以事后”，以报答王皇后的知遇之恩。俗话说母以子贵，武媚由于在感业寺出家为尼时即为高宗产下了龙子，所以入宫之后所得宠幸更远胜于萧妃。王皇后深悔引狼入室，又与昔日情敌萧妃联合起来共揭武媚之短高宗不仅不为所“惑”，反而册封武媚为“昭仪”。武媚就是在这种有恃有宠的情况下，于永徽六年展开了夺后之战。她首诬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以巫祝的“厌胜”之术诅咒自己，挑起高宗的恶感；继之以其女暴卒之事，诬为皇后所害，借以丑化皇后母仪天下的形象，以坚高宗废后立己之决心。在这两个回合的打击之下，王皇后地位岌岌可危。正当高宗废立犹豫之际，中书舍人李义府“先意希旨”迎合高宗，上表陈述废后之议，于是在朝中掀起了一场废立之争。代表山东大贵族集团利益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以武氏既非名门望族又“经事先帝”为由予以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等为代表的庶族新进官僚则表示支持。许敬宗向高宗陈述己见说：“一个田舍翁若多打了几斗粮食，也想将原有的丑媳妇换个漂亮的老婆，何况一国之君的废旧立新之举呢？”主张废立之议起决定作用的人是李勣。一天，拥有重兵的元老重臣李勣入朝，高宗问以废立之事，李勣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巧妙地提醒高宗：“这是皇上的家事，无须询问别人；别人也无权说‘可’与‘否’。”这就有力地支持了高宗的废立之议。高宗心里明白，朝野反对武媚为后，主要不是嫌她门第低微，是因她“经事先帝”。于是在立武后的诏书中告知天下：高宗作为太子时而与武氏相识；武氏行为端庄，有母仪天下的品德；先皇鉴于武氏品德高尚，仿效汉宣帝赐宫女王政君给太子为妃的先例将武氏赏赐给我了。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冬十月武则天得以皇后身份进入李唐王朝最高统治行列，为实现她的称帝理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武则天初立为后，即大肆诛灭异己。原后王氏原妃萧氏是首要诛灭对象。她将王萧二人各杖一百囚于别院，后又借故施以酷刑。断其手足，浸泡在酒瓮之中，刑称“骨醉”，死后又拖出斩首，并改称“王氏”为“蟒氏”，“萧氏”为“枭氏”，以泄内心之忿。第二批诛灭对象是反对立她为后的元老重臣。显庆二年（公元 657 年）她指使许敬宗、李义府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勾结褚遂良谋反，这年 8 月贬韩瑗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刺史，贬来济

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贬褚遂良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褚遂良等人遭贬之后，武则天要打击的对象是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乃山东贵族首领，又是国戚，并是先帝托孤的顾命大臣，处置此人实非易事，乃阴令许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恰好有一个名叫李奉节的洛阳人密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结党营私，许敬宗逼他承认与长孙无忌谋反。由长孙无忌“谋反”事又扩大打击范围，攀连牵扯到褚遂良、柳奭、韩瑗三人有鼓吹煽动之罪。显庆四年（公元659）四月贬长孙无忌于黔州（今四川彭水），7月令人逼迫长孙无忌自缢，并斩杀柳奭、韩瑗。武氏进行的大规模整肃清洗诛灭异己的工作，计罢斥了20多位反对他的官员，并提拔了李义府、许敬宗等新贵，从而牢牢地控制了朝廷大局。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冬十月高宗李治健康恶化，“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将朝廷的一切奏章让武后处理，这是武氏公开参预朝政的开端。不久，高宗大权旁落，内心充满恐惧与不安，深感放权易收权难。特别是高宗的一切行动都被武后控制感到十分不满，乃密诏西台侍郎上官仪商议对策，命他起草废武后之诏。事情为武后所知，诬上官仪与前太子李忠等犯下“谋大逆”之罪于当年12月处死。此后对高宗的控制更为严厉。高宗上朝视事，武后必垂帘听政于后，事无大小必经武后首肯方可施行，升、降、生、杀大权，均由武后决定。当时朝臣称高宗与武后为“二圣”，即两个皇帝的意思。

高宗为了保住李唐皇系，想禅位给太子李弘，以削弱武氏的权势。李弘乃武则天所生长子，虽有母子亲情，但李弘之立对她不利，私以毒汤药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让李贤监国，武则天又废李贤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高宗病死，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分临朝执政。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又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帝，称为睿宗。这种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在朝野之间引起巨大不安，一场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便公开化了。嗣圣元年（公元684年）“皇唐旧臣”徐敬业等人以拥戴中宗为号召，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大，在朝廷内得到“受遗老臣”宰相裴炎的呼应。武则天迅速派30万大军讨平徐敬业，并处死裴炎和为裴炎辩解的武卫大将军程务挺，武则天又取得称帝前的重大胜利。在武则天称帝代唐之势十分清晰的情况下，李唐皇族被迫孤注一掷。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琅琊王李冲在博州（今山东聊城）、越王李贞在豫州（今河南汝南），相继起兵反武，前者只有七日，后者也不过二十天即被武氏派兵平息。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67岁时，以睿宗为首的6万人联名拥武则天为帝，改国号为“周”，习称“武周”，改元“光宅”，而她自己则更名为“曌”（同“照”）。

武曌登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持新贵集团，提高其社会地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高宗时代，武曌曾下令重修《氏族志》并更名为《姓氏录》，把后族列为第一等级，其余一律以官阶高下分为几等。据此，一个普通士卒出身而升至五品官阶者，亦可列为士族，跻身于世家大族行列之中。这种《姓氏录》受到庶族阶层的拥护，却遭到旧贵族的反对。为了压制旧贵，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网罗新进人才。在太宗贞观23年之中，只选拔进士205人，而高宗武后统治的55年之中，所选进士多达1000多人。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曌亲自策问举子，表示敬重人才，以笼络天下文士，从此开创了中国科举史上“殿试”的先例。此外，她还进行武举考试，选拔将才。

武周以前，地方向朝廷进贡的清单上，方物列在前，举荐的贤良列在后。武曌登基后，则倒过来，先人后物，以示对贤良的尊重。除地方荐贤之外，还允许自荐。她在洛阳铸了四个铜匦（间 gu ī），其中“延恩匦’，即鼓励文人将诗文投入以自荐，有真才实学者，照样可以录用。对于有能力的官吏，皆予重用。由科举出身的狄仁杰，高宗朝做过大理丞，一年之内把积压下的一万多件旧案，处邢得公正妥帖，受到朝野称颂。武曌执政后，两度出任宰相，提过许多批评和建议，为巩固武周政权有巨大贡献。武曌一方面任用贤吏，另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她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奖励密告，滥杀无辜，除诛灭李唐宗族及元老重臣外，还滥杀了大批中下级官史和平民百姓。

武氏在位期间，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在嗣圣元年（公元 684 年）提出地方官吏考核政绩标准，凡做到耕地增亩、粮食增产，就有奖励；凡使原有户口减少、土地荒芜、粮食减收的则予惩罚。故此，在武周统治时期，社会经济仍呈现发展趋势。武氏登基之前，唐朝只有 380 多万户，至她退位的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人口增加到 615 万户。总的说来，武则天是封建社会中一位女政治家，在“纳谏”和“用人”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杰出。

酷史来俊臣

武则天从徐敬业发动兵变之后，就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加强特务统治，以巩固武周政权。武则天奖励告密，州县有上京告密之人，沿途官吏要派遣车马相送，管理食宿接待事宜。所告核实之后，轻赏则赠金帛粟米之类，重赏则授官封爵，光耀门庭。武则天通过酷吏对抱有反抗意图的李唐宗室、山东贵族和在朝官吏进行严厉镇压，先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接着又杀戮大臣数百家，至于杀害中下级官吏及黎民百姓，就多得无法统计了。她任用的酷吏甚多，其中尤以来俊臣最为残暴狠毒。

来俊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他的父亲来操，是一个嗜博成性的赌徒，和同乡蔡本二人聚赌为生，关系极为密切。在一次赌博之中，蔡本输给来操数十万钱而无法偿还，就将自己的妻子给了来操抵债。蔡妻易夫之前，已怀孕数月，来到操家，其子即呱呱坠地，并以来为姓，即后来的酷吏来俊臣。俊臣生来天性残忍，喜怒无常，游手好闲，不务正事，以闯荡江湖为业。他流窜和州（今安徽和县）之时，偷扒劫抢，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犯罪之后被逮入狱，狡诈善变，诡谲异常，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对他审究多时而无法定罪，乃杖责一百，放出狱门。来俊臣的这次牢狱之灾，没想到却是后来的福兆。天授年间（公元 690—692 年）东平王李续在武则天清洗李氏宗党中被杀，来俊臣抓住机会向武则天鸣冤诉屈，谎称在和州下狱实由告发东平王谋反之事而遭受的打击。武则天亲自召见来俊臣，慰其忠义可嘉，赏赐甚厚，授以朝官，后累升为侍御史，加朝散大夫，负责审理朝廷钦犯。官吏中稍有与他意见相左者，即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前后经他诬杀者有 1000 多家。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升为左台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侯思止、卫弘义、郭霸、李仁敬，司刑评事康䛒、卫遂忠等酷吏，同恶相济，残害无辜，使朝臣人人自危，见面不敢交谈半语，到了“道路以目”的恐怖程度。他们招集数百名市井无赖，分布全国各地，侦察官吏动向，认定某人有可疑之迹，则罗织罪名，共同告发，众口一词，事状均同，使朝野上下莫辨真伪。

而且所有状纸都吁请来俊臣审理。并称只有他才能“秉公”决案，查出实情。故此武则天对来俊臣的勘狱之功十分赞赏，特在京城丽景门设置审讯机关，名之为“推事院”，由来俊臣主持一切审讯事宜，时人戏呼“丽景”为“例竟”，谓入此门之人例皆无生还之望。来俊臣为了有效地罗织罪名，诛灭异己，和党徒朱南山等酷吏共同编撰了一部《告密罗织经》，相当于今日特务行动手册。书中写明若要陷害某人，应如何罗织罪状，如何上下左右侦察，由谁首发其罪，由谁组织呼应等等。总之，任何人一入他们罗织的罪恶之网，也就插翅难逃了。

来俊臣审案时使用各种酷刑逼供。囚犯不问罪之轻重以醋灌鼻后囚入地牢，审讯时更以酷刑相逼。有用烤刑的，即将囚犯投入瓮中，瓮周以火烧烤；有用饿刑的，多日不给饭吃，使饥饿难耐，竟以衣中棉絮充饥；有用秽刑的，让囚犯睡在自己排泄的粪便之中。他还同另一酷吏索元礼制造出十种枷锁刑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臣，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犯人无论贵贱，一入他的“推事院”就将枷具摆在面前，无不魂飞魄散，低头“认罪”。关押在“推事院”没有生还的希望，即使遇上朝廷大赦之期，来俊臣却提前将犯人统统杀死，然后再宣读朝廷赦免诏书。文武百官每日入朝之前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今日能否回家相见。”来俊臣杀人越多，赏赐就越厚，其他酷吏则以来为师，学习他的“酷”道，作为请功邀赏的进身之阶。

如意元年（公元 692 年）来俊臣指使党羽诬告地官尚书狄仁杰、益州刺史任令晖、冬宫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献等六人。来俊臣宣布：“按惯例初审认罪者可以减刑。”当审问狄仁杰的时候，狄仁杰叹息说：“自从武则天革命以来，一切都颠倒了，李唐王朝的旧臣遭诛灭者甚众。我反武则天是事实。”由于狄仁杰初审认罪，来俊臣对他的看管也就相对放松。狄仁杰得到机会写好辩冤状子夹在棉服之中，然后将棉服托狱吏王德寿转交给家人拆洗，其于狄克远迅即将它呈送武则天。武氏读罢十分惊诧，召问来俊臣：“这是怎么回事？”来俊臣诡称由于他在狱中受到良好待遇，衣冠如昔，饮食如常，没料到他居然翻悔供词。武则天命通事舍人周綝到监狱察看实情，来俊臣立刻命狱吏给狄仁杰冠带如昔，并让他在狱中自由走动，以遮掩察看实情者的耳目。来俊臣并使人代狄仁杰写了一篇认罪谢表，托周綝带交武则大，目的是促请武氏早日下诏处死。武则天见事有可疑，召狄仁杰亲审，并问：“你为什么承认自己有谋反之罪呢？”狄仁杰答道：“我若不认罪，早死在来俊臣的刑具之下了。”武则天又问：“那你为什么又写认死罪的谢表呢？”狄仁杰回答说：“没有写过。”武则天拿出谢表对勘，才知是来俊臣使人代笔，伪署其名而已。这是来俊臣罗织罪名、陷害大臣的一个有名案例。

周兴和来俊臣同为武则天的酷吏，彼此关系亲密异常。有人密告周兴与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一起谋反，武则天命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一天与周兴审案结束后一起吃饭，饭间来俊臣问周兴道：“囚犯若不认罪，当用什么方法逼他招供呢？”周兴回答说：“这很容易，搬一只大瓮来，瓮周用炭火烧得旺旺的，将囚犯投入瓮中，还有什么罪不肯承认的呢？”来俊臣立即命人搬来大瓮，用周兴之法烧旺炭火，然后拱手对周兴说：“有人密告你与丘神勣共同谋反，武后有旨命我审理此案，请老兄进入此瓮罢。”周兴惶恐万状，叩头伏罪。这就是“请君入瓮”一语的由来。

来俊臣由于作恶多端，敛财无数，结怨甚众，招致败亡。有一次向商贾（音 gǔ）勒索巨款，影响恶劣，受到御史纪履忠的弹劾，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武则天才勉强将他关押起来，终念其忠心不二，为她清除异己立过汗马功劳，乃免他死罪，削职为民。长寿年间（公元 692—694 年）又复职为殿中丞，不久又因“坐贼”之罪贬同州（今陕西大荔）参军，旋又召回朝廷担任宫尉官职，不久还晋升为洛阳令，再升为司仆少卿。虽然经历宦海升沉之苦，但贼性不改，狠毒残忍一如往昔。他深知朝臣惮忌之威奈何他不得，武则天又借己之力，诛灭异己，于是萌发异志，常以东晋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自比，图谋反叛。他计划通过告发庐陵王（中宗李显贬号）与南北衙谋反之事，制造混乱，削弱武则天的势力，乘机夺取武周政权。来俊臣的死党卫遂忠，因醉殴之隙反目成仇，告发来俊臣的窃国阴谋，加上武氏家族、太平公主及武则天男宠张昌宗等人平日受来俊臣之辱甚多，均寻机报复，遂共证来俊臣谋反之罪，武则天才下诏将他斩首于市，死年 47 岁。来俊臣死后，有人挖去他的双眼，有人剖其腹割掉他的心肝，有人将尸体剁成肉酱，很短的时间尸首不存，只剩几根骨头。那些后到的仇家不能亲啖其肉，乃牵来马匹践踏他的骨骼，以泄心头之恨。朝野上下相互庆贺地说：“今天晚上可以身贴床板睡一个安稳觉了。”

韦后专权乱政

唐中宗皇后韦氏，是唐代继武则天之后的又一个专权乱政的皇后。韦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中宗李显为太子时，立韦氏为妃。弘道元年（公元 683 年）中宗即位，第二年（即嗣圣元年）被立为皇后。同年中宗遭武则天废黜，贬为庐陵王，先流放于均州（今湖北均县），后来迁滴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亦随至贬所。当时中宗内心惶恐不安，耽心武后加害而遭杀身之祸，每听说朝廷使者将到，就以为死期已至，吓得胆颤心惊，多次想自杀而被韦氏制止。每遇此情，韦氏即劝慰中宗说：“一个人的祸福，是变化莫测的。今日遇祸，说不定明日就得福。眼前的困境，或许不久即可改变的，何必害怕成这样子呢？若想一死了之，机会多的是，用不着这么急着自杀呀！”在流放生活中，二人患难与共，艰危互济，排解了中宗惶恐不安的情绪，鼓励他苟全性命以待时日的信心，患难之中，彼此结下深厚的情谊。为了报答韦氏的这种济困扶危之功，中宗当时曾发誓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即是说，有朝一日若能复位为君，一定听任韦氏为所欲为，不加禁止。中宗当时这么说了，后来也这么做了。

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中宗复位，每临朝议政，韦氏即坐在帷幕之后，参预处理朝廷大事，中宗实践了昔日的诺言。中宗朝的仪制、官吏、政令完全承袭武周旧制，没有什么变动。内宫任用武氏朝的上官婉儿，为他起草诏令；朝政则用武氏亲族武三思为宰相。上官婉儿深受中宗宠幸，不久升为“昭容”，武三思更倚为肱股，结为儿女亲家，将其爱女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的长子崇训为妻。上官昭容原与武三思通淫，由于她的暗中策划又把武三思引入后宫，淫于韦后，这样一来上下暗通，内外勾结，播弄朝政，三人成为朋比为奸的死党。上官昭容每起草诏令，多推尊韦氏家族成员，贬抑李唐王朝的宗亲。为此，宗室子弟恨之入骨。以致节愍太子（中宗第三子）李重俊举兵至肃章门，索杀婉儿以泄愤。上官昭容在武周朝随武氏多年，熟谙武氏篡

权夺位之道，后来受宠于韦氏之后，经常劝说韦氏效法武则天而临朝称帝。遗憾的是，韦氏既无武氏称帝的才能，也无武氏纵横捭阖的胆略。只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以淫乐为生的宫妇。她干得最开心的事就是把武三思唤入宫中，二人对坐在龙床之上赌双陆为戏。“双陆”，亦名“骰（音 tóu）子”，是一种六面体正方形的赌具，每一面刻有圆点，从一点至六点，投入盘中，以点多者为胜。每当韦后与武三思坐在龙床赌博时，中宗则站立在床前替他二人数筹码，以定谁胜谁负，充当点钱算帐的角色。韦后不仅允许男子私入后宫，还允许宫女随意外出，上官昭蓉等有地位的宫女在宫外购买府第，随意进出，毫无限制。朝廷中某些奸佞之徒，往往伺候于宫外，有的邀约宫女作押邪之游；有的乞求赏赐；有的谋求官职。侍中敬晖等仗义执言，揭发韦后、上官昭容、武三思等之丑行，不久敬晖、王同皎二人先后被处死。韦后串通朝臣尊中宗为“应天皇帝”，尊她为“顺天皇后”，更加恃宠专横，势倾朝野，指使周利用、冉祖雍、李悛、宋之逊、姚绍之等五人，打击主持正义的大臣，残害善良百姓，时人称之为“五狗”。韦后优宠韦氏家族，列位要津。其幼女安乐公主更仗父母之爱，恃宠骄横，卖官鬻爵，行为放荡，无所不为。她俨然以“皇太女”自居，与韦氏串通一气，自草诏令，掩其正义，强令中宗末署名宇，公之于外，以从事卖官、敛财种种不法勾当。神龙三年（公元 707 年），武韦死党宗楚客等人率百官上表，加封韦氏“顺大翊圣皇后”尊号，夺权之心迹更昭然若揭。“翊圣”者即帮助中宗治国之谓也，显然含有效法武则天代高宗治国之意。景尤二年（708 年）春天，韦后左右宫女，秉承密旨，妄称韦后衣箱之中有五彩云霞蒸腾而出。胡涂昏聩的中宗，居然令画工模仿其状，绘成彩图，展示中外，共庆内宫之祥瑞。并诏令大赦天下，优恤妇女，各级官吏的母亲和妻子，都从这一闹剧中意外地得到了封赠。攀附邀宠之徒得到启示，视为封官进爵的阶梯。有人上表说：“昔日高祖李渊未称帝时，天下有歌谣《桃李子》以献瑞；太宗李世民未受禅时，天下有《秦王破阵乐》以颂其武功；高宗李治未登基时，天下有《侧堂堂》以颂其德行；陛下（指中宗）未复位时，天下有《英王石州》以颂其英武；顺天皇后（韦氏）未加号时，天下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以歌颂其母仪天下之德。今特撰呈《桑条歌》12 篇，望颁示天下，教化万民百姓。”中宗十分高兴，即令编诸史册，颁示天下，上表的人自然得到了加官增俸的厚报。

景龙三年（公元 709 年）冬天，中宗将至南郊祭祀天地，后党中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晖极尽谄媚韦后之能事，提出“皇后亦合助祭”的建议，遭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的反对。中宗不能决定，委托尚书右仆射韦巨源等人商榷裁定，都称“合乎礼法”而上迎圣意。于是以韦后之祭为“亚献”，以安乐公主之祭为“终献”（终因大臣反对未果），完全效法武则天“祭地祇及梁父”的“亚献”故事。景龙四年正月十五元宵之夜，中宗与韦后微服出宫观灯，还将数千宫女也放出宫门，不少人淫奔不还。韦后一方面优待宫女出宫，另一方面又招募为己所用者入宫。叶静能善符箓之术、马秦客善医术、杨均善烹调，均授以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少卿等官职。他们出入后宫，与韦后过从甚密，同恶相济，横行不法。这年六月中旬，武韦二人恐其通淫外露，安乐公主欲韦氏临朝封己为“皇太女”，遂合谋进毒饼于中宗。中宗食饼暴崩，震惊朝野。韦氏骇怕国人兴师问罪，秘不发丧，召集朋党密谋对策，乃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管理朝廷政事，留守东

都（洛阳）；又命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薛简以兵五百前往均州以防备谯王李重福发动叛乱；还任命子侄统领南北衙禁军，以防不测。做了这部署之后，乃与其兄韦温商定暂立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然后发丧。少帝即位，尊韦氏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温则总领内外兵马，并策划效法武则天临朝称帝。没想到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与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联合率领禁军攻入后宫，杀死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韦氏宗族子弟、武氏宗族子弟，迫少帝让位，立相王李旦（李隆基之父）为帝，足为睿宗。韦后夺权之乱，终以失败结束。

开元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 685—762 年），是唐朝的第七代皇帝。他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垂拱元年 8 月生于东都（今河南洛阳）。史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晓历象之学，善写八分书，是一位仪表伟丽，多才多艺的封建帝王。3 岁时（垂拱三年）封为楚王，9 岁时（长寿二年）封为临淄郡王。睿宗即位，封为平王，立为太子。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于长安四年（公元 704 年），从神龙元年至太极元年（公元 705—712 年）的 8 年时间里，是唐朝政局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宗虽然复位，但大权旁落，先由韦后、武三思把持朝政，继之安乐公主（韦后之女）、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阴谋篡权。太子李重俊杀死武三思以清君侧，而韦后和安乐公主又胁迫中宗杀掉太子，随后中宗亦被自己的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李隆基就是在唐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挽狂澜于既倒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李隆基先联合太平公主诛灭韦后、安乐公主、武氏家族成员，拥睿宗即位。两年之后，继承皇统，改元“先天”，是为玄宗。开元元年（公元 714 年）以先发制人之势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武后以来的后宫专政的历史，至此告一结束唐朝的政治走上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玄宗继位后的第二年改元“开元”，开元时期（公元 713 年—741 年）唐朝达到了极盛的顶点，这就是历史学家所称誉的、与“贞观之治”相比美的“开元之治”。

唐玄宗登基之后，即致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在藩邸时曾以阿瞒（曹操小名）自诩，足见其胸次之广阔，志向之高远了。他深知诛火武韦以后的安定升平政局得来不易，所以用人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运。玄宗认为昔日协助他铲除武韦及太平公主势力的郭元振、刘幽求等人都是一批阴谋家和冒险家，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稍不遂其心意，即萌异志。他认为这类人“时与履危，不可得志”，于是以种种借口，将他们诛戮贬逐。开元元年冬季，玄宗驾幸骊山温泉宫，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 50 余里，操练 20 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以军容不整，督操忤旨之罪拘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经左右百官求情，乃罢其官职，远谪新州（今广东新兴），以惩其治军不肃之罪。太子少保刘幽求，詹事钟绍京均为玄宗旧部，因功大禄小常发怨忿之言，玄宗借故问罪，贬刘幽求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刺史，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北）刺史。侍郎王琚（音 jū）亦贬至泽州（今山西晋城）。书安石、韦嗣立、赵彦昭、李峤诸人，以阿附取悦上司，为官不能持正之罪，俱贬为诸州别驾，并将广州都督周利贞放归田里，终身不用。玄宗这许多整肃朝臣之举，虽惩罚有名，其实是自请群侧，以达到“狡兔死，良狗烹”的目的。除了自

清群侧，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他贬逐兵部尚书郭元振之后，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任上调来姚元之（后名姚崇），为了考察姚元之的武艺，命他陪同自己猎于渭滨。玄宗问姚：“卿会射猎么？”姚元之答道：“这是臣的素习，故技尚娴，愿随陛下同猎。”姚元之连发数矢，迭中数兽，终于过了武艺考核这一关，玄宗大喜。晚上玄宗要他纵论治国经邦之大计，并反复问难，姚元之语语切中时弊，迎合玄宗心意。玄宗当即对他宣布：“卿可相我”，要他接替郭元振担任丞相兼兵部尚书的职务，姚元之推辞不受。玄宗问其故，姚元之说：“臣有十大安邦之策，陛下未必允行，因此不能受命。”玄宗要他陈述内容，他条陈十策为：一是宽刑仁恕，免除严刑峻法；二是不求边功，免除征战之劳；三是法行自近，亲近犯罪亦应绳之以法；四是宦官不得参与朝政；五是禁绝租赋之外的一切税收；六是皇属不得担任朝廷要职；七是尊重大臣人格以礼相待；八是准许群臣直言犯忌相谏；九是杜绝以巨资进行佛道建筑；十是外戚不得干预朝政。玄宗答应照办，第二天正式授职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封梁国公。朝野上下欢呼雀跃，称誉玄宗选相得人。

宫廷政变，是李唐建立后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为此，玄宗对李唐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玄宗原与诸兄弟住在开安的隆庆坊。立为太子之后，改隆庆为兴庆，仍与他们住在一起，共盖一床大被，共用一条长枕，食则同桌，寝则同眠，和睦相处。即使登基之后，与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岐王隆范相见时，仍以兄弟相称，行家人之礼，毫无群臣上卜之尊卑。玄宗旧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筑第，宫的西面筑楼名为“花萼相辉”，南面筑楼名为“勤政务本”。玄宗常常登楼与诸王欢娱作乐，对榻坐谈，兄弟之亲情与昔时无异。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郊猎，玄宗不加禁止，大有安乐与共之意。但不许诸兄弟与朝臣及外戚交游，并严加禁止。玄宗兄弟之中惟岐王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恃功骄恣，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说、驸马都尉裴虚己宴游。玄宗先后将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与岐王隆范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诫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邀宠，无碍兄弟之谊。”在封建帝王中，玄宗的兄弟友爱之情是为人传诵的。

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二年（公元 714 年）命戴谦开掘山西文水县东北 50 里的甘泉渠。25 里处的荡河渠、20 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均引文谷水灌溉田亩千余顷。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在河北蓟县北 20 里开掘渠河塘，在蓟西北 60 里处开掘孤山陂，灌溉田地 3000 余顷。开元中在益州彭山（今四川眉县）开掘大通济渠 1 条，小堰 10 条，自新津中江口引水南下 120 里灌田 1600 顷。开元二十七年（公元 739 年）在武陵（湖南常德）增修北塔堰，灌田千余顷。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有直接效益。此外，玄宗还下令将各地荒田荒地招募社会流民耕种，以免征 5 年赋税的优惠政策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玄宗采取了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局面。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必然增加，封建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每年收入粮食 1980 多万斛，绢 740 万匹，布 1035 万端（5 丈为一端），钱 200 多万缗（一千文为一缗。音 mín）。两京（指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斗米不至 20 文，面粉 3 文，绢一匹只需 210 文。可见当时粮

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商旅来往十分安全，“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或非虚语。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 7861236 户，有人口 45431265 人，这比唐朝初年人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国力也空前强盛。玄宗在外族接邻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实行屯田制，军队平时生产，战时上阵。又设立朔方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河东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节度使等十镇节度使，各统数州，掌握兵马大权，使唐朝兵威，远震塞外，使外患渐平，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玄宗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帝王，对当时文化艺术氛围的形成不无影响。特别是音乐舞蹈领域更为卓著。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盛唐时期的著名人如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李白和杜甫等，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在诗中歌从军，吟出塞，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代。

名相姚崇

姚崇（公元 605 年—721 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则天朝以字行，时突厥叱利元崇发动叛乱，武则天不喜姚崇与叱利同名“元崇”，乃改名元之。玄宗朝为了避讳“开元”的“元”字，复改为单名姚崇。他在武周、睿宗、玄宗三朝为相，皆兼兵部。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

姚崇在武则天朝以门荫出身为仕。任孝敬挽郎职时，应“下笔成章”科举，授为濮州（今河南范县南之濮城东）司仓。曾先后五次担任则天朝的夏官（兵部）郎中。当时契丹侵扰河北，战务繁忙，军书积压特多，原夏官处理文书极慢。姚崇上任后，“剖析若流”，以极快的速度处理得井然有序，武则天甚为惊奇，越级提升为兵部侍郎。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义擢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酷吏周兴与来俊臣伏法之后，武则天在一次廷议中提出：“周、来二人勘案时期，朝中反逆特多；二人死后朝中无反逆之事。以前定的反逆案应无枉屈，不然为什么无人申冤辩屈呢？”对这一敏感问题，朝臣无人敢说实话，怕惹祸上身，身家难保。唯姚崇挺身而出，抗颜争辩说：“从垂拱（公元 685 年）以后，被定为叛逆而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在严刑逼供下诬谄致死的。告密的人为了邀功请赏，编造谎言，天下之人称为‘罗织’，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残暴行径，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严重得多。陛下也曾派近臣了解狱囚的真实情况，所派近臣本人身家难保，他怎敢据实上报推翻周兴、来俊臣的判决呢？受害人自己只能含冤负屈，稍有异词 即遭毒手，将军张虔勗、李安静二人翻供被杀不就是例证么？我以全家近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任朝臣之中没有一个犯叛逆之罪的。”姚崇这一义正辞严的抗辩，不仅满朝文武对他感激涕零，连武则天也深为叹服。她说：“以前的宰相，怕负责任，遇事敷衍，不报实情，使我陷入严刑峻法的残暴境地，只有姚卿敢说实话，甚合我的心意。”即刻遣中使赐银一千两，以资鼓励。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张柬之、桓彦范谋诛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恰好姚崇视察军情返回长安，遂参预其谋。这次行动的结果是二张被杀，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出。正在朝堂庆贺之时，百官无不欢欣雀跃，共庆李唐国运重开，皇统有继，而姚崇一人却

潜然泪下，极为伤感。张柬之、桓彦范对他说：“今天岂是哭泣的日子，恐怕你祸将临头。”姚崇说：“我事奉则天多年，一朝离去，感情一下子难于割舍。昨天我参预你们诛二张之谋，是臣子应尽之责；今天辞别旧主而哭泣，也是一个臣子应有的节操。若因这次的哭泣而遭惩罚，我也心甘情愿。”行为磊落，委实感人。不久贬为亳州刺史，转常州刺史。

景云元年（公元 710 年）睿宗李旦即位，又召姚崇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不久又升为中书令即宰相之职。其时李隆基为东宫太子，而操纵朝廷大权除李隆基姑母太平公主之外，尚有李隆基兄弟宋王李成器、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等人。他们身居要职，掌握兵权，朝廷大臣均认为宗室干政对朝廷政局不利。姚崇与宋璟等人密奏睿宗应把太平公主逐出长安迁往东都洛阳居住，而宋王、岐王、薛王三人则均迁为外州刺史。这本是为李唐王朝长治久安的安邦妙策，不料睿崇昏庸极盛，竟将此语面告太平公主，于是搅得天翻地覆，东宫太子亦涉与谋之嫌。李隆基为了平息风波，乃上表责称姚崇宋璟离间他姑侄、兄弟之情，请睿宗贬逐二人为外州刺史。此举名为贬逐，实是李隆基保护二人，怕他们在朝中遭太平公主的暗算。姚崇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南）刺史，后转为扬州刺史，再迁淮南按察使。在这些地方任上，他为政简肃清廉，百姓及地方官吏为他立碑纪德，甚得好评。

姚崇施展抱负，风虎云龙，还是玄宗登基后的开元为相时期。玄宗贬逐兵部尚书郭元振之后，即召令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为紫微令。姚崇在执政之先曾与玄宗约定十件大事，如以仁义治天下，数十年内不求边功让百姓休养生息，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官职，废止破格滥用官吏，以法制抑压佞倖之徒，公卿、方镇、戚里不得贡献求媚，全国不得再增建寺庙宫殿，广开言路接受臣下谏诤，严格杜绝外戚干政。这十大建议基本被玄宗所接受，陆续施行。姚崇在开元时期为相处理的第一件事是勒令僧徒还俗。中宗朝佛教泛滥，公主及外戚度人为僧为尼者甚多。开始还基于佛教信仰，无可厚非，后来有些富户强丁以寺庙做为逃赋逃役的避风港，成为国家之害。姚崇表奏玄宗说：“一个人只要做到内心慈悲善良，使苍生百姓得到安乐，即是皈依佛法。用不着妄度奸人，破坏朝廷正法。”玄宗接受他的意见，令枉度的伪滥僧徒还俗者 12000 多人，堵塞了国家赋税漏洞，增加了社会劳力，于国于民，均称益举。

玄宗即位以后，以为政清明为目标，姚崇独当重任，对一切政务处置得当，且雷厉风行，深得玄宗信任。但是他儿子姚彝、姚异，喜与宾客往来，接受宾客馈赠，招致朝臣和社会人士的批评，影响姚崇的声誉。他的同僚中书赵诲，深得姚的信赖，在一次接待中私受“蕃人”珍贵礼品，遭到玄宗究问，下狱处死。姚崇一方面承认赵诲有罪，一面又设法营救，玄宗对此十分恼怒。姚崇自此忧惧不安，多次向玄宗提出解职归田的请求，并推荐宋璟以自代。玄宗因之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以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让他归养。

姚崇于开元九年（公元 721 年）病逝，年 72 岁。逝世前，他立下遗嘱，阐明信佛之害，不许子孙为他延请僧道，追荐冥福。临终时，叮嘱诸子：“我任宰相多年，所言所行，多可传诵后世。死后的碑文，不是著名文家不写。当今文坛巨匠，首推张说（音 yuè），我和他素不相睦，若去特地求他为我撰写碑文，他必然不从其请。我留下一计，在我灵座之前，陈设珍贵玩物，俟张说来吊奠，细察其情。他若见到这些珍玩，不屑一顾而去，是他记挂前仇，防他报复，汝等速离此地回归乡里。倘他逐件玩弄，有爱慕之意，汝等

可传我遗命，悉数奉赠。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刻于石碑，并将原稿进呈皇帝御览。我料张说性贪珍宝，使其利令智昏必然就范。切记照此办理，以快为妙。他必事后追悔索回文稿。果能如我所料想的那样，碑文中一定赞誉我的平生功业，后想寻隙报复，难免自陷矛盾之境，没法寻衅了。”姚崇之子彝、异等人谨记父命，遍讣丧文，设灵接受百官吊唁。张说入朝奏事闻姚已殁，顺道往吊。姚崇诸子依父命早已摆列珍玩，张说入吊后，双手扶摩诸物，极表爱慕之意。姚彝等人当即叩请说：“先父曾有遗命，谓同僚密友肯为撰写碑文者，当以遗珍相赠。大人乃当代文坛耆宿，倘若不吝赐文，以记先父之履历，当以诸物相赠。”张说欣然允诺，彝等促其从速撰写。张说兴致极佳，当即撰文，为姚崇写了一篇淋漓尽致的颂德文章。文一落笔，姚家就送来珍玩，取走碑文，连夜雇请石工，刻之于石，并即日将原文进呈御览。玄宗看了铭文，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似此贤相，不可无此贤文。”张说一天以后，省悟过来，暗想自己与姚崇有隙，多年不睦，如何反去颂扬其德呢？连忙派人索还原稿，托言文字草率，须加工润色。不料使者回报已刻成碑文，并呈御览。张说连连顿足叹息说：“这是姚崇的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计，真觉羞愧啊！”

姚崇死后，谥太子太保。他三次入相，皆兼兵部尚书，对于唐朝国力之强盛，开元政治之清明贡献巨大。他为政注意选人才、罢冗职、立制度、择百官、汰僧道、抑权贵、奖农桑、设屯戍等等政绩，无不为世称道。他与宋璟并称“姚宋”，同为后世称誉的良相。“开元之治”有他规划、经营之力，功不可没。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祸首安禄山，乃营州（今辽宁锦州）杂胡（父胡人，母突厥人）。史称禄山“忮（音 zhì）忍（狠毒）多智，善臆测人情，通六蕃语，为互市郎（即经纪人）。”“忮忍”指他狠毒残忍；“多智”、“善臆测”，指他狡诈多变善于伪装。在他由微而显，由显而叛的行迹中，这种狠毒残忍、狡诈多变的性格表现得十分突出。张守珪镇守幽州（今北京市），禄山因盗羊获罪，将杀之时大声呼喊：“节度公不是欲平两蕃（指奚和契丹）么？为什么杀掉可平两蕃之人呢？”守珪壮其语、异其貌，欢然释之。命与史思明同为“捉生将”。其任务是深入蕃境，捉拿蕃将以侦探蕃情。一次竟以五骑而俘敌数十，守珪惊异。其后有行必获，升为偏将。张守珪恶其肥丑。安禄山为了减肥，迎合珪意，讨其欢心，由是不敢饱食。守珪见其善解人意，因之养为义子。

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安禄山任平卢（今河北东北辽宁西南接合地区）节度使、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兼范阳（今河北涿县）节度使、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又兼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一人兼领三镇，统兵 18 万余人，这在唐代藩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安禄山得到这种特殊恩宠的原因有三：一是他善于贿使买恩。御史中丞张利贞察访河北，安禄山百般献媚，以巨金结纳买其私恩。利贞入朝，在玄宗面前盛赞其才。其后往来河北的使者，安禄山均依其法赂其所嗜，使者回朝众口一辞，盛加称赞。在这种“多方考察”之下，玄宗许以为“才”，委以重任。二是喜逢机遇。奸相李林甫，在朝臣中声望极低。因他文墨不多，出言粗鄙，儒臣耻其为人，均敬而远之。

特别是那些因战功而深得玄宗宠幸的儒将更是李林甫地位的挑战者。故此，李林甫在起用许多不学无术的文臣之后，思得武将为其羽翼；安禄山的出现，正可打破唐朝儒臣而兼武将的传统。因之以宰相之尊而推誉安禄山，玄宗对他的特殊恩宠自然更加牢固。三是安禄山在玄宗面前善于以愚掩奸。安禄山在玄宗面前，始终装出一副憨厚愚笨之态，讲一些令人捧腹大笑的“蠢”话。一次对玄宗表现出憨厚可怜之态说：“我是蕃奴，得此殊荣，无以为报，愿即日自裁，减己之天年，以增陛下之日月。如此或可报陛下之万一。九泉之下，余心亦安。”玄宗信以为诚，怜爱更甚。有时他还以愚泄愤。东宫太子李亨，认为安禄山久后必反，多次劝说玄宗不能授之以兵权，委之以重任。玄宗以为二人有隙，想调和关系使之和睦相处，共襄大唐盛世。乃引安禄山至东宫会见太子李亨。安禄山见而不拜，有意悖慢于他。左右责以不拜之罪，安禄山故装胡涂地问道：“臣乃蕃奴，不识礼仪，皇太子是什么样的官儿？”玄宗答曰：“我百岁之后付之以位，授之以权。那时他代我君临天下，南面称孤哩。”他立即假装惶恐之状，叩头谢罪说：“臣是蠢材，只知道有陛下而不知道有太子，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装出一副惶惧不安之态。这场表演虽然骗过了玄宗，而更结怨于太子。李亨对他愚里藏奸看得一清二楚。安禄山在藩镇以奸邀宠之日，也是杨贵妃在宫中以色邀宠之时。这一外一内，一男一女，是唐玄宗这一时期生活的重要内容。国事家事均与二人息息相关。而被宠的二人，都在估量另一宠者，如何利用对方的恩宠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安禄山请求做杨贵妃的养子，唐玄宗允其所请。安禄山每次入宫存寒问暖拜见“双亲”之时，必先妃而后帝。玄宗怪而问之，答曰：“臣是蕃人。蕃人之俗是先母而后父。”玄宗听后十分高兴，遂命杨氏家族里杨铦（音xián）以下诸人，与之结为兄弟姊妹。安禄山身体肥胖，腹垂过膝，自云腹重三百斤。有一次入京朝见，玄宗问道：“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安禄山乘机邀宠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玄宗对他更加宠信不疑。

安禄山每次入朝，留意访察朝政得失、兵力部署、粮秣储存。他看到唐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认为有机可乘，即阴蓄异志，用汉人严庄、高尚为谋士，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职位，收养罗、奚、契丹8000健儿为养子，称之为“曳落河（壮士）”，作为叛军的骨干，积极准备叛乱。当时不断有人禀奏安禄山将反，玄宗不之信，并安慰朝臣，称他“必无异志。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同部将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发动叛乱，以诛杨国忠为名，率兵15万，号称20万，南下中原，进逼唐都。河北为安禄山的老巢，叛军所过之处，州县官吏或降或逃，无敢抗拒。真如暴风骤雨，势不可挡。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毫无应变准备。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描写的那样：“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封长清虽然仓促招募五六万人马，但未经训练，一触即溃，无法抵抗安史叛军。哥舒翰又领兵20万镇守潼关，才抵住安禄山的进攻，出现僵持局面。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即皇帝位，国号“大燕”，在政治上达到顶峰，在军事上则陷入困境。安禄山进攻潼关受阻，归路又被切断。在这进退维谷之时，乃大骂谋士严庄、高尚不该劝他造反。由于唐朝作战方略的错误，自毁长城，误杀良将，致使潼关失守，玄宗仓皇出逃，安禄山才摆脱困境。肃宗即位灵武（今属宁夏）之后，依靠郭子仪和李光弼之力，调集各路大军，才使战局出现了转危为安有利于唐军的变化。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初，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对安禄山来说，是官

军易胜，家贼难防。安禄山的近侍李猪儿，原为年幼降卒，乃留在帐下，以供驱使。禄山见猪儿侍候勤谨，阉以为宦，恩宠倍加，不离左右。禄山腹大垂膝，每穿衣著履，必须猪儿为之牵裳结带。即如赐浴华清，猪儿亦恩赐相随。禄山愈老愈肥，腋下缝间，均生疮毒。反叛以后，又双目失明，心烦意乱，急躁不安。左右近侍，呵责鞭笞，无罪辄死，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严庄、猪儿等辈，也日受笞责，不能幸免。二人至此衔恨禄山，常怀泄恨之心，伺机而发。禄山长子安庆绪，与其异母弟庆恩争夺“东宫”，愈演愈烈。安庆绪惧己见疏，希图速立。严庄窥知其意，私语安庆绪道：“君能大义灭亲乎？自古欲成功大事者，固有不愿为之事而必为之者。”这话说得很含蓄，也很明白，就是虽杀其主必有其因。安庆绪含糊地回答说：“唯唯。”严庄、安庆绪又胁迫猪儿说：“你事上之罪不胜枚举，不参与大事，必死在目前。”至此，三人已暗中定谋，等待时机，刺杀禄山。至德二年正月初一，安禄山接受伪臣的新年朝拜，因病重不能坚持，乃终止贺仪。这天晚上，严庄、安庆绪持刀守护安禄山门外。猪儿进入安禄山卧室，揭开帐幕，以大刀剖安禄山之腹。安禄山因目盲用手摸刀不得，乃垂床大呼曰：“是家贼杀我！”立刻肠泄满床，须臾而死，年 50 有余。3 人以卧毡相裹，埋于床下。严庄假传安禄山病危，矫诏安庆绪为“太子”；继而又矫称安禄山传位于安庆绪。

安禄山被杀之后，史思明手握重兵，不受安庆绪节制。不久史思明即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乘胜再陷洛阳。上元二年（公元 761 年），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所杀。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史朝义在唐军的追击下，途穷自杀。前后经历八年之久的（公元 755—763 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大为削弱，藩镇力量大为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封建割据的局面日渐形成，统一的唐王朝不复存在了。这场战争，长达八年，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是北方人民的一次空前浩劫。

马嵬兵变

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后徙籍蒲州（今山西永济）。其父杨玄琰曾任蜀州（今四川崇庆县）司户，杨玉环于开元五年即生于蜀州住所。她幼年就父母双亡，在叔父杨玄璥（音 áo）家中寄养。时杨玄璥任职河南府士曹，所以她是在河南长大的。杨玉环幼时受过很好的文化艺术熏陶，长大以后，“善歌舞，通音律”，且“智算过人”，“姿色绝代”。这样色艺双全的女子，在封建社会里，当然成为权势者所追逐的尤物了。大约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 年），即她 19 岁的时候，被选为寿王李瑁的妃子。寿王乃玄宗李隆基宠幸的武惠妃所生，是玄宗的第 18 个儿子。婚后，夫妻生活幸福美满，“画眉”“举案”，琴瑟十分调和。

寿王的母亲武惠妃，受玄宗的宠幸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从开元元年（公元 713 年）纳为妃子，至开元二十五年 12 月 7 日去世，宠幸未衰。武惠妃死后，玄宗居然“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找不到一个像武惠妃那样的、值得玄宗宠幸的妃嫔。玄宗因之郁郁寡欢，性格乖戾，动辄鞭笞左右侍者，吓得那些太监宫女们整天提心吊胆，深怕皇帝的无名怒火烧到自己的身上来。老太监高力士揣测上意，料知其怒为失美而生，只能在得美之后才

能平息。于是派人四出访察，遍求美女。无论是王公贵族或平民百姓之家；无论是未婚或已婚的女子，只要色艺双全，均在访求之列。经过多方物色，慎重挑选，最后认定只有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才是合格的人选。这真是给武惠妃的在天之灵开了一个大玩笑，谁能想到替代她献媚于玄宗的，居然是她的嫡亲儿媳。玄宗根本没有考虑夺媳之嫌的问题。他的祖父高宗李治能纳太宗的才人武媚娘为皇后，他为什么不能纳子媳为贵妃呢？只要“色艺”符合“孤意”就行，其他就在所不计了。杨氏选召入宫的时间大约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 年） 10 月，新、旧《唐书》均用“大悦”二字来形容玄宗召见杨玉环后的高兴心情。父子“麀聚”这在李唐王室中是不以为耻，无须回避的事情。但若正式册封，在诏书中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借口，以遮掩天下人的耳目。比如高宗立武则天为后，是以太宗“以武氏赐朕”为由，而封住天下人之口。玄宗可没办法让自己的儿子，用“孝亲”的名义把爱妃贡献给自己。经过一番策划，以杨玉环自己要求出家为女冠的理由，离开寿王府第，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将她正式度为女道士，赐号“太真”。杨太真虽为女道士，但身处皇宫内观，献媚承恩，呼之即到，往来十分方便。大约在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左右，玄宗挑选大臣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以填补杨玉环之缺。他自己乃在天宝四年 8 月 17 日正式册封杨太真为“贵妃”。在玄宗看来，他册封的贵妃是女冠杨太真，而非从前的儿媳杨玉环。这样一摆弄，玄宗自觉无夺媳之嫌，也就心安而理得，何乐不为呢？

杨玉环册封为贵妃之后，宠遇胜过武惠妃，宫中号称“娘子”，“仪体与皇后等”，能享受皇后的一切待遇。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描写的那样：“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杨贵妃虽然善于“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赢得玄宗的最高宠遇，但她仍有两次“忤旨”，激怒圣颜，而遭到“微谴”的处罚。第一次是在天宝五年（公元 746 年）7 月的某天上午，不知因何惹恼了玄宗，令宫人把杨妃送归堂兄杨銛（音 xiān）家里，以示惩罚。及至中午用膳时间，玄宗不思饮食，乖戾异常，动辄鞭笞左右。高力士探明上意，奏请贵妃回宫，于是在当天夜里从兴安里门，用轿子抬归内苑，“妃伏地请罪，上欢然慰抚”，又宠幸如初。第二次是在天宝九年（公元 750 年），“贵妃复忤旨，送归外第。”宦官吉温入奏说：“妇人智识浅陋，触忤圣情，然贵妃久承恩宠，若果有罪，何不就戮于宫中，没必要把皇室家事让外人议论。将贵妃‘送归外第’是不妥当的。”玄宗即令中使张韬光赐御膳，以示安慰。贵妃更会卖弄风情，居然把自己的头发剪下“一缕”托中使献上，“玄宗见之惊惋，即使力士召还。”这次剪发明志的风波平息以后，就再没有贵妃“忤旨”的事情发生。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是一人得宠，满门富贵。杨玉环有堂姊三人，皆有才貌，都受到“国夫人”的封赠。“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她的叔父玄珪，封光禄卿，后迁兵部尚书；堂兄杨銛封鸿胪卿；杨锜封侍御史，并娶武惠妃所生的太华公主为妻；杨钊（后赐名“杨国忠”）则以宰相之职兼任剑南节度使。杨国忠二子杨暠（音 pò）、杨暄，以及杨玉环之弟杨　，皆娶公主为妻。杨氏一门有两个公主和两个郡主为媳。玄宗还为杨玉环的父母建立私庙，并御制家庙碑文，以光宗耀祖。

安禄山，杂种胡人。因屡建边功，深得玄宗赏识，天宝元年封为平卢节

度使，天宝三年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十年又兼河东节度使，掌握了今天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被玄宗倚靠为安边卫国的长城。安碌山于天宝三年第一次入朝奏事时，即请杨贵妃收他为养子，每次入宫必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问其故，则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玄宗以诚实憨厚之举视之，不以非礼藏奸之意看待，遂令韩、虢、秦等三国夫人及杨铦等杨家兄弟妹妹，与安禄山均以兄弟姊妹相呼，以密切中宫与边镇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杨国忠为相后，对安禄山防范有加，多次在玄宗面前称安禄山“阴有逆谋”，久后必反。玄宗为了化解二人的仇怨，故让安禄山结友于杨家。玄宗统治晚年，朝政腐败，禁军虚弱。安禄山洞悉内情，又因与杨国忠争相失败，故于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11 月起兵于范阳（今河北涿县），妄称是奉玄宗密诏起兵讨伐杨国忠。安史叛军所向州县，望风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中原广大地区。天宝十五年潼关陷落，长安震动，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驿，军士哗变，历史上称之为“马嵬兵变”。

参加马嵬兵变的有两种人：一是御林军的一般官兵。他们认为宰相杨国忠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应予惩处。这反映了全国军民的思想愿望。二是东宫太子李亨和御林军总指挥陈玄礼。在长安时期，他们和杨国忠明争暗斗，争权夺势，均以打倒对方为目标。外逃之前，玄宗想让太子监国，处理安史之乱这一特大危机，是杨国忠串通杨玉环“以衔土请命”之谏，阻止了玄宗交权给太子的计划，他们之间的仇恨更深了。这次玄宗逃难四川，实际是宰相杨国忠的深谋远虑。四川是他的势力范围，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置政敌于死地。李亨和陈玄礼均有这种危机感。若到四川，他二人的命运就不堪设想。故必须在到达四川之前除掉杨国忠，是他们早就谋划好的对策。玄宗逃到马嵬驿发生士兵哗变，为除掉杨国忠提供了大好机会。于是在士兵中鼓动反杨情绪，制造谣言，煽风点火。刚好此时有一群到长安朝觐的吐蕃使者在此相遇，要求拜见玄宗。李亨与陈玄礼让宰相接见，立刻传出杨国忠与吐蕃使者谋反的谣言，在李、陈二人的指挥下，御林军不加究问，把杨国忠及一群吐蕃使者立刻斩首示众，并诛灭杨氏大小数十名。杨国忠已死，矛盾已经解决，可士兵仍然鼓噪不行。玄宗派高力士问其故，答曰：“祸本尚在”。即是说，杨国忠虽死，但他赖以升官发财的堂妹杨玉环尚在玄宗身边，爱宠异常，恐留后患。他们要求玄宗交出杨贵妃，并予赐死，才放心逃难。玄宗不得已，与贵妃诀别，让其缢杀于“佛室”。死后即用野外“绿茵”包裹葬于“驿西道侧”，时年 38 岁。

“马嵬兵变”，标志着玄宗时代的结束。李隆基做了四十多年的太平天子，有绝对权威，可在“马嵬兵变”中却救不了爱妃的性命，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个事件过去六七十年之后，晚唐诗人李商隐在其名作《马嵬二首》中写道：“如何国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以挖苦讽刺之笔，做了深刻的嘲弄。

鉴真东渡

鉴真（公元 687 年—763 年），唐代佛教律宗僧人。俗姓淳于，扬州江阴县（今江苏扬州市）人。一大随父至扬州大云寺游览，见到庙里神像仪态万方，严慈各异，心灵感应，若有所通，因起出家为僧之念，他的父亲“奇

其志，许焉。”这时，鉴真只有 14 岁。鉴真出家后，拜智满为帅。中宗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从道岸律师受戒。景龙元年（公元 707 年）西游两京（洛阳、氏安），景龙二年 3 月在长安实际寺向荆州恒景律师而受“具足戒”。鉴真这次在长安、洛阳等地观光求法，在名师熏陶儒染之下，不到几年时间，就融会贯通“三藏教”教义，对于律藏造诣特深。回到扬州之后，即以戒律僧的身份讲经说法，成为东南一方的“宗师”。为他传戒的道岸、恒景和尚，都是当时律宗教派的著名学问僧，又是南山宗开创人道宣律师的再传弟子。鉴真的律学虽传自南山宗，他还吸收相州日光寺法砺的相部宗、太原寺怀素的东塔宗的教义，在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融合之下，形成自己卓有特色的律宗佛学。

当时日本元兴寺僧人隆尊鉴于本国没有传戒僧，特地奏请朝廷于天平五年（公元 733 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派遣荣睿（音 ruì）、普照二僧来中国邀请传戒僧到日本传戒。当时唐朝的佛教以接受戒律为皈依佛教的正途，没有接受戒律的人，在僧侣中是没有地位的。日本受中国佛教的影响，也同样看重传戒皈依佛法之事。荣睿、普照二人到中国后，即在洛阳大福光寺请得高僧道睿先期赴日，然后再在中国各地物色更多的高僧。开元末期二人到达扬州，从鉴真学法。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正式邀请鉴真赴日。二人对鉴真说：“我国处大海之中，距离中国有几千万里。虽有佛法，而无传法之人。譬如一个人在黑夜求光明，只有燃烛才能见物。希大师东渡，去日本做传戒师可以吗？”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次年春天动身。由于受到旁人的干扰，这次未能成行。天宝二年（公元 743）十二月，他率领弟子及船工一百多人，自扬州东下，乘船不幸在途中遭飓风恶浪打坏，不能使用，只好折回，第二次东渡又失败了。此后，第三、第四两次东渡又没有成功，但仍不气馁，准备再次渡海事宜。天宝七年（公元 748 年），鉴真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据《唐大和尚东征记》一书中描写说，“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十分险恶。他乘坐的船，忽而“如上高山”，忽而“似入深谷”，人莫能控，只得随波逐流，向南漂去。由于时间忒长，船上淡水用尽，人人口干舌燥，干粮无从下咽，只得以海水调和送食。人人腹胀如鼓，个个体力不支。在大海中漂流了 14 天，在海南岛的南部才登上陆地。在这五次东渡活动中，荣睿、普照二人一直陪伴鉴真左右，患难与共，艰苦共尝，表现出为佛法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在从海南回到扬州的路上，荣睿不幸病逝于端州（今广东肇庆）。鉴真也体力不支，辛劳过度，身患炎症而导致双目失明。先后共有 36 名中日两国僧人在这五次东渡中牺牲。

鉴真和尚虽然前五次东渡失败，损失惨重，但他仍然坚定地要实现其赴日传戒的宿愿。天宝十二年（公元 753 年）他在 65 岁高龄且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搭乘一艘回国的日本木船，进行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地到达日本的九洲岛。这次随他到日本的还有扬州白塔寺高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坛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法成等，此外还有藤州通善寺智首等三位尼姑，总共 24 人。次年由九洲至日本的平城京（即今日本奈良）。日本国民热烈欢迎鉴真一行，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筑起戒坛，亲自为日本圣武上皇和孝谦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戒。此后还为 440 名沙弥授戒；还为 80 多名僧人舍旧戒授新戒。自此以后，日本佛教才有正式的律宗传承，所以鉴真被日本尊为律宗的初祖。

鉴真还携带了许多佛教经典和佛教圣物到日本。在佛经中包括《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小止观》、《六妙门》等天台宗的经文，并在唐招提寺亲自讲授，所以鉴真还是一位天台宗佛教的著名学者。

鉴真和他的弟子还与密宗有很深的关系。鉴真携往日本的佛教圣物中，有雕刻的白色旃檀千手观音像一座，刺绣千手观音像一幅，这些均属密宗神像。在日本唐招提寺经堂中，现在还保存有千手观音神像，相传是随鉴真东渡的弟子如宝的作品。

鉴真和随行弟子在日本传播戒律有划时代的贡献之外，还给日本佛教艺术以深刻的影响。鉴真对于佛教建筑和佛像雕刻均有很高的造诣。他在东渡前，曾在中国修筑佛寺八十余所，是享有盛名的佛寺建筑家。随他赴日的弟子中，也有卓越的建筑家和雕刻家。日本的唐招提寺是由鉴真和他的弟子设计建造的佛教建筑群，整个结构和装饰，都体现了唐代建筑的特色，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曾拟轰炸奈良，中国古建筑家梁思成先生呼吁美国保存古建筑文化，才免遭兵燹（音 xiǎn）之灾。唐招提寺中供奉的佛像，不是鉴真从中国带去的，便是由他和弟子们亲手制作的。他们在日本制作佛像时，采用了唐朝发明的干漆夹纻这一最新工艺，弟子们还用此工艺为鉴真制作了一座写真像，是日本的国宝。这座像曾于 1980 年送来北京、扬州两地供中国人民瞻仰。

鉴真和他的弟子们还擅长书法，东渡时携带了王羲之、献之父子真迹到日本，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日本人民仍然喜爱中国书法艺术。

鉴真随行弟子中，有许多人擅长诗文写作，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很有贡献。如思托著的作品《鉴真和尚传》、《延历僧传》就是当时甚有影响的著述。思托还会写诗。法进的《伤大和尚》一诗，在当时颇有影响。

鉴真对日本人民的贡献还有医药学方面的知识传授，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当时日本医生不能辨别药物的真伪，请他鉴定。他虽双目失明，但凭嗅觉可以鉴别中草药，毫爽不误。日本光明皇太后身患重病，日医治疗甚久不愈，后来还是鉴真进献的药物医好太后疾病，誉满东瀛。

唐代宗李豫宝应二年（公元 763 年，日本天平宝字 7 年）5 月初六日，鉴真卒于唐招提寺。

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公元 752 年），小字哥奴，唐玄宗李隆基朝代的著名奸相。他出身于李唐宗室，是李渊叔伯兄弟李叔良的曾孙。林甫善音律，无才学，会机变，善钻营，是一个口有蜜而腹有剑的阴险之徒。初任皇宫侍卫千牛直长。开元初，升为太子中允。不久通过他舅姑夫的叔叔侍中乾曜的关系，升至国子司业。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 年）迁为御史中丞，历官刑部、吏部侍郎。至此，他已跻身李唐高层统治者行列。其时武惠妃专宠，李林甫极尽逢迎谄媚之能事。惠妃之子寿王，极得玄宗钟爱，李林甫托宦官禀告惠妃，“愿护寿王（李瑁）为万岁计”，即是说，他将拥护寿王登上皇帝宝座。惠妃闻禀感激涕零，在玄宗面前经常称颂李林甫之“德政”。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 年）玄宗命中书令萧嵩择相。嵩经过长时期的考核，推荐右丞韩休为最佳人选。宦官高力士将此讯告知武惠妃，惠妃速命李林甫将此讯透露给韩休本人。韩休受命之后，对李林甫感恩不尽，以为李

林甫助力良多。当韩休与真正荐他为相的萧嵩反目成仇之后，就极力推荐李林甫为相，武惠妃又日夜去玄宗耳畔颂李林甫之德，终于在开元二十三年擢升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至此，李林甫终于爬上了朝臣的最高职位。

李林甫面柔而心狠。他广泛交结玄宗左右侍者，打听玄宗的一言一行。故他在朝廷的一切奏议，均是迎合圣意而发。其议乃玄宗所欲言，其事乃玄宗所欲行，心心相印，事事称旨，深得玄宗赏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均因其母失宠而遭冷落，常口出怨望之言，驸马都尉杨洄通过武惠妃禀告玄宗。玄宗甚怒，欲废太子李瑛为庶人。宰相张九龄奏曰：“太子乃国家之本。长在宫中，直接受陛下之教化，怎能一怒之下就予废黜。臣不敢与闻其事。”李林甫在朝议之时，面和气顺，不露声色。退朝之后则密奏玄宗：“废立太子，乃皇上家事，何必谋及外人，陛下决定就行了。”当玄宗决定废太子李瑛为庶人另立皇储之际，他迫不及待地向玄宗推荐寿王李瑁，而玄宗却立了忠王李浚（后更名李亨）。李林甫悔恨其谋未逞，又惧李亨降祸，乃另设图谋太子李亨之策。他先与太子之妃的兄长韦坚伪装和善，过从甚密。接着授坚以要职，恣其所为。然后寻隙逮坚下狱，覆灭其家，并罪及太子之妃韦氏，从而动摇东宫太子李亨的地位。李亨洞悉李林甫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阴谋，乃当机立断与韦妃断绝夫妻关系，这才挫败了李林甫的动摇东宫储位之谋。

李林甫为人忌刻阴险，对于才高权重受玄宗之宠的大臣，必阴设计谋去之而后安。玄宗有一次在勤政楼大宴群臣，会后兵部侍郎卢绚骑马按辔绝尘而去，玄宗望其英武之姿赞赏良久。第二天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召见卢绚说：“你威望素著，上（指玄宗）欲派你去交、广二地任职。你若嫌路远，就请告老还乡。”卢绚十分恐惧，立允其行，即贬为华州刺史，不久又以太子员外詹事的闲职夺去实权，卢绚从此沦为庶人。李林甫本人了无文墨，出言粗鄙，闻者窃笑。故此他对文名素著，天下奉为文宗的宰相张九龄，更是千方百计加以排斥。张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相友善，挺之离异之妻嫁给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遭人诬陷下狱问罪，挺之救释其身。李林甫奏禀玄宗，严挺之与前妻有私因而救释元琰的。玄宗怒贬挺之，张九龄为之辩解。李林甫又奏张九龄党同其罪，玄宗于是罢张九龄宰相之职，以李林甫取代，他从而坐上宰相的第一把交椅。李林甫又荐边吏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察御史周子谅坦言牛仙客不是做宰相的材料，并指责李林甫引荐之私，玄宗予以杖杀。李林甫又将周子谅与已贬的张九龄拉在一起，称周子谅是张九龄同党，所言实为张九龄所指授，因而将张九龄再贬为荆州长史。此后，李林甫又引荐谀己的谄佞之徒陈希烈同知政事。牛仙客与陈希烈惧李林甫之威，不敢过问政事，而他则从此独揽朝政大权。有一次他十分得意地对朝臣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朝堂之外做为仪仗摆设而站立的马匹吗？终日不发一声就给吃喝，若大吼大叫，则逐出仪仗行列。”原来他所需要的即这种一声不吭，听他所为的朝官。谁有反对意见，则必排斥于朝臣之列。自此以后李林甫以首席宰相之权威，上蔽玄宗之视听，下塞臣民之言路，以国为家，玩天下于股掌之上。

李林甫既为首席宰相，又兼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并吏部尚书，集大权于一身，示淫威于朝野。天宝年间改易官名中任右相，加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仆射。天宝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土地、财产、人身）三百户，恩

宠已达极点。李林甫京城府第建筑丽比皇宫，后来玄宗又将长安城东的薛王别墅赏赐给他。林甫喜爱声色之娱，玄宗还赐给两部女乐伎人，至于天下稀有珍宝历年所赐无法计算。李林甫侍妾甚多，女宠、男宠共有五十多人。按唐朝旧有制度，宰相外出不以仪仗开道，不显耀威仪。一般士民遇宰相行路也无须回避，李林甫则与众相不同。他自觉结怨甚多，担心刺客害己。他出入朝廷和自己府第，须有大队人马，前呼后拥，严加保护。他所乘车马的百步之外，均派士卒清道，驱赶往来路人。他的住所，更是重关复壁，警卫森严。他每晚要换几个睡觉地方，连他的妻妾儿女也不知他在何地歇宿。他有25个儿子，25个女儿，成材的甚少。儿子李岫（音xiù），是一个头脑较为清醒的人物，对他的所作所为耽心害怕，又莫可奈何。一次李岫哭泣着对他说："大人身居高位，经事日久，树敌太多，一旦祸至，那时想当一个平民百姓都不可能哪！不如趁早急流勇退！"李林甫权势正盛，如烈日炎炎，怎么听得进他儿子的忠告。他非常不高兴地回答说："已骑在虎背上，没法下来啊！"这是实话，他只能在虎背上骑下去。

杨国忠初列朝班之时，李林甫并不在意。认为杨国忠的机智与狡诈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及至贵妃杨玉环专宠内宫，满门富贵之后，李林甫想加以抑制，为时已晚，徒唤奈何。刚好其时西南少数民族发动叛乱，李林甫以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为由，把他逐出朝班，远镇西南边鄙，虽能拥兵自大，总比放他在朝廷碍手碍脚的要好得多。这时正宠贵妃的玄宗却是另一种想法，为了讨好杨玉环的欢心，让杨氏一家鸡犬升天，正欲授杨国忠宰相之职，怎么能让其永驻边睡呢？所以在杨国忠辞行之日，玄宗特地嘱咐，把边事安置好以后回京，另有任用。玄宗写给杨国忠的一首送行诗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要任他为相之意。李林甫内心虽然十分不悦，但也无可奈何。加之这时李林甫已患重病，力不从心，无法和杨国忠一较胜负，只有唉声叹息而已。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月，玄宗幸骊山温泉宫，李林甫抱病随行，旅途颠巅之辛劳，使疾病加剧，危在旦夕。服药无效，只得求神问卜。巫者指示回生之法云："若能见玄宗一面，病可立愈。"家人通过内侍禀奏玄宗，玄宗欲往病榻探视，被左右所阻。于是用一折中之法挽救李林甫之命，玄宗登华清宫的降圣阁，将李林甫病榻置于阁下，遥相观望，玄宗以红巾在空中摇晃，像是为李林甫招魂聚魄，结果还是不能起死回生，仍然一命呜呼了。

李林甫之死，使满朝文武松了一口气。仇者骂他"死有余辜"，同党惋惜靠山已倒，玄宗叹息失去善体圣意的宠臣。对于杨国忠来说，真是喜出望外，既去了一个政治对手，又可接任宰相大权，还可报复旧日外贬之仇。杨国忠趁李林甫未葬之际，暗里唆使安禄山出面揭露他的旧恶。安禄山心狠手毒，逼迫降将阿布思入朝面圣，诡称李林甫收他为义子，要他在边睡发动军士叛乱，李林甫在长安夺权，内应外合，谋夺李唐天下。这一指控，如石破天惊，震骇中外臣民。他的女婿杨齐宣怕株连灭族，立即出首揭发李林甫罪恶以自保，妄称李林甫曾以巫祝的"厌胜"之术诅咒皇上，图谋不轨。玄宗年迈昏庸，不辨真伪，立即下诏，剥夺所授一切官衔，用庶民之礼葬之。抄没全家财产，子婚人等均流放到岭南以外。李林甫的下场，虽然不能理解为"恶有恶报"，但确实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李林甫在相位19年，上蔽玄宗视听，下塞臣民言路。"开元之治"的清明政治，至此已荡毁无存。玄宗晚年的腐败耽乐，与他有很大关系。

名将郭子仪

郭子仪（公元 697 年—781 年），唐代中叶的著名将领，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朝代。他是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开元中以武举登第。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任天德军（今属内蒙）使，兼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太守、朔方（今陕西北部）节度兵马使。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11 月安禄山在范阳（今河北涿县）起兵叛唐，玄宗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军（今宁夏灵武南）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命率本部军马东讨安史叛军，很快收复云中马邑（今山西朔县）、东陉（今河北属地）等十余郡，以功加封御史大夫。

李光弼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西）人，以骁勇善战闻于军旅，郭子仪和他向有嫌隙，在时人心目中有两虎不能并存之势。当天宝十五年叛军猖獗，中原扰乱，玄宗遍求良将，并以河北（今河北地区）、河东（今山西地区）防务人选征询郭子仪的时候，郭子仪立即推荐李光弼堪当此任。在国难当头之际，郭子仪能秉公心、泯私怨，说明他具有高尚的人格，时人许之以高义，得到社会的普遍赞扬。这年 6 月，哥舒翰为叛军所败，潼关失守，京城震动，玄宗逃往四川。7 月肃宗即位于灵武，身边只有临时凑聚的乌合之众，牟容不整，士气低落，而盘踞两京（长安、洛阳）的贼军，声势浩大，气势逼人。肃宗诏郭子仪、李光弼率兵勤王，大军西进灵武，使唐朝临时首都的人心士气为之一振，从此郭子仪的朔方军成为唐朝恢复两京的中坚力量。肃宗即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三月，郭子仪军威大振，大胜于潼关之后，攻克蒲州，收复永丰，自此以后，潼关陕西境内再无安史叛军的据点。10 月郭子仪又大败安庆绪之军于陕州（今河南陕县）之西，安庆绪渡河逃至相州（今河南安阳），郭子仪护卫广平郡王李豫（后为代宗皂帝）入洛阳，东都人民夹道欢呼王师归来，在民心士气上以极大的鼓舞力量。以军功卓著，加封子仪为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不久郭子仪入朝谢恩，肃宗派御林军仪仗队迎于灞桥（今陕西西安市东）之上，肃宗慰抚郭子仪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这话倒是实话，若无郭子仪的朔方军，肃宗想收复西京，即位长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破贼河上，擒伪将安守忠献于朝廷，肃宗率满朝文武迎于长乐驿，进位中书令。至此，子仪的权位已臻极至，月满则亏，水盈则溢。人君之忌，宦竖之谗，飞短流长，此伏彼起。这年 9 月，唐朝制定了一个围歼叛军计划，调集了郭子仪、李光弼、王忠礼、安嗣业、鲁炅（音 jiǒng）、季广琛、崔光远、许叔冀、董秦等 9 个节度使的兵马，围歼贼酋安庆绪。可是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竟然不设中军之帅，统一号令，指挥战斗。若设元帅，当然非郭子仪莫属。而肃宗的解释是：“以郭子仪、李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却以宦官鱼朝恩为宣抚使，代表皇帝指挥 9 节度使之兵马，已预示了这一战斗的失败结局。肃宗所言郭、李二将“难相统属”是假，对二将（主要是郭子仪）失去信任，怕他们拥兵自大，难以驾驭是真。自此始，开创了唐朝宦官统兵的恶劣先例，此后恶果丛生，遗患无穷。乾元二年史思明精兵南下，复陷卫州（今河南汲县），伪称燕王，敌焰复炽。王师虽众，但军无主帅，进退无略，师老无功，只好敕令诸军各还本镇辖地。单令郭子仪的朔方军驻守河阳（今河南孟县），保卫东都。3 月复令郭子仪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宦官鱼朝恩向惧郭子仪之军威，

趁其军机未预之际，中伤其短，蛊惑肃宗召子仪回京，罢其兵权，以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帅。即便如此，郭子仪仍心系王室，忧国忧民，不断向朝廷提出军事建议。郭子仪罢职，敌军士气大振，史思明再次占领河洛广大地区，长安震动。乾元三年正月虽再次授郭子仪邠宁（今陕西彬县）、鄜（音 fū）坊（今陕西富县）两镇节度使。这只是一个空头衔，不让他上任带兵，仍然留居长安，以利控驭。对此朝廷谏诤之言骤起，公认郭子仪有保卫社稷的巨大功劳，有肃清叛军的军事才能，这样让他投闲置散，的确是朝廷的一大损失。肃宗在巨大压力面前，不得已于上元元年（公元 760 年）九月以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以管崇嗣为副都统。并令他率领英武、威远两支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取道邹宁、朔方、大同、横野，直捣叛军老巢危阳。肃宗下诏十日，却被宦官鱼朝恩所阻，不让郭子仪成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大败于邙山，鱼朝恩败退于陕州。加之河中军哗变，杀死主帅李国贞；太原军哗变，杀死节度使。朝廷耽心哗变士兵与叛军合流，局面便无法收拾。派年轻将领前去弹压，不孚众望，没有权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再度起用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军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今山西新绛）。是年 3 月，郭子仪临危受命，上任前辞别肃宗。此时肃宗已卧病不起，无法接见。郭子仪奏请说：“老臣奉命，将战死于外，不见陛下，死不能瞑目啊！”他系心肃宗，忠于唐室，仍如往昔。肃宗召他至病榻之前，泣谓郭子仪说：“河东之事，全部委托给你了。”郭子仪洒泪而别。郭子仪至绛州住所，第一件事就是擒拿杀害主帅李国贞的贼首王元振等数十人，当众正法，伸张正气，遏制邪恶，以振军威。太原将领章云京亦效法郭子仪，擒诛贼首。从此以后，诸镇官兵军纪肃然，军威复振。

上元二年四月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自矜拥代宗即位有功，把持朝政，猜忌元老重臣，对郭子仪更加防范，奏请代宗罢郭子仪兵权，召回长安管理肃宗陵墓事务。郭子仪回京后，将肃宗写给他诏敕 20 卷，献给代宗，使其洞察自己报国忠心，以释猜忌。代宗阅后诏答说：“我不德不明，使大臣产生忧疑之虑，深以为愧，望勿以为怀。”时叛军首领史朝义尚盘踞洛阳，朝廷派雍王李适（音 kuò，即后来的唐德宗）为元帅率师征讨。代宗欲以郭子仪为副帅，恰值鱼朝恩、程元振杀大臣裴茂、来瑱，播乱朝政，郭子仪之任命也就搁置起来。

宝应二年（公元 763 年）十月，吐蕃陷泾州，刺史高晖被俘投敌，引贼深入京畿，劫掠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东），逼近京师，代宗无计可施，再次起用郭子仪，出镇咸阳。上次罢职，旧部散失殆尽。这次受命出征，只访求到旧部 20 人。没有战马，只得借用农民耕田牲畜以代。郭子仪赶赴咸阳之日，蕃军已渡渭水，代宗避难陕州（今河南陕县）蕃军进驻长安，扶持李承宏为儿皇帝。这次兵难，朝野皆咎责宦官程元振。程元振惧，不敢还京，挟天子迁都洛阳。郭子仪上表恳请还都，以安定天下。十一月代宗还京，赐郭子仪铁券以记功，并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忠义。

吐蕃之难方平，叛将仆固怀恩于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十月义引吐蕃、回纥（音 hé），党项联军数十万南下，郭子仪出镇奉天（陕西乾县），坚壁以待，贼军不战而退。永泰元年（公元 765 年）五月，仆固怀恩又诱引叶蕃、回纥、党项、羌、浑等蕃兵及山贼 30 万贼兵南下，天子亲征，急召郭子仪屯兵泾阳，以 1 万人抗击 30 万之众，被贼军围困数重。郭子仪命李国臣、高升

二将拒其东，魏楚玉挡其南，陈回光挡其西，朱元琮挡其北，郭子仪本人率甲骑 2000 出没于前后左右，以为疑兵。虏见而问唐军：“此是谁？”答称：“郭令公也（指郭子仪）。”回纥将惊道：“令公尚存么？”回答说：“正率众将抗敌。”回纥道：“仆固怀恩妄称令公已亡。既健在，能见之否？”郭子仪免去盔甲，布衣以出。回纥众将大惊，伏地请罪。郭子仪以酒相待约盟而散，终于化解了危机。

宦官鱼朝恩对郭子仪衔恨最深，数夺兵权，终无结果。总想挑起郭子仪对朝廷的仇恨心理，以从中渔利。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十二月，以吐蕃寇泾州之机，鱼朝恩派人盗掘郭子仪之父的墓葬。朝野均知鱼朝恩所为，大家都担心郭子仪将大坏朝纲，报仇雪耻。外敌若乘乱而进攻，唐朝必亡。郭子仪心知宦怪用心狠毒，为了国家社稷，忍辱负重，报效朝廷。郭子仪入朝，不言此事。及代宗询问究竟，郭子仪奏曰：“我带兵多年，不能禁止士兵挖人之墓，其事甚多。我父之墓被挖，是上天给我降罪的结果，不是仇人为患。”以大智大勇大忠之至诚，化解了宦官制造的危机。

德宗即位，赐号向父。建中二年六月十四日逝世，时年 85 岁。德宗废朝五日，群臣依次往吊。唐朝旧制，一品官吏坟高 1 丈 8 尺，为了纪念这位功臣，特敕令加高 10 尺。谥曰“忠武”，和代宗之灵共同祭祀。郭子仪的一生，为了唐朝社稷，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穆宗第二子，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唐朝后期，隐患丛生，矛盾激化，特别是宦官掌握了禁军，把持着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宦竖操纵。自宪宗李纯之后，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懿宗李漼（音 cuǐ）由宦官王宗实拥立；僖宗李漼由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拥立；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拥立之外，宦官还操有弑杀之权。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天子式微，阉竖坐大，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仇士良一生曾弑二主、杀一妃和四位宰相，贪酷暴虐 20 余年，恩宠不衰，因他有一套驾驭皇帝、篡权自大的方术。会昌三年（公元 843 年）仇士良告老退休，众宦官以隆重之礼送他还府。他为了表示对众宦的感谢，将自己数十年来专权乱政的经验传授给他的徒子徒孙。他说：“天子不能够让他闲暇起来。若有空闲时间，他一定会阅读古今书籍，会见有知识的大臣，接受大臣们的治国方略。政治经验丰富了，就会深谋远虑，对财宝器玩的爱好也会减弱，游幸声色的兴趣也会降低，而我们的恩遇必然渐薄而权也必然渐轻了。为了你们的前途着想，莫若多方搜寻奇珍异宝，多多豢养猎鹰猎马，每日用击球、打猎、娱声、幸色的办法去蛊惑皇帝，让他在声色娱乐之中，耽侈求靡，沉沦下去。这样他必然厌恶经书中的治国之道，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充耳不闻，朝廷内外的一切大权自然控制在我们宦者手中。这样一来，我们手中的恩泽和权力谁能夺得去呢？”这的确是为宦之道的经验之谈，难怪他二十多年作威作福而恩宠不衰。由此可见，中唐时期，天子只是宦官手中用来争权夺利的玩物，稍不惬意，就可以废旧

立新。唐敬宗李湛只做了 3 年皇帝就被杀掉，唐武宗李炎只做六年皇帝就被废掉。这就是宦官杨复恭狂妄叫嚣“定策国老，天子门生”的缘由了。无怪唐文宗受宦官之辱经常涕泪沾巾，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大和元年（公元 827 年）即位伊始，将宫中的道士纪处玄、杨冲虚及伎人李元戢、王信等流放岭南。大和三年（公元 829 年）又诏令凤翔（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淮南（今安徽寿县）二道的官吏将此前选进皇宫的女乐 24 人遣归原籍。开成五年（公元 840 年）又从后宫放逐宫女 3000 人，裁撤教坊乐工、内监 1270 人，并将供皇室打猎使用的五坊鹰犬统统放掉，还诏令禁止各地向朝廷进贡宝物珍玩绢绣。唐文宗的这些作为，是对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声色狗马珍玩以蛊惑人君的“为宦之道”的一种反击。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材，改变朝廷由宦豎为主的官吏结构。大和二年，唐文宗诏令举行“直言极谏科”的策试，举子刘蕡（音 fén）的《直言极谏策》五千余言，对宦官乱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谈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现状时说：“以亵近（指宦官。亵：音 xiè）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举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权，被五六名宦官把持着，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刘蕡的对策论及贪官污史时说：“百姓对于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敌。现在国家困穷，黎民流散，盗贼并起，国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危在旦夕。”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是“勒令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惰之徒，从事农业种植工作，节省那些不必要花费的钱财，救济社会上的穷困百姓。”刘蕡之言，语语切中时弊，是一篇极有见地的策论。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他在朝廷任职；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干预，怕危及自身的安全。大和末年，文宗设谋铲除宦官势力，刘蕡对策中的意见，显然发生了影响。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任命宋申锡为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大和四年（公元 830 年），文宗命宋申锡为相。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累官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浇薄，朋党骤兴之际文宋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自全之策。大和八年（公元 834 年）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易经》，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大义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火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公元 835 年）10 月 21 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则提议，天降祥瑞于皇

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驻，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吏看后奏称，不似大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上。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 500 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株灭宦官的“甘露之变”事件。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 500 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 1000 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 500 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这些官吏还遭灭族之祸，株连甚众。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竖更加专横，皇帝更加受辱，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

牛李党争

李德裕（公元 787 年—850 年），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祖父李栖筠，是代宗朝的御史大夫。父李吉甫，是宪宗朝宰相。李德裕年少时好学上进，精通《汉书》及《左传》，明察历代盛衰兴亡之道。他不愿走一般读书人科举取仕的老路，而以门荫步入仕途，在当时引起了好坏不同的两种评论。誉之者认为他鄙视科举，反对进士浮夸不实的文风。贬之者以为他重视门阀出身，以祖荫得官，不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俸禄。这两种意见，似乎都有偏颇。贞元中，其父贬谪南荒，随父迁流，不求仕进。元和初，其父再度入朝为相，避嫌不在朝中谋职，累任各地方官吏府中文书下吏。

“牛李党争”是唐后期朝臣之间的派系斗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儒，李党的首领即李德裕。牛李党争，从酝酿到结束，将近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朋党之争。起于宪宗朝代。元和三年（公元 808 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选拔人材，举子牛僧儒、皇甫湜（音 shí）、李宗闵 3 人在对策中痛斥政治腐败、贪官污吏的种种罪行，确实触及到当时的社会弊端。他们的策文被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等，要求朝廷优先录用。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对此大为不满，认为三人策文是危言惑众，诋毁朝政，向宪宗皇帝弹劾主考杨於陵、韦贯之和复试官裴垍（音 jì）、王涯等四人评卷不公之罪。宪宗皇帝依宰相李吉甫之言，将杨、韦、裴、王四人贬出朝廷，举子牛僧儒等三人不予录用。朝野哗然，民情鼎沸，争为牛憎儒等鸣冤叫屈，谴责宰相李吉甫妒贤忌能，对朝廷构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唐宪宗为了平息风波，于同年把宰相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把先前贬出的翰林学士裴垍召回担任宰相职务。经过这番黜升进退之后，朝臣之中自然形成了以“直言极谏”考试为起因的对立派别，在此后的一切政治活动中均染上了对立两派的政治色彩。两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各有得失，历来论者均就事论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元和年间，两派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如

何对待藩镇割据问题。李党主张平叛，牛党主张安抚。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李党是而牛党非。由于宪宗和当权的宦官支持平叛，故此元和年间李党在朝得势。这一时期，李德裕、牛僧儒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郁，故元和年间还是牛李党争的初期阶段。

长庆元年（公元 821 年）牛党人物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考试，另一牛党人物右补阙杨汝士为主考官，录取进士 14 人。其中有牛党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主考官之弟杨殷士，牛党宰相裴度之子裴譔（音 zhuàn）等“关系户”均登甲第。前任宰相段文昌向穆宗检举此次进士录取不公正，有打通“关节”的舞弊行为。当时李德裕及元稹、李绅均在朝担任翰林学士之职，穆宗询问李德裕“关节”“舞弊”之说是否属实，李德裕表示肯定，元稹、李绅异口同声地责其不公。穆宗又另派官员复试，结果原榜录取 14 人之中，只有 3 人勉强合格。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遭贬逐。牛李党争之始由进士考试而起，牛李二党结怨之深亦因进士考试而成。从此牛僧儒对李德裕怀恨甚深，牛李党争进入了斗争激烈阶段。

李德裕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口碑甚好。长庆年间，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时，他废除境内规定祀典以外的寺庙 1010 所、私邑山房 1460 间，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堵塞了赋税漏洞，增加了国库收入。还上表敬宗废除浙西进贡金银器皿及丝织品的诏命，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他还主张强化朝廷权威，维护国家统一。文宗大和四年（公元 830 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第二年吐蕃将领悉怛（音 dá）谋将所统治的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归附唐朝。德裕当即派兵接管，入驻维州。并向朝廷奏陈用兵制敌，巩固边防事宜。时任宰相的牛僧儒，认为唐与吐蕃已结盟好，不宜违约开衅，制造不和。文宗听从牛僧儒的意见，诏命李德裕撤归驻维州之兵，降将悉怛送归吐蕃处置。唐与吐蕃虽然结盟，但大和四年吐蕃毁约攻唐，掠夺人畜，侵扰边境，唐朝单方面遵守和约，则毫无意义。牛僧儒对此事的处置，反映了牛党一贯的妥协退让策略。这件事大大激化牛李二人的矛盾。

开成五年（公元 840 年），文宗驾崩。第二年武宗继位，建元会昌。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言听计从。李德裕从政以来从未有过这种风虎云龙的际会时刻。是时回鹘在北方受挫，整个部落向南迁徙，过着艰难的徙荡生活。武宗采纳李德裕对该部落的怀柔之策，一方面给他们发粮赈济，拯救艰危；另方面又明查暗察，防范有加。在处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种正确的决策，当时受到好评。对于那些寇边抢掠扰乱内地社会安定的部族，则采取极强硬的手段，予以坚决的回击。会昌三年（公元 843 年），回鹘另一部族首领乌介克汗，率众大肆抢掠云边之北（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境内）地区，李德裕立即命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沔与幽州（今北京地区）节度使张仲武联合讨伐。刘沔部将石雄夜袭乌介克汗大本营，重创敌军，乌介夜遁，唐军取得重大胜利。

武宗笃信道教，于会昌五年诏令废佛。李德裕从避免减损州县户口出发，积极支持武宗的废佛决定。当时毁庙驱僧，勒令返俗，从事农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赋税的增长确有助益。

李德裕这次入朝为相，虽然一派掌权，政由己出，毫无掣肘之虞，并且在平叛、破回鹘、废佛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赞誉之声盛传朝野。但他在行使职权的时候，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仅为牛党所恨，也为宦官所

不容。会昌六年（公元 846 年）武宗死，宣宗即位，他的厄运立即降临。宣宗一向讨厌李德裕飞扬跋扈的作风，即位之后即贬他为东都（洛阳）留守，并将李党从朝廷各级岗位上纷纷逐出，又将牛党令狐绹、崔铉等人召入为相，牛党首领牛僧儒也返朝为官，真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司马，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长达 40 余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才告结束。

从中晚唐当朝官吏来考察，李德裕还是一位有作为的宰相。他主张强化朝廷权威，维护国家统一，抑制藩镇势力，反对和边的姑息政策，加强吏治，扶植农桑等等方面，均有自己的建树。作为一名宰相，没有俗话所说的“宰相肚内可撑船”的雅量，胸次窄狭，不能容物，这就是他一生以失败告终的真正原因。

会昌废佛

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 10 多万人，他们的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当世的一大公害。《旧唐书·高祖纪》即称：“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所以李渊于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强令僧尼婚配返俗，既要蕃衍人丁，又要发展生产，并且承担兵役、徭役，以改善唐朝建国初期的人口流失、经济凋蔽的艰难处境，堵塞“浮惰之人，苟避徭役”，“托号出家”的政策漏洞。唐太宗李世民早期的宗教信仰是崇道非佛。玄奘从西域取经归国之后，御制译经序文，标志着他宗教信仰的改变。武则天时代，佛教服务朝政之迹渐明，因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武则天称帝之前的两个月，有一名叫法明的和尚，乘机伪撰了《大云经》四卷献上，胡编乱诌，说什么武则天“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做天下主。”十分及时地为武则天的称帝活动找到了宗教依据，获得了佛教徒的拥护和广大愚夫愚妇的支持。武则天则喜出望外，对法明和尚奖誉倍加。为了酬谢佛门之助，武则天诏令在洛阳龙门雕刻一尊 10 余米高的佛像，并在长安、洛阳及全国州县各建“大云寺”一所，作为各地礼佛活动的中心。武周时期佛教兴盛的另一原因是，此时流行的禅宗佛教，与此前的净土宗教义不同，它吸收了中国儒家理论中的“孝悌”观念，强调“孝”为成佛之本。佛教的外衣，纳入儒家哲理的内核。这样的佛教，更适合中国信徒、特别是知识阶层信徒的思想模式，信者自然更多了。

唐朝佛教在肃宗、代宗朝代，进入了又一兴盛时期。这时流行的密宗教派（亦称“真言宗”），在佛事活动中往往筑坛行巫，巫佛结合，欺骗性更大了。安史之乱时期，朝廷兵微将寡，打不过安史叛军，统治者幻想得到超自然的力最战胜叛军，化险为夷。故此肃宗在灵武招募一群和尚，每天诵经礼佛行巫，既为朝廷祈福消灾，又以“厌胜”巫术诅咒叛军早日消亡。以郭子仪为首的联军收复长安之后，巫僧居然分享胜利果实，得到肃宗的褒赏。代宗时代在边患战争中，也用巫僧祈福消灾，礼佛优憎，成为那时的风气。

当时有个名叫一空的和尚，在长安周围占有大片良田；在五台山建金阁寺时铸铜为瓦，瓦上鎏金。朝廷还赐号公爵，食邑 3000 户，富甲王侯，死后还赐号司空。由于唐朝寺院有免税特权，因此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就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这还是玄宗以前的社会现象，肃、代二宗时代就更为严重了。寺院除了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设有“法僧”，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还有“僧兵”，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即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的“会昌废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武宗的“会昌废佛”除了以上历史背景之外，还与他本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唐朝皇帝自高宗李治以为李氏为老子李聃（音 dān）之后裔，因而有崇信道教之传统，武宗就是崇道皇帝之一。他在藩邸尚未即位之际，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设坛受箓，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 840 年） 2 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 81 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箓”，成为 1 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人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说：“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 100 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武宗不让道士干预“军国大事”的辩词是不实的，“会昌废佛”之役，据《旧唐书武宗本纪》的记载，正是“衡山道士刘玄静及归真胶固（结成团伙），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老子化胡”、“道不如佛”，互争短长，历朝如是。武宗的废佛诏令无疑是唐朝特殊政治、经济历史背景和自己崇道排佛的宗教信仰的混合产物。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四月，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 2 所，每寺各留僧人 30 名。天下诸郡各留 1 寺，寺分 3 个等级，上寺留 20 僧，中寺留 10 僧，下寺留 5 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拆毁天下寺庙共有 4600 多所及以兰若（音 rě 为名私设僧舍 400 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 15 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 26.05 万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 50 万以上。这次废佛活动，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尽管武宗“会昌废佛”有他崇道排佛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但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会昌废佛”的同时，大秦景教穆护、

袄（音 xiān）教僧人亦令还俗，寺庙亦予拆毁。

武宗“会昌废佛”的诏令在全国执行情况互有参差。有些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很大，对唐朝中央诏令拒不执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废佛，以致其他被废之地的僧尼，纷纷逃往河北三镇辖区。有些地方虽然执行废佛诏令，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总之，“会昌废佛”是寺院势力和唐朝政府政治、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对佛教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黄巢起义

黄巢（？—公元 884 年），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其家世代盐商。《新唐书》称他文墨不多，“稍通书记”，未免过贬。《全唐诗》卷 733 载有黄巢菊花诗二首。第一首为《题菊花》，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说是“五岁时”的作品，未可信从。其诗云：“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后两句可以见出他的个性来。以近体诗的知识水平来衡量，一个“稍通书记”的人是写不出来的。第二首题为《不第后赋菊》，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仄韵诗有一股傲岸、乖戾、肃杀之气，与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大相径庭。此诗的意脉是第一首的延续和发挥，虽然具有造反派杀气腾腾的味道，但构思的巧妙，辞句的锋利，格律的工整，实在表现出非同凡俗的精神。题中“不第后”三字，说明他参加过进士（或其他级别）考试，更不是一个“稍通书记”的半文盲哩。他“不第后”大概就继承祖业，以贩卖私盐为生。唐朝末年，盐为国营商品，管理极严，唐律规定，若有毁坏盐池，私售盐土（粗制盐），捣损盐堑或持械贩盐者，均处以极刑。故此，当时的私盐贩子，都是武装团伙，各立帮派，既抗官兵，又防伙并。黄巢就是在武装贩盐的惊涛骇浪中，培养了自己的“善击剑骑射”，“喜养亡命”的叛逆精神和从事战斗的勇略。

唐懿宗咸通（公元 860 年—873 年）末至僖宗乾符（公元 874 年—879 年）初，中原大地连年发生灾荒，黄河以南灾情特别严重。农民逃荒避难，背井离乡。在这种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的时代里，也是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自由表达的极好时机。当时有一首民谣说：“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乾符二年（公元 875 年）初，河南农民王仙芝、尚君长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发动起义，攻占曹州、濮州。“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无疑起了农民革命的宣传作用。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 8 人招募饥民数千响应。不久两支农民军会合，协同作战，声势十分浩大。乾符三年十月，王仙芝攻陷洪州（今江西南昌）后，向朝廷表请归顺之意，未准。同年十二月蕲州（今湖北蕲春）刺史裴渥向王仙芝劝降，罢兵息战。王仙芝、黄巢等将领至裴渥驻地会饮言和，大有化干戈为玉帛之机会。不久，朝廷即封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衙，并派中使前来安抚和慰问，王仙芝十分高兴。黄巢质问王仙芝说：“你投降朝廷，得高官厚禄，5000 起义兄弟怎么办？请还我士卒，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二人发生争吵，黄巢打伤了王仙芝的头部，愤然出走。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众怒难犯，王仙芝不敢接受朝廷的封赠，劫持蕲州部分官兵，又四出攻击州县。

乾符五年（公元 878 年）王仙芝又进攻河南，朝廷又命宋威、曾元裕为招讨使，而以宦官杨复光为监军。杨复光遣部将吴彦宏招降王仙芝，王仙芝

即派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 3 人为允降代表，并致书宋威要求朝廷授己以节度使的官职。由于这次招降活动乃宦官监军杨复光所为，招讨使宋威等怕杨邀功，彼此产生了嫌隙。对王仙芝的 3 名使者，杨复光的奏称乃王仙芝允降代表；而来威则称作战中俘虏的敌酋。朝廷派人至军中调查，二人各执己见，无法明辨是非，只好作为反叛而斩首示众。王仙芝在盛怒之下，大举进攻河南各州府，宋威率兵抗击。乾符五年春（公元 878 年），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战死，5 万余义军牺牲，起义军受到重大挫折。

黄梅战役之后，王仙芝的余部由尚君长之弟尚让率领投奔亳州（今安徽亳县），与黄巢所部会合。义军将领一致推举黄巢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统一指挥 10 余万农民起义队伍。“冲天”即推翻唐朝统治之意；“均平”是政治纲领，要实行割富济贫的革命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显然，这种“冲天”“均平”的思想反映了晚唐社会起义农民的理想和愿望。在这种政治口号的鼓舞下，农民纷纷参加义军。

黄巢于乾符六年三月攻占福州。军纪严明，讲究策略，在争取封建知识分子参加和支持义军方面，做了许多事情。当时军中流传一种民谣：“逢儒则肉，师必覆。”战斗中俘虏官兵，凡是真正的“儒”者一律释放。这年的 9 月，进攻南方重镇广州。在进攻之前，他致书节度使李迢，若朝廷授以天平节度使之职，即可休兵罢战，愿受朝廷节制，而朝廷只授以“率府率”的小官。黄巢大怒，。一举攻克广州，并文告天下，义军即将北上，直赴长安。问罪朝廷，铲除阉宦。还严明义军禁令，凡犯贪污受赃之罪的将领和地方官吏（此时在占领区已任命地方行政官吏），处决全族。这些法纪，深得民心，在北上战斗中，起了巨大作用。黄巢义军于广明元年（公元 880 年）十一月攻占洛阳。市民对“整众而行，不剽财货”之师，表示热烈欢迎。百姓皆“赢粮而影从”，以百万之众，直捣长安。年底进据京城，僖宗和大批官宦逃往成都。义军入城后，向贫民散发财物，并由大将军尚让向市民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唐那样贱视你们，望安居无恐。”十二月十八日（公元 881 年 1 月 16 日）即王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义军将领给黄巢上的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氏为皇后，以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俦、黄谔、尚儒为尚书，方特为谏议大夫，皮日休等为翰林学士。原唐朝官员，四品以下者酌情留用，三品以上全部罢官。黄巢在长安执行严惩皇族成员政策，唐皇族留居长安者几无遗类，全被杀光。义军查获伪降将领张直方家的夹壁中藏有高官显宦 100 余人，全部处死。大齐政权还没收豪族财产，号之为“淘物”，分给贫民百姓。勒令富室之人不准穿鞋，一律赤足行走。

黄巢占领长安以后，一没有追击僖宗，二没有消灭唐军有生力量，三无明确的政治经济政策，四无后勤补给基地。在关中各镇坚壁清野封锁以后，形势立刻发生了不利于义军的变化。中和二年（公元 882 年）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朱温叛变投敌；沙陀援军 1 万余人南下进击义军。黄巢发觉困守长安极为不利，乃于三年 4 月东撤。在东撤过程中，又犯战略错误，他不向朝廷力量薄弱东南方向撤退，却向藩镇实力雄厚的北方撤去，这就堕入了官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攻打陈州战斗中，先锋孟楷阵亡。黄巢意气用事，为了给孟楷报仇，竟令全军围攻陈州长达 300 天。又给官军以组织力量，部署战斗的时机。中和四年（公元 884 年）春，朝廷再招沙陀生力军南下，黄巢只得北逃。6 月在渡汴河之际，遭沙陀军腰击溃败，尚让投降，至此已

溃不成军了。在唐军穷追之下，黄巢逃到山东，被包围在泰山的狼虎谷中，于 7 月 13 日兵败自杀，一说是被他的外甥林言所杀。历时 9 年的唐末农民起义，至此宣告结束。不久，唐朝覆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朱温称帝

朱温（公元 852—912 年），赐名全忠，更名晃。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兄弟三人未成年而丧父，随母佣于萧县刘崇家。朱温成人以后，“不事生产，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刘崇恶其懒惰成性，每加杖责，而崇母特予爱怜，多次劝戒家人说：“朱三非常人也，汝辈当善待之。”问其故，崇母说：“我见他熟睡之际，化为一赤蛇。”“赤蛇”，即“赤龙”，乃帝王之象，贵异之征。僖宗乾符年间（公元 874—879 年），关东地区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黄巢聚众起义于曹（山东曹县）、濮（河南范县）之间。朱温偕二兄参加起义队伍，他勇敢善战，屡建奇功，升任为义军队长。僖宗广明元年（公元 880 年），黄巢称帝于长安，命他驻守于东渭桥。此桥乃保卫长安的重要据点，安危所系，足见黄巢对他的信任和依赖。当他屯兵东渭桥之际，唐夏州刺史诸葛爽进逼栎阳，将攻长安以恢复旧京。朱温受黄巢之命，策反唐军。他阴派谍使，深入唐军，诱以利禄，示以兵威，居然说服夏州刺史诸葛爽率所部之兵背唐投巢。这次策反工作的胜利，表明朱温并非一勇之夫，而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大将了。中和元年（公元 881 年），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东拔南阳，西败唐朝邠（今陕西彬县）、岐（今陕两岐县）、鄜（今属陕西）、夏（今陕西横山）之师于兴平，声威日著，黄巢诸将与朱温之间的猜忌也就日渐突出。当他于中和二年任同州防御使之际，遭到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之多次打击，十上乞援表章，均被左军使孟楷所扣压，全军招致重大挫败。朱温鉴于黄巢阵营内部倾轧激烈，众将严重不和，内忧外困，处境艰难，审时度势，知其必败无疑。与其一起败亡，不如改换门庭，自寻生路。朱温与左右密商，杀掉黄巢派驻的监军使严实，与大将胡真、谢瞳率领全部兵卒向王重荣投降。这一变故，对黄巢来说，是走向败亡的先兆；对唐僖宗来说，是赢来平叛胜利的曙光。当即派人从四川避难之所到河中颁诏，封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

唐中和四年（公元 884 年），朱全忠和巢军经过大小四十余战，攻克瓦子寨、西华寨，解陈州之围，声威远震。是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僖宗之诏、率数千骑兵前来会合，合力破巢，大败巢军于王满渡。5 月朱全忠和李克用凯旋于汴梁，克用屯军上源驿。在犒赏庆功的宴会上，克用醉后失态，视全忠为黄巢旧部，有贱视轻侮之言，引起全忠恼怒，连夜命甲士围攻克用军帐，恰值是夜暴雨滂沱，雷鸣电闪，克用于深夜逾墙而逃。从此，二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相互攻伐二十多年，虽互有胜负，但均不能消灭对方而泄恨。致使克用死前含恨授子存勗以“三矢”遗嘱，一矢讨幽州燕王刘仁恭，一矢讨契丹，一矢灭朱全忠。望克承父业，代己报仇，以安慰自己的在天之灵。以后十余年间，全忠以汴州优越地理条件为凭借，南征北讨，逐步吞并割据中原与河北的各地藩镇，成为雄镇一方、威慑朝廷的军事力量。朝廷对他曲从俯就，封赏迭至。仅从中和四年至龙纪元年的 6 年时间里，累迁的官职有：沛郡侯、检校太保、沛郡王、检校太傅、吴兴郡王、蔡州四面行营都统、检

校侍中、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东平王等职。其间为他刻碑记功、锡铁券，诏改他的故乡为“衣锦乡”、故里为“沛王里”。而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封赠是文德元年加封的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从此晚唐诸镇之兵大都由朱全忠统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官职。

光化三年（公元 900 年），宦官左军中尉刘季述囚昭宗李晔于东宫，拥德王李裕为帝。季述为了得到朱全忠的支持，命假子刘希度驰告全忠，谎称愿以皇位相赠。朱全忠正权衡利弊“大计未决”之机，派往长安探听消息的使者李振回汴献策说：“宦官作乱，历来是成帝业者之良机。现今宦官囚禁天子，是勤王除奸而树威于天下的最好时刻。”全忠心领神会，复派李振去长安与宰相崔胤合谋勤王之策。崔胤与侍卫将军孙德昭，诛杀刘季述、王仲先二宦，昭宗得以复位，封朱全忠为梁王。

昭宗复位之后，朝廷军政大权均委之于宰相崔胤。崔胤在理政之中，“裁抑宦官，宦官侧目”，密设驱崔之策。他们煽动禁军鼓噪呼嚣，谎称宰相减损禁军冬衣，克扣禁军伙食，大有哗变抗争之象，在宦官的胁迫之下，昭宗不得已罢免崔胤相职，自己又落入宦官掌握之中。崔胤密召朱全忠入朝辅政，兵入陕西，宦官韩全诲等劫持昭宗逃至凤翔，依靠节度使李茂贞庇护。朱全忠进攻凤翔，屡被茂贞所败，师老无功，相持不下之际，乃用指挥使高季昌的诈降计，令马景伪装叛将投奔李茂贞，诡称朱全忠当夜遁还汴梁，以缓师老粮尽之危。李茂贞信其言，连夜派兵追击。朱全忠虚营以待，大败李茂贞。在强兵压境之下，李茂贞愿意送还昭宗，诛杀阉党，以赎其罪。昭宗离开凤翔，暂驻全忠军营时，以所佩玉带相赐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之性命，赖卿得以保全。”昭宗还京之后，诛宦官 500 人于内侍省，是唐朝末年最大一次诛灭阉宦事件。此后，唐昭宗又控制在朱全忠手里。

天佑元年（公元 904 年）正月，朱全忠率兵离开封，向京师进发，朝野震惊。朱全忠密令大将朱友谅，假托昭宗之命，收杀宰相崔胤、京兆尹郑元规，去其羽翼，然后逼昭宗迁都洛阳。时值皇后临产，昭宗要求产后迁洛，朱全忠不许。赴洛途中，朱全忠解释迁洛之因说：“李茂贞欲重劫陛下，不得已而请圣驾幸洛。”言毕，流涕满面，大有惶愧之状。昭宗深感鱼肉之危，为了苟全性命，维系家国，特在行营内室设宴，让皇后出席作陪，并由皇后出面乞求朱全忠说：“从今以后，我夫妻性命，全赖将军保全了。”这时的昭宗，身边没有禁军，只有小儿太监 200 多名照顾生活，朱全忠仍以为忌，必欲去之而后快。乃命人寻觅与小儿太监相似儿童 200 多个后，将真监全部缢杀，埋于帐幕地下，命假监穿上真监之衣，侍候于昭宗左右。昭宗起先未察，稍后方知自己已深锁牢笼之内，一言一行，均在朱全忠的监视之下，身危旦夕。大约在天复四年闰 3 月抵达洛阳，八月即被朱全忠派人杀死。伪撰遗诏，立辉王李祝为帝，改元天佑。不久又杀宰相独孤损等朝官 30 余人，朝廷上下，均牢牢地控制在朱全忠的手里。天佑四年（公元 907 年），又暗杀唐哀帝李祝，唐朝二百八十九年的皇统，至此结束，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朱全忠称帝之后，改名为“晃”，可能觉得“全忠”这一赐号名实不符，以“全忠”之名，行不忠之实啊！朱晃建国称“梁”，史称“后梁”，建都开封，改元开平。朱晃是后梁开国之君，庙号太祖，是中国封建历史转折期的重要政治人物。

朱晃称帝前后，在戎马倥偬之中，还十分注重辖区的农桑事务。曾委专吏负责其事，对晚唐兵燹之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开平二

年他还组织中原地区农民灭蝗抗灾，发展农桑，振兴经济。还减免农民赋税，招募各地流民，回原籍耕种，安居乐业。这些措施，对后梁建国之后的政权巩固、国力强大均有效益。

朱晃在称帝前后的较长时期内，与占领山西太原的李克用、李存勗父子的政治实体，长期对峙，兵连祸结，你争我夺，给两个辖区之间的百姓带来无穷灾难。朱晃生性猜忌，嗜杀成性，用人每疑，疑人每杀。在他的周围，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集团，治理军政大事。加之皇位继承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多疑猜忌之心，也影响到父子关系，加剧了内部矛盾斗争，暴发了领导层的重大危机。朱晃本人，终于在乾化二年（公元 912 年）被他的第二个儿子朱友圭所杀。自后梁建国开始，中同历史又进入一个动乱的分裂时代。

李存勗三矢定江山

后唐庄宗李存勗（公元 886—926 年），沙陀族人。唐光启元年 12 月 23 日（公元 886 年 1 月 30 日），生于山西太原之晋阳宫，是晋王李克用的长子。小字“亚子”，时人亦称“亚次”。史称幼即“体貌奇伟，沈厚不群。” 11 岁时，即随父出征王行瑜。凯旋之日，他代表晋军向昭宗献捷，皇帝连连称赞说：“此儿有奇表”。并抚其背勉励他说：“儿将来乃国家栋梁，忽忘忠孝于我家。”因赐给他鸂鶒（音 xī chì）形酒杯和翡翠盘子，以结其欢心。李存勗洞晓音律，喜欢以歌舞取乐。13 岁学《春秋》，手自钞录，粗知君、臣、家、国之大义。长成以后，善骑马射箭，胆略过人，且心胸开朗。后梁朱晃建国之后，梁将氏叔琮及康怀英，屡犯郊境，晋王辖区渐渐缩小，晋阳城外，频作战场。鉴于后梁兵临城下之势，其父李克用忧形于色。李存勗却表现出豁达大度、镇定自若的态度劝慰其父说：“我家三代尽忠唐室，目前虽势单力薄，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啊！物极必反，恶极必亡。今朱全忠窥伺帝位，陷害忠良，依儿观之，他已到恶极必亡之时。父亲应该静以待变，何必忧心如焚呢？”其识见之高，远胜其父。在援救刘仁恭的决策上，亦表现出他的超群才智。当沧州的刘守文被后梁击败，其父刘仁恭遣使乞援，李克用恨刘氏父子反复无常，不允其请。李存勗却从战略的高度说服其父道：“援助刘氏父子，是振兴我军的大好时机，不能因为过去的嫌隙而影响当今的兴晋大计。当今九分天下，朱全忠已占去六、七分。朱所畏忌者，只有刘李二家。唇亡必齿寒。仁恭若败，朱必全力攻我。今援仁恭，实乃援己。我家兴衰，在此一举，必须全力援救仁恭。”这番议论，确具战略眼光，等闲之辈是不可能讲出这种透辟的道理。

唐哀帝李祝（音 zhù）天佑四年（公元 907 年），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改元开平，而晋王仍奉唐朔，继用天佑年号。天佑五年正月，李克用病危之际，对监军张承业、大将吴珙（gǒng）说：“我常爱此子（指李存勗）志气远大，可付后事，希望你们多多指教，让其成材。”据《五代史缺文》记载，李克用在临终之前，将三枝箭交给李存勗嘱咐说：“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指后梁朱晃）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契丹首领阿保机与我把臂结盟，义同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投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实现我的志愿，死无憾矣。”言毕而终。李存勗时年 24 岁。

李存勗继承父业以后，第一个棘手问题即是如何处理与叔父李克宁的关

系。当时克宁任振武节度使，掌管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的大权，是晋王兵权的实际操纵者。李存勗决定以退为进，探明克宁态度再作处理。他对克宁说：“我年轻不懂军务，虽承父命，但幼不服众，请叔父管理军政大事。我长大以后，再听候安排。”李克宁心里明白，兄死尸骨未寒，若乘机夺权，将犯众怒。他率众向李存勗跪拜说：“你奉父命继承王位，谁敢反呢？”但刚愎乖戾的克宁之妻，怂恿克宁擅杀大将李存质，并胁迫李存勗答应授己云州节度使，割蔚、朔、应三州作为自己控制地盘的非法要求。李存勗一一应允。李克宁视李存勗懦弱可欺，进一步策划了俟李存勗来府即予杀害的阴谋。但李存勗早从幸臣史敬镕处得悉详情，果敢地命甲士诛杀李克宁，迅速平息了这场内乱。

天佑九年（公元 912 年）6 月，梁帝朱晃被他的儿子朱友圭所杀。梁内乱不安，人心不稳，无暇也无力向外扩张，是晋军扩展势力的最好机会。李存勗立即调兵遣将，实行其父所制订的“三矢”兴晋计划。

天佑十年正月李存勗命大将周德威拔顺州，俘刺史王在思。2 月拔安远军，又俘燕将 18 人。4 月又策动燕将李晖 20 余人降晋。至此晋兵直逼幽州城南门，燕王之子刘守光向周德威乞和。德威讽刺说：“大燕皇帝还没有举行登基祭天仪式，为什么就怯懦如此呢？”6 月李存勗派大将张承业赴幽州与周德威制定全面攻燕计划。七月张承业、周德威联合攻击幽州，刘守光又派使者持“信箭”一支求和，并令人将自己所骑之良马及玉鞍、勒口等物献给周德威，以明求和诚意，并登上城楼对周德威说：“我等候晋王到此，即刻投降。”请周德威驰报李存勗。

晋军攻燕，半年多时间即取得巨大胜利，燕军势穷力蹙，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同年 11 月李存勗下令亲征。他派人至祖庙请出其父所授的第一箭（灭燕之矢），用锦囊盛放，命军士高举于仪仗队之前。到达幽州城第三天的曙色初明之际，即发动总攻。他登上城外制高点“燕丹塚”指挥战斗，命将士用云梯之类的各种登城器械爬上城墙，顷刻之间，将士即将刘仁恭押至面前。12 月李存勗高燕城回晋。大佑十一年正月初一在镇州度岁。刺史王镕设宴犒赏，并请求李存勗说：“刘仁恭父子，与我有邻国之谊，今欲‘挹其风仪’（观其形象）可以么？”李存勗即命人打开枷锁，押至座前参加宴会。王镕还赠以衣物食品，以示不忘旧谊。李存勗大军回到晋阳城外，即命用绳索捆绑二人，行凯旋仪式，号令整队入城。当日将刘守光斩首示众。并遣大将李存霸，拘送刘仁恭至代州李克用的陵墓之所，用其父所授之箭刺出刘仁恭心血，祭奠亡灵，然后再将刘仁恭斩首。至此，李存勗完成了其父“三矢遗命”中的一矢遗命。

天佑十八年 8 月，李存勗命天平节度使阎保、成德兵马留后符习率兵讨伐张文礼于镇州，以惩罚他弑杀主帅王镕之罪。定州节度使王处直有唇亡齿寒之忧，于 11 月叛附契丹以自保。长子王都反对叛晋降契丹，囚禁其父，并自称留后求救于李存勗。处直乃阴使次子王郁贿赂契丹主阿保机进攻幽州，以解镇州之围。王郁劝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则皆为己物。不然，则皆为晋王所有。”阿保机乃陷镇州，又犯定州。定州留后王都向晋王告急。

天佑十九年（公元 922 年）正月，李存勗于祖庙请出其父所授第二支箭（灭契丹之矢），亦用锦囊盛之为前导，离晋阳，救镇、定二州之危，讨伐契丹主阿保机。李存勗自率铁骑五千，遇契丹前锋于新城（今辽宁抚顺附近），

晋军自桑林突出，“人马精甲，光明烛日”，契丹万余骑，突遭伏击，惶骇而逃。李存勗分兵为“二广”，追逐契丹之军数十里，俘获阿保机之子。时沙河冰薄，桥梁窄狭，契丹逃遁争践薄冰而过，陷溺河中而死者无数。当时阿保饥方驻定州，闻前军败讯，退保望都。第二天，李存勗引军与之激战，契丹大败，晋军追至易州，缴获毡裘、帐幕、兵械、牛马不可胜记。正值大雪下个不停，平地雪深数尺，契丹人马损失惨重。李存勗乘胜追击契丹于幽州，阿保机以手指天而叹曰：“天啊，何苦令我败到这个地步！”而引残兵北向遁逃而去。天佑末，阿保机为城郭宫室于大漠之北，距幽州约三千余里。李存勗驱灭契丹之战，至此告一阶段。虽获大捷，但除恶未尽，隐患犹存。

至于李存勗的第三矢伐梁灭朱温之遗命，是在他称帝之后完成的。天佑二十年（公元 923 年），李存勗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帝位，是为庄宗，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迁都洛阳，仍称东都。同年庄宗李存勗灭梁，完成其父的“三矢”遗命。庄宗李存勗与后梁争夺大下，时间最久，混战 10 余年。在山东东阿、河南濮阳一带地方反复争夺，两地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不过后唐庄宗消灭河北三镇辖区，统一北方之后，比后梁更扩大了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同光三年（公元 925 年）庄宗派兵入蜀，消灭前蜀，后唐统治扩大到长江的上游。

庄宗晚年以行乐为事，太后行浩令，皇后行教令，政出多门，混乱不堪。他既信宦官，又亲近伶官。皇子继岌与大臣郭崇韬争权，庄宗妄杀崇韬，朝野侧目。同光四年（公元 926 年）魏州、开封兵变，伶官郭门高（即郭从谦）攻入皇宫，乱兵将庄宗射死。

幽蓟十六州

石敬瑭（公元 892 年—942 年），沙陀族人。其父石绍雄（胡名臬捩鸡）在李克用、李存勗属下屡建奇功，地位仅次于周德威。石敬瑭（音 táng）为绍雄次子，于昭宗景福元年（公元 892 年）2 月 28 日生于太原汾阳里。史称石敬瑭“性沈淡，寡言笑，读兵法，重李牧、周亚夫行事。”是一位思想深沉、富有韬略的大将。庄宗大将李嗣源（即后来的明宗）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时，对他十分器重，将自己的爱女嫁他为妻。庄宗李存勗知其善骑射，武艺高强，命随左右，倚为心腹之吏。天佑三年（公元 906 年）后梁大将刘鄩（音 xún）兵犯清平，庄宗兵未列阵，即被鄩兵冲垮，敬瑭率十余骑精锐将士冲入鄩军，东西驰突，如入无人之境，搅乱敌阵，安全而返。庄宗抚其背赞叹地说：“将门必出将才，此话一点不假啊！”因厚赠金帛，庄宗并以胡人“啗酥”的礼俗，手掌托酥赐石敬瑭食品，以示褒奖之意，将士无人得此特殊恩宠，由此声名大振。同光四年（公元 926 年）庄宗遣李嗣源率兵平赵在礼之乱，行至魏州，军士哗变，欲拥李嗣源称帝于河北。李嗣源佯许其请，欲将哗变之由诉于庄宗，定其行止。这样既免叛逆之责，又可得其实惠。石敬瑭开导他说：“犹豫不决，乃兵家之大忌。一位带兵大将与三军一起哗变，朝廷能宽恕你么？”李嗣源悟其理，称帝之意遂决，命石敬瑭以 300 骑奇袭汴城以为立足之地。后称明宗，改元天成。李嗣源夺位，石敬瑭之功最著。

长兴二年（公元 931 年）十一月，契丹、吐浑、突厥屡侵边境，掠夺财物，杀戮边民，朝野震动。当时后唐边境戍卒虽多，而无大将。群龙无首，

战力甚微。朝臣一致推荐石敬瑭、康义诚二人堪当此任。石敬瑭自己亦不愿担任无所作为的禁军副职，愿赴边鄙，建立功业。可明宗久未免去禁军副帅之职，允其外任，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爱婿情深，难于割舍；二怕拥兵自大，萌生异志。或者兼而有之，爱惧交加，故拖延甚久，迟迟未决。史称敬瑭在明宗面前以“辞避”之情免言其事，足见翁婿二人已生嫌隙，“爱惧交加”之论并非虚发。不久边地又奏，寇患愈演愈烈，深入内境，为害愈大。明宗才决定石敬瑭帅边，于中兴殿设宴饯行，翁婿二人演出了一场真假相掺、喜忧混合的“生死别”。石敬瑭捧着酒杯向明宗祝酒说：“我虽身微力怯，对边事一定尽忠尽力。但儿臣远离陛下，无法晨昏定省，以报知遇之恩。”说毕泣泪告辞。明宗亦泪流满面，欲言欲止，不忍其离己而去。当时参加饯行宴会的大臣“怪其过伤”全不知二人此刻的感情是何等的特异和纷杂。此次之别，果成永诀。本年 12 月，明宗驾崩，生死殊途，无复相见了。闵帝即位，改元应顺。

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闵帝李从厚、末帝李从珂均对石敬瑭权倾朝野之势，心怀恐惧。同欲夺其兵权，去之而后安。清泰元年（公元 934 年）末帝夺位后，出于安抚仍封石敬瑭为太原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及北京留守之职，北方各州郡的军政大权囊括在石敬瑭手中。此时的石敬瑭，若夺翁家天下易如反掌。然引而未发者，以俟更有利于己的良机。可是手下将士渴望石敬瑭早日登基，自己早得封赏。朝思夕盼，若大旱之望云霓。清泰二年夏季，末帝派人给戍边兵士送来夏装。当石敬瑭分发夏服时，兵士竟对他高呼“万岁”不止。石敬瑭大惧，当即弹压，处死为首者 30 余人，以明自己的不二心志。可怜这些急于事功的将士，竟然成为石敬瑭刀下的冤魂。这次未遂兵变之后，末帝认定“敬瑭必反”。于是采取防范措施，将他从太原节度使任上，徙置天平，使其撤离经营多年的老巢，达到挫其权势的目的。石敬瑭断然拒绝。乃召集僚属商议说：“我此次受命太原节度使时，主上对我说：‘北方门户由你把守了，永不调离’。今突然命我徙置天平（郓州军号），是疑我反叛。又今年春节时，公主省亲，辞归之日主上对公主说：‘你归心甚急，欲与石郎反耶？’疑我之心，极其明白。且太原地险而粮多，易守难攻，吾当内联诸镇将士，外求契丹援兵，共图大事，诸公以为何如？”掌书记桑维翰、都押衙刘知远等均以为然。乃上表论末帝不当立，请立许王李从益为明宗的继位人。末帝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命晋州刺史张敬达领兵围攻晋阳。石敬瑭命桑维翰内联诸镇兵马，外乞契丹之援。

天福元年（公元 936 年）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亲率大军自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旌旗相继五十余里。将抵晋阳，使人报知石敬瑭说：“我军即刻破贼，行么？”石敬瑭使人回报说：“皇帝大军出击，务要成功。贼众势大，可事休整，以利战斗。”石敬瑭使未至，而两军已战。唐将张敬达、杨光远在西山之下列阵未成，而先锋高行舟、符彦卿已败迟下来，契丹大军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唐军大败，死伤数以万计，遂解晋阳之围。这天夜晚，石敬瑭出晋阳北门与戎主相见。戎主执石敬瑭之手说：“恨会面之晚。”而石敬瑭却以父子之礼相敬。11 月耶律德光对石敬瑭说：“我观你体貌恢宏，识量深远，是一国之主的材料。天命归你，时不可失，册封你为天子。”乃命筑坛于晋阳城南，立为大晋皇帝，史称后晋，改元天福。规定契丹与晋，永为父子之邦，永结山河之誓。石敬瑭为报答契丹主浩荡皇恩，割让幽、涿、

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等 16 州给契丹，并每岁向契丹进贡帛 30 万匹。至此，石敬瑭是以割地、输贡、称臣、称儿为条件而换取契丹授给他的后晋王位。这笔交易，对契丹主来说获利甚丰，得之甚易；对石敬瑭来说，代价太高，屈辱太甚。千多年来，史家提起这一史事，莫不怒发冲冠，口诛笔伐石敬瑭，割州输贡，甘作儿皇，可谓饥不择食，全无爱国之心。殊不知石敬瑭本出自西夷，父名臬捩鸡，从朱邪入居阴山（今属内蒙），以善骑射常从唐主征伐。生石敬瑭，冒中国之姓“石”，混称汉人，易得汉禄。他本为夷人，对中国自无所爱。对他来说，用别人的财富，买自己的禄位，利己损人，有何不可。

闰十一月，契丹、后晋联军围攻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将全族人口与亲密将领宋审虔同登玄武楼，纵火自焚而死，可谓悲壮之举。天福二年（公元 937 年），石敬瑭迁都汴州。三年升汴州为东京，改洛阳为西京。石敬瑭在位 7 年，连年兵乱，且天灾不止。天福七年，后晋所属吐谷浑部不愿降附契丹，契丹主欲兴师问罪，石敬瑭无法处置，忧郁成疾而死。其侄石重贵继位，史称少帝或出帝。开运三年（公元 946 年）契丹大军南下，攻入开封，俘出帝石重贵北迁，后晋宣告火亡。

歌声才歇便兴嗟

王衍（公元 924 年—952 年），是前蜀后主。本名宗衍，字化源，乃王建的第十一子，且年龄最幼。他颇通文墨，童年时期即会写诗填词，尤喜宫体艳情之作，曾收集艳体诗 200 篇，编成一集，名之曰《烟花集》。他识音律，善歌唱，经常依曲填词，执板自唱为乐。今存词二首。五代词以帝王之作为最工，他和李煜就是最为杰出的两个。他于光天元年（公元 942 年）继承父位，做了前蜀的后主，时年只有 18 岁。第二年改元乾德。王衍既无理政的经验，又无治国的才能，是一个沉迷声色、荒淫无度、花花公子式的风流皇帝。他将朝廷的军国大事交给宦官宋光嗣、景润澄等人处理，自己却和狎客韩昭、潘在迎、顾在珣、严旭等无赖之徒，留连歌楼酒肆。为了给他提供更多的游乐场所，在蜀中大兴土木、建造宣华苑、重光殿、太清殿、延昌殿、会真殿、清和宫、迎仙宫、降真亭、蓬莱亭、丹霞亭、怡神亭以及飞鸾阁、瑞鲁门等游乐设施，耗费民脂民膏则难以数计。工衍奢侈纵乐无度，日与太后、太妃聚宴于贵臣显宦之家，或外游名山胜地，车水马龙，喧嚣百里。他命人制作一种 20 轮的大车，名之为“流星辇”，以骏马牵引，车内装饰华丽，作为外出途中与宫妇取乐之所。乾德二年（公元 944 年）八月，秋高气爽之际，王衍率领大队人马外出游乐。他身披金甲，头戴珠冠，随从者亦盔甲鲜明，旌旗蔽日，连绵百里，百姓见之，疑为波斯拜火教神仙袄（音 xiān）神降世。大队人马来到汉州（今四川广汉），驻跸西湖，泛舟奏乐宴饮，夜以继日，享受声色之娱。12 月游至阆州（今四川阆中西北），浮江而下，龙舟画舫，照耀江水；笙萧鼓乐，响彻苍穹。船夫皆穿锦绣之衣，侍女皆着妖饶之服。途遇艳丽之女，即纳为宫妇。阆州州民何康之女将嫁，王衍闻说美丽即取为妃嫔，给夫家布帛百疋作为补偿，其夫恸哭而死。

咸康元年九月，王衍陪太后、太妃到道教圣地青城山祈祷。宫人皆着云霞之衣，望去愰若道教神仙降世，王衍即兴填写《甘州曲》词，使宫人沿途歌唱。词曰：“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

可惜许沦落，在风尘。”以降世的道教神仙相比，足见宫女们艳丽超群。游山途中，听说大雄节度使王承休的妻子严氏乃天生丽质；而承休亦投其所好，歌以严氏美色邀宠于王衍，作为进身之阶，特地邀请王衍游幸秦州。群臣谏阻，太后以绝食为胁，而王衍却锐意而行，不听劝阻，以一私严氏而后快。

王衍喜踢球为乐，球场周围以活动锦帐遮围。球踢到那里，锦帐则移动到那里，往往踢至闹市而不自知。他在宫中还命用丝织品扎成假山，假山之颠架设楼阁。假山之前设綵亭两座，供御厨制膳之用。王衍站在楼阁之上，目睹御膳制作过程，称之为“当面厨”。其父王建乃起自民间，出身微贱，称帝后仍俭朴之风未改，喜戴一种民间小帽，上行下效，成为蜀中一种极为流行的帽饰。但帽子甚小，只能盖住头顶，稍一倾斜，帽即坠地，故习称为“危脑帽”。王衍经常出入酒肆倡家，喜戴大帽遮颜藏面，在小帽群中，自己之帽独大反更引人注日。于是以“危脑”二字不吉为由，命令蜀人禁戴小帽。这样，为他混迹倡家，提供了方便。咸康元年（公元 925 年）他祭拜其父陵墓之前突发奇想，自制了一种尖顶夹巾，其状又高又尖戴在头上。一时之间蜀人争相仿制，成为时尚。王衍在宫中还别出心裁，设立村坊街市，令宫女穿粗布青衫，扮村姑商妇，卖买商品，俨如宫市，他与妃嫔巡游其间，观以取乐。

王衍这种纵乐无度、醉生梦死的行为，使宗族清醒之士痛心疾首。嘉王宗寿在一次宴会上涕泪陈情，请王衍勤于国事，“以宗庙社稷为重”。而狎客韩昭等人，却以“嘉王乃酒后胡言”诬陷。并对宗春戏谑嘲弄，谩言相侮，嘉王惧祸而逃，王衍毫无悔悟之意。

乾德六年（公元 924 年），后唐庄宗灭梁之后，已将吞并矛头指向西蜀，特派使者李严至蜀探听虚实。王衍命枢密使宋光嗣置酒款待，以刺探来意。李严从容对宋光嗣说：庄宗李存勗德配天地，有统一天下恢复唐祚之大志。并说朱温篡位之时，诸侯无一人派兵勤王，隐责西蜀不忠于唐之意。还说以后梁兵力之强，庄宗伐之如摧枯拉朽，其他割据一方者，只须发一镇之兵，就可取胜于旦夕之间。庄宗之所以至今容忍割据者存留下来，乃怜恤天下百姓，免遭兵燹之灾。这番话既是恫吓，也是劝降。

李严到成都之后，见市列珠玑，肆盈罗绮，深为贪羡。想以马匹换取蜀锦及珍玩带回中原。而西蜀之法禁止名贵蜀锦珍玩输出，允许输出之物皆为粗劣制品，蜀人称为“入草物”。李严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洛阳加油添醋地将此事禀告庄宗。庄宗怒曰：“王衍给我‘入草物’，他能避免做‘入草人’么？”李严还禀告蜀国君臣腐朽无能；王衍荒淫，不理政事。大臣王宗弼、宋光嗣之流均为谄谀之徒，以富贵身家为己务。后唐吊民伐罪，正是时机。大兵一到，即土崩瓦解。灭蜀之功，可唾手而得。庄宗深以为然，遂定下攻取西川之计。

咸康元年（公元 925 年）冬十月，庄宗遣李绍琛、李严率骑兵 3000、步兵 1 万为先锋伐蜀，大将郭崇韬、魏王李继发率大军踵其后。李严等乘马浮水渡江，出其不意占领汉州。大兵压境，王衍自知无抵抗之力，乃命李宗弼以金、银、牛、羊之物犒劳唐军，并诏谓李严说：“公来，吾即降。”李严部下阻止他去。认为提出伐蜀之策是李严，蜀人必恨。若至成都，将有不测之祸。严力排众议，料知蜀国君臣尚无这种胆量，欣然只身驰入成都，抚慰官吏百姓，各安生计，大军立至，勿须恐惧。果然王衍待李严为上宾，视己为阶下之囚，并引李严会见太后，以母妻安危为托，泣请李严向庄宗宽释其

罪。

这年十一月，李严押解王衍及百官离开成都，到城北 5 里处的升仙桥举行投降仪式。王衍身穿白色衣服，口中衔壁，手中牵羊，首系草绳；百官皆身穿丧服，赤脚，抬着棺木，号哭待命。魏王李继岌代表后唐受璧，大将郭崇韬将王衍松绑并焚烧棺木，宣读庄宗赦罪诏书，然后蜀国君臣面向东北叩头谢恩。受降仪式完毕，君臣在唐军押送下离蜀。同光四年（公元 926 年）三月，蜀国君臣抵达长安，庄宗诏令止行待命。伶官景进向庄宗献策说：“ 王衍族党甚多，若让他们来到洛阳，恐骤变为患，不如全部杀之，以防患于未然。 ”庄宗纳其言，命宦官向延嗣到长安执行杀戮任务。向延嗣将行之际，枢密使张居翰复视诏书，以为杀戮太多，将诏书中的“ 王衍一行，并从杀戮 ”中的“ 行 ”改成“ 家 ”字，因此王衍的百官及仆役获生者 1000 多人，均感谢张居翰的再生之德。四月，庄宗使者至长安，杀王衍家族于秦川驿，王衍当时只有 28 岁。

蜀前主王建以天复七年（公元 907 年）九月称帝，后主王衍以咸康元年亡国，父子二世，共占有蜀地 35 年。后唐之军伐蜀只用 70 天的时间，就占领蜀国 10 个节度镇、64 个州、249 个县的广大地域，并俘获蜀军 3 万，铠甲、兵杖、钱粮、金银、缯锦数以千万计。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真是空前未有的战例。后来的历史学家探究蜀国速亡之因时说：“ 阉人秉钧于外朝，母后司晨于阃内，嬉游山川，宣淫郡国。 ”这一结论，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孟昶洽后蜀

孟昶（公元 919 年—965 年），后蜀后主，字保元，初名仁赞，孟知祥第三子。他的母亲，是后唐庄宗李存勗的堂妹，其父能获镇蜀大吏的美差，和这种姻情不无关系。后唐闵帝应顺元年（公元 934 年）闰正月二十八日，孟知祥在蜀称帝，只做 7 个月的皇帝即于同年七月二十六日病卒。孟昶（音 ch ǎng）即位只有 16 岁，将相大臣均是其父旧部，视他为后生，哪里把他当帝看待。即位之初，大将李仁罕派人向枢密院要求授以主管 6 军之职，还亲至学士院监督学士起草诏令。对于这种抢夺兵权的非礼行为，孟昶心里自有算计。他先命枢密、学士两院满足李仁罕的一切要求，继而俟李仁罕入宫朝见之时，命武士当场处死。孟昶这一果敢行为，对元老重臣起到了威慑影响。大将李肇原亦贱视孟昶，对这个 16 岁的新君见而不拜，见到李仁罕被杀，吓得魂不附体，当即跪地叩头。鉴于旧臣居功自大，孟昶则选拔新人，担任各级官吏，并效法武则天设铜匦于朝堂，鼓励臣民密告枉吏推荐良材。有一人向铜匦投书，提出“ 台省 ”高级官吏“ 当择清流 ”的建议，既未揭发台省官吏谁人不清，也未推荐谁可胜任台省官职。孟昶叹息说：“ 何不明言择谁而任呢？ ”左右欲诘责上书之人，孟昶阻止说：“ 昔唐太宗初即位，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都能接受，你们怎么能让我拒臣下之谏呢？ ”由此，下情上达，言路畅通，朝政得失，易于了解。

在中原鼎沸，兵燹连年，斯文尽丧之际，后蜀孟昶与南唐李煜，遥相呼应，偃武修文，在五代史中是值得研讨的历史现象。孟昶在五代十国乃至有唐一代的帝王中，第一个用文臣代替武将知节度使事，这固然与他少年亲政，旧将跋扈而拥兵自大，以削夺其兵权有关；但这件事的本身却开创了宋代以文臣戍边削弱藩镇的先例，影响极为深远。广政四年（公元 941 年）3 月他

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昊统领武宁军、谏议大夫崔鋈统领武信军、给事中谢从志统领武泰军、将作监张赞统领宁江军，派遣这么多文官充任节度使，这在此前官吏史上是没有过的。

孟昶幼时即“聪悟才辨”、“尊儒尚道”，“好学为文”。广政三年，卫尉少卿赵崇祚收集当时“诗客曲子词500首，分为10卷”，名为《花间集》。这年4月，武德军节度判官、翰林学士欧阳炯为之作序。后人视为文人词曲之祖，对后世影响甚大。广政四年，孟昶诏令史馆编辑《古今韵会》500卷，卷帙浩繁。惜乎不传，内容无从知晓。鉴于头一年编的《花间》是一部词选，而《韵会》极有可能是一部诗选。前为词，后为诗；前500首，后500卷。诗词双璧，相映生辉，这是极可称道的蜀中文学盛事。

广政年间，蜀中还进行了两次且规模巨大的刻书勒石活动。一次是广政七年，平泉令张德钊书写雍都旧本《九经》，刻在石碑上，藏于成都学宫。第二次是在广政十四年，这次由孟昶直接下诏，“勒诸经于石”。这次刻经规模更大，由秘书郎张绍文写《毛诗》、《仪礼》、《礼记》，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写《周礼》，国子博士孙逢吉写《周易》，校书郎周德政写《尚书》，平泉令张德钊写《尔雅》。雕成《广政石经》，均置于成都学宫。史称“字皆精谨”，是后蜀的一项巨大文化建设工程，“由是蜀中文化复盛”。孟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画院，延请蜀中著名画师50多人住院作画，如花鸟画大师黄荃父子均在被邀之列。昶在音乐上也有创造，如今天流传在台湾的“南管音乐”（又称“南音”），被外国人称之为“唐音”，据称也是创于蜀后主孟昶。

孟昶和王衍，虽同为亡国之君，但并非一流人物。昶之为人，卓有才识，精明强干，前期以骄奢淫佚为戒；但他又有知行不一的地方，也干了许多骄奢淫佚的蠢事，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广政五年，他诏令大选良家女子，以充实后宫佳丽。规定选美的年龄必须在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蜀中百姓骚动不安，纷纷觅婿嫁女，免遭选美之害，时人谓之“惊婚”。选入后宫美女，分为14个等级，有昭仪、昭容、昭华、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跸、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等名目。孟昶的花蕊夫人，可能就是这次选进后宫的。由于前蜀主王建的小徐妃早称“花蕊”，故史称孟昶的这位才妃为“后花蕊”。孟昶这位花蕊夫人，姓费，蜀之青城人。她能诗善字，能歌善舞，留下宫词百首。二人感情甚笃，百首宫词，即是他们宫廷生活的实录。孟昶所用溺器（尿壶），都是用七宝装饰而成。亡国后宋太祖赵匡胤见此而感叹地对孟昶说：“你用七宝装饰溺器，那么盛食品器皿用什么装饰呢？穷奢极侈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能不做亡国之君呢？”

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等率禁兵3万人、诸州兵2万人伐蜀。孟昶听到消息后，以王昭远为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贞为招讨使，帅兵拒宋。二十八年春，孟昶闻宋师深入蜀境，十分恐惧而问计于左右，老将石赜认为聚兵坚守为上策。孟昶叹息说：“我父子在蜀以温衣美食养士40年，一旦临敌，不能为我向东来之敌发一支箭，虽想坚壁拒宋之兵，有谁能帮我守御呢？”乃命李吴起草降表，遣使向宋将王全斌大营投降。正月19日王全斌大军进人成都，孟昶具礼纳降。宋军自兴师至灭蜀，前后只用66天时间，就占领了45个州、1个府、198个县。其亡国之速，比前蜀王衍还要快4天呢。

广政二十八年2月，孟昶乃与太后、妃嫔、宗族及百官，离开成都乘船

自峡江东下，蜀中百姓夹岸相送，并焚香祈福，涕泪交加，直至犍为（今四川宜宾西南）而罢，场面十分感人。为了纪念孟昶离川降宋，改键为之名为蜀王滩。足见蜀民对孟昶的“劝农恤刑，肇兴文化，孜孜求治，与民休息”治蜀之策的肯定，这与王衍形成对比。5 月初孟昶一行来到汴京（开封），16 日宋太祖赵匡胤在崇元殿以礼相见。7 天以后，孟昶即逝于汴京私第，时年 47 岁。

李昪化家为国

李昪（公元 888 年—943 年），南唐开国之君。字正伦，小宇彭奴，徐州人。父名李荣，是一个不事正业的游荡者，混迹寺众僧徒之间。彭奴幼年多难。6 岁丧父，兵乱中母子二人依伯父李球流徙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其母亦逝，遂至濠州开元寺落发做了小沙弥。昭宗乾宁二年（公元 895 年）杨行密攻占濠州，于流亡难民之中奇其过人机警而收养；但不为杨氏之子所容，乃转养于大将徐温之家。

徐温收彭奴为义子，改姓徐，名知诰。在徐家诸子之中，以徐知诰最为伶俐，善解人意，对徐温夫妇恪尽人子之道。徐温之妻李氏，因与同姓，钟爱倍加，视同子侄。徐温偕徐知诰外出，稍不如意，即杖责和驱赶；徐温归家时，徐知浩却迎拜于门后。徐温大为惊诧，问何以至此？徐知诰回答说：“做为子辈，抛弃父母，则无地自容；严父相责，慈母必怜，这是人之常情啊！”由是徐温对徐知诰钟爱有加，情胜骨肉。尤其在徐温生病之际，徐知诰夫妇日夜伺候于床前，送汤熬药，比徐温的亲子更尽孝道。徐温愈后即以亲子之情待之，并令其主持家务。杨行密曾多次赞叹说：“徐知诰乃人中豪杰，诸将之子中无人相及啊！”

在杨行密割据淮南，徐温南北征战之中，徐知诰均随侍左右，入则谋划军机，出则冲锋陷阵，以战功卓著升为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上任之后，奖励廉能官吏，勉励发展农桑，数年之间，州府仓盈库实，百姓足食丰衣。他还重视振兴文教，访求古籍，刊刻流传。还优待文士，招纳贤良，为异州各级官吏选拔有用之材。天佑十二年（公元 912 年），徐温被封为齐国公，以亲子徐知训驻守广陵（今江苏扬州），而自己徙置金陵（今南京），迁徐知诰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团练使。徐知诰初不欲往，屡求宣州之任，均遭徐温拒绝。幕僚宋齐丘私劝徐知诰说：“徐知训为人，骄淫失众，旦暮必败。润、扬二州，一江之隔，朝发夕至，这是天赐良机，切不可失！”徐知诰于是允为润州之行。正如宋齐丘所料，天佑十五年，徐知训被部下所杀，广陵陷入混乱之中，徐知诰即率州兵渡江，平息广陵之乱，遂取代知训为淮南节度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由此徐知诰实际夺取了徐温军政大权。他革新徐温弊政，劝农桑、宽刑罚、恤民艰。常派官吏到民间访察，凡有婚、丧大事及贫不聊生者即予赈济。有时亲至民间明察暗访，布衣蒲履，无异乡民。暑天左右为张伞盖，徐知诰责备左右说：“百姓务农，均暴露于烈日之下，我怎么能有此享受呢？”所以徐温名义上在南京遥控吴国军政大权，而百姓却早已归心于徐知诰了。徐知诰初至广陵，代徐温治理军政之时，吏民均以年轻嫩稚，少不更事之辈待之，为了弹压非难之议，特以药物将发须染白，装扮老成，以孚众望。没料到几年之后，百姓归心却如此之速了。

吴天祚三年（公元 937 年）十月，徐知诰废吴主杨溥，以受禅名义夺取

吴国政权，自称皇帝，国号“大齐”，改年号为“昪元”。第二年自称为唐玄宗第六子永王李麟之后裔，复姓李，更名为“昪”（音biàn），国号“大唐”，史称“南唐”。李昪称帝之后，没有走封建帝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路，仍以吴国平章事张廷翰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为同平章事，比敌为友，对巩固南唐小王朝的政权，获益匪浅。李昪称帝后继续推行富民利国发展农桑的政策。规定百姓种植桑树3000株以上者，赐帛50匹；每丁垦田80亩者，赐钱2万，并且让获奖农户5年不纳租税。他还派人踏勘田地，按照土地肥瘠程度决定税额。他如兵役、徭役或其他赋税项目，均依税钱比例摊派：税额高者多征，税额低少派，负担均衡，深受百姓拥护。南唐在这种比较安定的情况下，生产迅速发展，不到10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荣景象。

李昪还继续推行复兴文教的政策。昪元四年十二月，在江两庐山建学馆于白鹿洞，以李善道为洞主，主持学馆事务，并号称“庐山国学”。并给学馆设置田产，其收入作为学馆公务及诸生生活之资。白鹿洞学馆后来成为历代有名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卓著。

李昪建国之后，推行一种外和内忌的政策。昪元四年后晋据安州（今湖北安陆）大将李金全请降，李昪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二人前去迎降，戒令勿入安城。二人违令入据安州，且肆意剽掠民财，晋派兵围击，段处恭战死，李承裕俘后被杀，南唐丧师4000多人，李昪悔恨多日，诏谕群臣以为擅起兵争之戒。昪元五年四月，后汉遣使来南唐，邀约兴师伐楚，平分其地，李昪坚辞拒绝。七月，吴越火灾，宫室器械焚毁殆尽，大司徒宋齐丘乘机献策说：“夫越与唐乃唇齿之邦，我屡施大德，而越人屡叛。今遭火厄，实上天之谴责。我若乘机用兵，晨发而暮至。愿勿失良机，为后世之患。”李昪表情凄沧地对齐丘说：“两国疆域虽分，让百姓蕃衍生息的道理是相同的，人各为其主之心也是一致的。平白无故突起杀伐之衅，我于心不忍。且救灾睦邻，乃治国之道。怎么能乘人之危而夺人之国，这种事我是不干的，望大司徒勿复多言。”于是特地派遣慰问使，厚赠金、粟、缯、绮之物，车载相连，络绎不绝。李昪长于戎伍之间，早年颇受兵乱之苦，深知兵为民害之烈，对臣下开拓疆土之议，均予拒绝。他东与吴越连和，西与晋楚通好，保境安民，息兵和外，无复拓土恢疆之略，以至好为大言的宰相冯延巳讥刺他说：“一个乡巴佬怎么能做出大的事业来呢！”

李昪夺权之后，对内严加防范，这是从他自身的发迹史所总结出的历史经验。他的义父徐温是凭拥兵自大而夺取杨氏的军政大权；李昪自己也是以实力和徐温亲子较量而夺取徐氏军政大权的。为了李氏的千秋大业，采取诸多防范措施，这是形势的必然，是可以理解的。他反对用兵，目的在于削弱将领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抑制将军们的跋扈野心，自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他自己是从做吴国的宰相而演变为南唐的皇帝，深知宰相久任之后的不良后果。李建勋是南唐的良吏，政绩甚佳，民称贤相，因在位日久被他视为危险人物，但又找不出罢免他的理由，只好寻找一个借口予以免职。他还严格规定：外戚不得在朝廷为官辅政，宦官更不准干预朝政大事。

李昪由于出身微贱，生性俭朴。常穿蒲履（草鞋），用铁制盆器，暑天用粗葛布帐，照明用乌臼子油灯而不用脂蜡。一个名为“金奴”的铁制灯台，还是杨行密马厩中用过的旧物。宫内侍者只有几名老丑的宫妇，而不用年轻貌美的宫女。百官若有“羡余”（应纳赋税之外的进贡物品）必责令退还物

主。并说：“百姓是依赋率纳税的，若不是额外搜刮民财，怎么会有‘余’可‘羡’呢？”这不仅在五代十国君主中所仅有，就是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算凤毛麟角。李昪后期迷恋方士长生之术，服食丹药因而中毒，于昪元七年2月病逝，享年56岁。临终以牙咬太子之指嘱曰：“他年北方（指后周）一定南侵，亟早防备。”史称李昪然自立，化家为国，遂霸江南。息兵养民，国力强盛。且生性俭朴，有古代贤主之风范。

可怜薄命作君王

李煜（公元936—978年），字重光，初名从嘉，亦名钟隐，元宗李璟的第六个儿子。史称从嘉长相异乎常人，头额甚宽，面颊很大。一般人的门牙均为两个，而他却合二为一，世称“骈齿”。他的眼睛亦很奇特，一双眼球居然有两个瞳孔，世称“重瞳”。重瞳的人极为少见，据说上古帝舜曾有这种生理特征。从嘉的这种异貌“奇表”，时人均视为贵异之征，引起他人的猜忌和嫉妒。从嘉长兄文献太子，视为皇位的竞争对手，对他防范有加，思欲去之而后安。其实从嘉从不与闻朝政；对权力之争，更避之唯恐不及。他把兴趣和精力，均用在闭门读书，“覃思经籍”方面。这决非为了远祸避凶，故作收敛锋芒，隐藏大志的韬晦之计。他秉性儒雅，酷嗜文墨，“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在文艺领域，造诣极深。从习艺和气质言之，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学士，怎么也派不上他做封建帝王。他的五位兄长相继夭亡，按照太子立长的惯例，依次轮到他的头上，这才使他遭受“可怜薄命做君王”的命运。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从嘉晋封吴王，立为储君，移居东宫。6月元宗李璟逝于南都（今江西南昌），从嘉即位，更名为“煜”，世称“后主”。

李煜25岁继承父位，做了南唐的君主。在继位的前两年（公元959年），李璟已称臣于周世宗，奉行北周的年号“显德”。继位的头一年（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北周灭亡，李煜即位后则称臣于宋，改用宋朝的年号“建隆”。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能征会战，且有囊括宇宙、统一天下的雄心，怎么能“卧榻之侧，尚容他人鼾睡”呢？之所以未及时进兵江南，是因为北方尚未巩固，荆南尚未吞并。李煜亦深知局势严峻，但即位之后，不是采用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策略；而是以进贡珠宝结欢于宋室君臣，以求苟全东南一隅的绥靖之略。在他即位的那一年，上表乞位，向宋朝进贡“金器2000两，银器2万两，纱罗丝绢3万匹。”这都是江南百姓的民脂民膏啊！此后，凡宋朝出师大捷，南唐必进贡犒师；每逢重大节日，南唐必进贡“买宴”祝贺；吉凶大事，必致庆吊之礼。这种频繁的输贡，使江南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不得不广征厚敛，搜刮民财。据《邵氏闻见录》的记载，李煜为了弥补“国用不足，民间鹅生双子，柳条结絮皆税之。”税目之奇，征敛之酷，简直令人咋舌。南唐虽未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但和乃祖乃父的国运相比，已是江河日下，今非昔比了。

李煜这种非君非臣的屈辱生活，还表现在向宋称臣、贬损议制的矛盾行为上。他即位后给宋朝的一切表章，均依南唐臣于北周时的旧例，用“臣唐国主李煜”落款。印玺亦为“唐国主印”。这是宋朝所不能接受的。“唐国”二字有正统之嫌，这对建国伊始的宋君来说是一大禁忌，所以从建隆二年至开宝四年（公元961—971年）的10年之间，宋朝给南唐的所有诏书均“诏

而不名”。只具内容，而无称谓，这在古今文牍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李煜多次“乞罢诏书不名之礼”，都没得到宋朝的允许。直至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宋朝屯兵汉阳，做好进兵江南的准备，南唐的危机进一步恶化，李煜将原称的“唐国主”改称“江南国主”，才结束了“诏书不名”的历史。

南唐与宋除名份之争外，仪制游戏也玩弄了很长一段时间。南唐宫殿正脊两端原装饰有作为帝居标志的构件“鸱（音 chī）吻”，李煜臣伏于宋后必须拆除这种标志。李煜却在未使来时拆下，宋使去后又装上。同样，原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可以衣红，现在只能衣紫。服色的改换，也因宋使的来去而异。贬损仪制方面的矛盾行为，反映了李煜内心深处不甘屈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

在国将不国山雨欲来之际，李煜并未图强自保、治国安邦。自开宝元年（公元 968 年）小周后册立之后，李煜“好豪侈，贪声色”更甚于前。他不问朝政，日以词章与声色为乐。宋朝却利用废朝荒政之机，派遣间谍引导走向更加荒诞的境地。开宝二年宋朝派遣名为“小长老”的谍僧来金陵，以大量珠宝贿赂朝官而接近李煜。在后宫纵谈天宫地狱、因果报应，宣扬命由天定，不可人为的思想，进一步消磨南唐君臣的意志与抗争兴国的信心。并劝李煜在城中多建佛塔，在牛首山多建佛寺，从而聚僧众千余人，广造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宋师渡江之后，即以此为兵营，原来是为宋师筑垒。还有一谍僧在采石矶头凿岩立塔，经营多年。及宋师渡江之时，即以之为系绳基础而架设浮桥，兵马渡江如履平地。当宋师离城 10 余里安营扎寨，李煜与南唐大臣毫无察觉。及金陵被围，后主却向小长老求助。小长老对后主说：“北兵虽强，怎能挡我佛法。”于是登城用麈（音 zhǔ）尾一挥，宋师果然后撤。后主合掌叹异，立命军民皆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声如涛涌，震撼江城。未几，宋师再次攻城，矢如雨卜。仓皇之间令人复召小长老，则称疾不至。

开宝七年（公元 974 年），即南唐“甲戌岁”（宋师攻打南唐，李煜即废用宋朔，用干支纪年），金陵城破，李煜出降。第二年正月，俘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封为“违命侯”。在汴期间，他致书江南旧宫人说：“此间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说明他的俘虏生涯，是过得极为不快的。为了察悉他的思想动态，宋太宗赵匡义特派南唐旧臣徐铉到李煜住所探听情况。他们会面之后，李煜叹息良久，才懊悔地说：“悔不该当年杀了潘佑、李平。”潘、李二人，是南唐积极主张改革朝政、抗击宋朝南侵之策的倡导者，是抗敌派的中坚。在这个时刻，这种场合，发这种懊悔之情，意在说明，若当年依潘、李二人的主张行事，或许自己不会成为阶下囚哩！说明李煜虽身为囚犯，故国不堪回首，却仍在做复辟梦。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来，的确是极不明智的。这年七月七日，即被宋太宗以牵机毒害死，时年 42 岁。李煜死后，消息传至江南，父老巷哭而祭者甚多。十月以王礼葬洛阳之北邙山，徐铉撰《墓志》推言李煜之死是“历数有尽，天命有归。”旧臣为故主写《墓志》，只能如此而已。

李煜在政治上是一个亡国之君，在文学上却是一位填词的圣手。他在文人词发展方面的贡献极为杰出，在词学史享有极高的地位。

周世宗柴荣

后周，是继沙陀族三王朝之后建立的汉族政权，也是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历经 3 帝，太祖郭威在位 3 年，世宗柴荣在位 5 年，恭帝柴宗训在位半年，国运不昌，其亡也速。

太祖郭威，是在后汉兵祸连年、互相残杀，遍地饥馑，民不聊生的动乱之世建立后周政权的。故郭威立国之后，即致力于整顿。他在政治上恢复唐朝三省六部权力，选择良吏主持朝政；在经济上招抚流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他停废五代各朝沿用的公田制，将土地、庐舍、农具、耕牛分给农户，成为他们永久产业，从而使后周社会出现了农业经济复苏的局面。

世宗柴荣（公元 921 年—959 年），邢州龙冈人氏，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柴荣年幼失怙，由姑母圣穆皇后收养。其时郭威未显，喜饮博，好任侠，不拘细行，家道沦落。姑母以柴荣生性谨厚，委以家中庶务。在柴荣悉心谋划，锐意经营，开源节流之后，终于使郭家“货用获济”，生计顿解，因而受到郭威的喜爱，“乃养为己子”。史称柴荣善骑射，略通书史，尤嗜黄老之学。曾随大商人颉跌氏贩茶江陵，往来南北各地，对五代社会积弊深有体察。这段经历，为他以后继郭威为帝制定治国安邦之策提供了感性认识。

后汉刘知远是深得郭威之助而建国称帝的，一年以后其子刘承裕继位却对郭威倍加猜忌，先是以枢密使之衔令其出守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继而又派人暗杀。郭威愤而夺取政权建立后周，即以柴荣取代自己为邺都留守。邺都为后周军事重镇，与契丹的幽州（今北京市）遥相对峙，屏蔽周京开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显德元年（公元 953 年），柴荣封为晋王，郭威患病弥留之际，又加授柴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掌管内外兵马，为郭威死后全面接管后周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

柴荣于显德元年继郭威为帝，在郭威整顿政治经济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对军事、政治、经济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柴荣即位之初，后周骄兵惰将，飞扬跋扈，不听指挥。这年对北汉的战斗中，大将樊爱能、何徽望敌而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士卒才奋勇抗击，挫败北汉的进攻，扭转了战局。柴荣在战后赏有功，罚怯懦，斩临阵而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及监军使臣 70 余人，自此以后，骄兵惰将无不畏惧，而新主柴荣之威权亦由之而立。

在政治上，柴荣严禁贪污渎职官吏。在他继位的显德元年冬十月，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厚取耗余”（即在朝廷规定税额之外多征赋税）罪而予以赐死，对搜括民财的贪官污吏震动很大。供奉官郝光庭昔在叶县（今河南叶县）巡检任上，挟私泄愤，诬断平民死罪而被弃市。这对那些残害百姓滥杀无辜的恶吏以当头棒喝。显德四年（公元 957 年）前濠州（今安徽凤阳）刺史齐藏珍亦因虐民害物之罪而遭弃市。柴荣惩治贪污不仅雷厉风行，而且逐步深入，即使占有戚属财产的人也在严惩之列。殿中丞马从赟（音 yūn）吞没外孙女霍氏的财产，亦遭退赃免职的处分。

柴世宗对官吏的考核，不仅局限贪赃枉法方面，那些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以及违反政纪者亦应受罚。显德二年（公元 955 年）左散骑常侍康澄、左司郎中史又玄、左骁卫大将军元霸、右骁卫将军林延禔（音 tí）等人，奉命出使浙中，返归之日，利用职权游山玩水，耗费国家资财且逾期至朝廷覆命，分别受到贬官处分，这在封建时代官考核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史例。

柴荣在位 5 年，恢复了漕运，兴修了水利，修订了刑律和历法，并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佚书，雕刻古籍，大兴文教。却因征战连年，积

劳成疾，于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病逝。柴荣治理后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北宋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